

# 法国共产党史

## 第一卷

从法共建党到1939年战争

(供内部参考)

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内部图书资料  
第 0068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

# 法国共产党史

## 第一卷

从法共建党到1939年战争

北京編譯社等譯

(供內部参考)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5年·北京

“你們有年轻的干部。这很好。我們不能不为此而感到高兴。但是，他們的政治生活現在才开始。这就是他們不时地还犯党过去犯过而且曾經多次受到批判的同样錯誤的原因。

“他們不仅不知道法国工人运动的历史，而且也不了解党的历史和共产国际的历史。”

曼努伊斯基①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法国代表的信

1930年6月

---

① 德·查·曼努伊斯基(Dimitri Zakharovich Manouilsky, 1883—1959), 当时是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譯者

##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1914年帝国主义战争前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	3
一、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	3
二、从法国工人党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11
三、从社会爱国主义到神圣同盟	18
第二章 从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8)到第三国际	25
一、齐美尔瓦尔得会议	25
二、昆塔尔会议	29
三、大战结束和第三国际的成立	31
第三章 法国共产党诞生	45
一、图尔代表大会的筹备	45
二、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	49
三、图尔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5日—30日)	55
第四章 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最初活动	64
一、图尔代表大会以后的形势	64
二、党内的各种倾向	67
第五章 关于鲁尔问题的斗争	76
一、占领鲁尔	76
二、鲁尔区的革命活动	85
三、希特勒关于鲁尔的话	87
四、1924年的选举	89
第六章 摩洛哥战争	93
一、摩洛哥战争开始时共产党的情况	93



二、反对摩洛哥战争的行动 .....	95
第七章 阿尔萨斯—洛林问题 .....	100
一、1925年的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 .....	100
第八章 公开信 .....	103
一、1925年12月的会议 .....	103
二、《给全体党员的公开信》 .....	105
第九章 塔底尤阴谋 .....	110
一、1926年要求恢复权利的斗争 .....	110
二、军事计划 .....	113
三、1927年的《公开信》 .....	115
四、策划阴谋 .....	120
第十章 巴尔贝—塞洛尔集团 .....	125
一、共产国际的指示 .....	125
二、派别活动 .....	127
第十一章 反法西斯行动和同社会党人的联合 .....	134
一、阿姆斯特丹—普累耳 .....	134
二、1934年2月事件 .....	137
三、统一行动公约 .....	142
第十二章 争取面包、和平与自由的人民阵线 .....	151
一、在维勒班的第八次全国党代表大会 .....	151
二、1936年的议会选举(4月26日—5月3日) .....	156
三、1936年的罢工 .....	160
第十三章 西班牙战争 .....	169
一、佛朗哥的叛乱 .....	169
二、“不干涉政策”和“国际纵队” .....	171
第十四章 人民阵线的分裂 .....	176
一、人民阵线的错误 .....	176
二、从阿尔代表大会到人民阵线的分裂 .....	180

第十五章 慕尼黑協定和反法西斯斗爭 .....	184
一、慕尼黑協定 .....	184
二、國際法西斯主義的發展 .....	187
第十六章 德蘇條約 .....	192
一、英法蘇談判 .....	192
二、德蘇條約 .....	197
第十七章 禁止法國共產黨 .....	201
一、黨內的紊亂 .....	201
二、宣戰和解散共產黨 .....	204
三、轉入地下斗爭 .....	209
四、審訊共產黨議員 .....	214
五、地下組織 .....	222
第十八章 入侵 .....	228
一、1940年5—6月 .....	228
二、占領時期 .....	233
后記 .....	245
大事記 .....	246

## 前 言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式出版的最新的《法国共产党史》，是1931年的那一本(安·费腊著)。

从那以后，尽管法国共产党各级组织或干部一再提出要求，而这个党现有的唯一党史文件是一本它的总书记写的小說式的传记——《人民的儿子》。

这本在1937年初次出版的传记，在1949、1954和1960年几次再版时，对事实和政治立场都作了修改，因此，更不能把它当成历史著作看。

此外，这本传记只论述了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个人经历的事件，所以在法共历史某些决定性的阶段方面，有不少重大的疏漏和空白。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多次指出，必须出版一本《党史》，特别是在1939年6月8日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还指定了一个编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后来被战争打断了。

在法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7月18—21日)上代表们通过的提纲第四十五点规定，“在不久的将来着手编写一部《法国共产党史》。”<sup>①</sup>

三年后，到法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59年6月24—28日)时，这一决议还没有实现。政治局委员弗朗索瓦·皮佑在发言时说：“代表大会可以要求下届中央委员会推动编辑委员会的

---

<sup>①</sup> 《法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文件选辑》 世界知识社 1956年版 第195页。——译者

工作，以便完成尚未編写的章节，并于1960年初审完全稿。”

法国共产党的某些党员譴責編輯委员会工作拖拉。他們在了解編輯委员会編写的某些初稿时，发现其中有許多不确切或解释錯誤的地方，显然这是为了替以后的政治立場作辯解和掩盖严重錯誤的。

鉴于这种情况，这些党员认为，他們是法共的老党员，他們经历了党的各个阶段，参加了党的各种斗争，因此他們有义务亲自起草一部党史。以后他們就把这部草稿送請那些经历过和目睹过书內所讲的历史事实的人去审阅。

将近五百名共产党员，通过写信、提供資料、組織討論等方式，参加了这部《法国共产党史》第一卷的定稿工作，他們为使本书尊重事实作出了努力。

在本书第一卷《从法共建党到1939年战争》付印的时候，它的集体作者还不知道他們的党中央委员会在1956年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編写的、以后又经1959年全国代表大会答应在1960年初出版的党史，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問世。

他們认为，無論如何他們的著作是有用的，并且可以拿去同文件和資料进行有益的对照，誠实的共产党员会根据自己的見聞或经历作出評价。

他們认为，这本集体著作最好不署名，党內的同志們会理解这一点。

他們相信，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对本书的評論是根据本书内容和核对书內所引的文件，而不是根据作者是誰。因此作者署了名也不会提高或降低本书的价值。

1960年7月，于巴黎

## 第一章

### 1914年帝国主义战争前的工人和

### 社会主义运动

#### 一、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

列宁对于他所称的“法国大革命”怀有深刻的钦佩心情。

这次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以至整个十九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列宁指出：世界各个角落都摹仿、实现并完成了伟大的法国革命家们为资产阶级开创的范例，“这些革命家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被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词句蒙蔽了”<sup>①</sup>。

列宁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纯雅各宾派“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银行、资本家辛迪加、机械工业、铁路”因而未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曾着重指出：

“1793年的雅各宾派是以掌握了整个国家政权的劳动者和被压迫者阶级同剥削者阶级进行真正革命斗争的伟大典范而载入史册的。”<sup>②</sup>

在摆脱了封建主义的十九世纪，法国经济所经受的深刻变革，特别是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必然要迅速改变这些条件，而且必然会产生新的革命的可能性。

<sup>①</sup> 列宁：《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4—335页。——译者）

<sup>②</sup> 列宁：《论人民公敌》。（参阅《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2页。——译者）

新兴的资本主义,在建立大工业统治的同时,也创造了、发展了并集中了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很快就团结起来为反对他们身受其害的残酷剥削而斗争。

1830年7月,人民群众参加了争取普选、共和国和召开制宪会议的“光荣的三天”<sup>①</sup>的街垒战,以后又爆发了里昂丝织工人的伟大起义<sup>②</sup>。

1832年6月5—6日,拉马尔克将军殒葬时爆发了起义。1834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凡被控“阴谋危害国家安全”的人,一律送交轻罪法庭审理,因此又在里昂和巴黎引起了新的暴动。军队屠杀了在巴黎摩布埃街和特朗斯诺南街建立街垒的劳动者,在附近的房子里搜捕起义者的时候,杀害了里面的妇女和儿童。

1847年发生了多起饥荒暴动,特别是比桑歇饥荒暴动,在这次暴动中,示威者殴打了两个富有的粮食囤积商。然后是1848年的二月革命,这次革命坚决地建立了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

但是,二月街垒战所产生的临时政府,公然在1848年5月4日的国民议会上宣布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把劳动者的代表排挤出去,甚至取消了劳动部,因而驱散了人民群众的幻想。5月15日,巴黎的劳动群众冲进了国民议会,但由于不够一致,结果反而使巴尔贝斯、阿尔伯、拉斯拜尔、索布里埃等遭到逮捕,不久奥古斯特·布朗基也被关进了万塞纳监狱。

国民议会辱骂了工人,并对工人采取了把原籍非巴黎的工

---

① “光荣的三天”指1830年7月27—29日巴黎劳动人民的起义。这次起义推翻了波旁君主政权,但被资产阶级篡夺了胜利果实,建立了以路易·菲力普为首的新君主政体。——译者

② 指1831年11月里昂丝织工人在“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斗争而死”的口号下进行的起义。——译者



人送往索隆、国家工厂开除单身工人等等挑衅行动。

1848年6月22日，工人发动了消灭“资产阶级秩序”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工人阶级的第一次起义”。

“大家都知道，当时那些没有领袖、没有共同行动计划、没有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是多么无比勇敢、无比巧妙地扼制了军队、别动队、巴黎城内的国民自卫军以及从外省开来的国民自卫军联合势力，一连坚持了整整五天之久。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为自己所经受的死亡恐怖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报复，残杀了三千多名俘虏。”<sup>①</sup>

列宁在论1848年6月革命的许多文章中，曾向“唯一的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致敬，并指出这次革命对全世界工人的历史意义：

“1848年的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嚣叫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一个致命的打击。各国的革命，使社会各阶级在行动中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共和派资产阶级在1848年6月巴黎事变时枪杀工人，最终地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sup>②</sup>

1848年革命失败后不久，应“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一个德国革命者小组倡议下建立起来的秘密社团——的要求，马克思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法文本出版了。

革命阶级发出了全世界范围的挑战：

“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

---

① 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35页。——译者）

②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参阅《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81—582页。——译者）

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頸上的鎖鏈。而他們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sup>①</sup>

1864年9月28日，西欧大部分国家的无产者举行會議，并成立了主张以暴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际工人协会”。

第一国际通过召开代表大会及发表宣言改变了世界工人斗争的方向。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第一国际进行了反对巴枯宁和否认“用革命行动进行社会改革的可能性”的法国改良主义哲学家蒲魯东的論点的斗争。从1870年起，科学共产主义学說就已深入国际工人运动，而国际工人运动中空想主义的和腐化的“領袖”們的假面具也就逐漸被揭穿了。

在这个时期受到侵略的法国，国内还没有有组织和隶属于国际的工人政党。波拿巴主义的統治者，由于害怕人民起义，不敢征集群众入伍，宁願让法国淪陷在普魯士軍队的占領下。色当投降后，巴黎的工人于1870年9月4日坚决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是执政的还是投降政府的一些部长和“新暴徒”（馬克思語）。

“共和国”政府不但不同人民一起去抗击向巴黎进軍的侵略者，却派梯耶尔去游說“欧洲各国朝廷”，恳求他們出面調解，甚至把年轻的共和国改成君主国作为他們斡旋的交换条件。

在巴黎围城中，曾经宣誓决不投降的“国防政府”，于1871年1月28日同包围者締結了停战协定。

人民由于饥餓已经忍无可忍，加上他們不同意梯耶尔所接受的和平条件，所以一看到在波尔多开会的国民議會企图复辟王权，就馬上起义了，国民自卫軍也拒絕按政府要求放下武器。1871年3月18日，革命爆发了，投降政府在巴黎宣布成立公社时

<sup>①</sup> 馬克思：《共产党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4頁。——譯者）

逃到了凡尔赛。

以后列宁在指出“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須做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社員的革命经验而做出的”<sup>①</sup>的时候，断然肯定：“一方面要使法国摆脱德国的侵扰，求得国家的解放，同时要使工人摆脱资本主义制度，求得社会主义的解放。两项任务这样結合在一起就是公社最突出的特征。”<sup>②</sup>

馬克思在他替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撰写的宣言中，指出巴黎公社的特点說：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軍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負責，随时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階級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議會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換的負責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門的官吏也是一样。

“从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員，都只应領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級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給他們的办公費，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連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創議权都已轉归公社。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軍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侶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剝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們

---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9頁。——譯者）

② 列宁：《公社的教訓》。（參閱《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53頁。——譯者）

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像他們的前輩即使徒們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

“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費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

“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見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們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諂媚的假面具，而他們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員一样，他們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負責，并且可以撤換。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給生产者的自治机关。”<sup>①</sup>

公社社員們在领导反侵略的爱国斗争中毫不犹豫地让一个德国人担任他們的劳动部长，让波兰革命者站到巴黎保卫者的最前列，表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

但是，被他們放走、随后在凡尔赛拼凑起来的梯耶尔政府，却利用公社的寬法免刑，准备了野蛮的反扑。被撤职而未加以关押的警察和特权者都投奔了糾集有一支十万人镇压部队的凡尔赛派。他們对巴黎进行了多次袭击，并且在凡尔赛毒刑拷打和枪杀由于叛徒出卖而被俘的公社人員。公社社員只是为了保护这些被俘人員的生命才不得不抓一些人质并进行报复。

1871年5月28日，经过最后一周激烈战斗之后，巴黎公社的最后一批保卫者都战死在别利維尔和梅尼蒙湯的高地上。敌人对战士、妇女和儿童实行了最残酷的屠杀，他們甚至在拉歌茲神

<sup>①</sup> 馬克思：《法兰西内战》。（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 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8—359頁。——譯者）

甫公墓用机枪扫射来处死战败者，那里的社员墙至今还可以证明，在无产阶级想要求自己的权利的时候，资产阶级是多么残酷无情。

巴黎公社，由于它姑息敌人，让敌人在自己身边组织起来并在巴黎进行阴谋活动，由于它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的黄金——那时公社正缺乏黄金，由于它没有把私人工业企业收归国有，最后失败了。但是，它这种英勇的结局，也突出地表现了使公社取得政权的革命的大公无私的性质。

巴黎公社主要的缺点是缺乏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的领导。

蒲鲁东派的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合法主义倾向，同布朗基派的宗派主义一样，都是巴黎公社的先天致命伤。前者过分顾虑人民敌人的舆论和宣传，后者惯于玩弄阴谋，并让一小撮“坚定的”人代替群众决定一切。

但是，正如列宁所说：“不论公社的牺牲多么大，公社对无产阶级共同斗争的意义已经补偿了这些牺牲。”

“公社在欧洲掀起了社会主义运动，公社表明了国内战争的力量，公社驱散了爱国主义的幻想，公社破除了对资产阶级的全民族意愿的天真信任。”

“公社教导欧洲无产阶级具体地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sup>①</sup>

刚同德国签订了和约的“国防政府”前部长儒勒·法夫尔<sup>②</sup>倒是一点也不含糊，他竟于1871年6月6日向欧洲列强发出通知，要求“彻底搜捕国际工人协会会员”。

胜利的资产阶级虽然害怕真正的革命政党会组织和领导新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这里的引文是从《公社的教训》中查到的，见《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55页。——译者）

② 儒勒·法夫尔（Jules Favre，1809—1880），法国国防政府和梯耶尔政府的外交部长。——译者

的革命，却以为这次镇压所使用的血腥暴力足以使无产阶级安静几十年。

完全不是这样。

巴黎公社被镇压下去几星期后，巴黎马车夫行会就举行了罢工，接着珠宝匠行会也举行了罢工。

1872年，在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法令公布后两个月，诺尔省和加来海峡省的矿工发动了罢工，这次罢工也遭到梯耶尔政府的残暴镇压。

尽管工会遭到取缔，强大的工人运动仍然发展起来，到1876年，终于迫使政府大赦了公社社员。

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不久的儒勒·盖德，一度逃亡到瑞士，从瑞士回来后即同马克思主义分子一起进行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活动。

1876年10月2日，即公社失败后五年，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三百六十人，代表着一百多万工人。1877年，社会主义的报纸《平等报》出版。

1878年1月，在里昂召开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通过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原则。

1878年9月，盖德和他的朋友们因意图召开一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被捕，判处六个月监禁。

盖德在圣佩拉纪监狱里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纲领”，以后这个纲领到处流传，得到五百个著名的工人积极分子的签名。

盖德获释后，立即以这个纲领为基础，在全国各地进行巡回讲演，最后，1879年10月，在马赛召开了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出席的有四十五个城市的代表，会上建立了法兰西工人党。

从此，继承了本章简略叙述的优秀革命传统的法国阶级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二、从法国工人党到工人 国际法国支部

馬賽工人代表大会(1879年10月)以后,儒勒·盖德认为,主要由工会组成的新政党迫切需要一个政治纲领。特别是在临近1881年大选的时候,党的各级组织只有依据这个政治纲领才能进行团结和斗争。

于是他前往伦敦,会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里还遇到已成为他们的优秀学生的保罗·拉法格。

《工人社会主义纲领》的理论性的导言是马克思亲自起草的。

导言指出:无产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必须集体地占有目前为剥削者和资本主义国家所掌握的一切生产资料(工厂、土地、银行、船只、资金,等等)。<sup>①</sup>

无产阶级只有在组织坚强的工人党的领导下,利用包括普选在内的它所能利用的一切手段进行革命活动,才能占有上述生产资料<sup>②</sup>。

1880年11月,在勒阿弗尔第四次工人代表大会上,尽管有机会主义合作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同盖德和拉法格共同拟定的这个纲领还是通过了。

已经分化的工人党由于它的不调和精神和宗派主义,在1881年的大选中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于是改良主义者乘机宣扬说:必须保存原来的制度,通过“逐步的改革”使之改良。无政府

---

① 参阅马克思:《法国工人党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4页。——译者

② 同上。

主义者脱离了党，同时，他们宣称工会斗争是唯一的道路。党内反马克思主义的头子之一布鲁斯创办了《无产者报》，同党的机关报《平等报》对抗，进行反对盖德派的宣传，他否认纲领的价值，认为它是“从伦敦大雾中带回来的强加于党的统一纲领”。

这些反马克思主义者大部分因为巴黎公社失败本来已经心灰气馁，现在又因大选中只获得六万选票而更加垂头丧气，于是他们主张每个组织要根据可能性自由制定自己的纲领。“可能派”从此产生了，以后他们在1882年9月圣太田第六次工人代表大会上制造了分裂。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盖德派由于布鲁斯、马隆等而变成了少数，在一百名代表中只占二十三名，于是他们退出大会会场，到罗昂去另建了“法国工人党”。罗昂的建党大会驳斥了可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工会“独立”和“不问政治”的论点，宣布“工人党的义务不仅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罢工，而且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组织和领导罢工”。

工会组织开始“单独”组成了全国性的联合会，无政府主义分子，在塞巴斯提安·富尔、马拉太斯塔、克鲁泡特金、格拉弗等“理论家”的影响下，窃据了联合会的领导。前盖德派佩路捷、普惹等居然“向政治”宣战，使工会运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于盖德派未能关心受多数派影响的革命工人和未能利用可能派的内部分歧而感到遗憾，但是他们对于盖德派在根本问题上的不调和精神还是赞同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它本身也发生了分裂）的其他支部中，不断地支持法国工人党的立场，反对可能派，因为可能派的“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主张逐渐地取得市政府、保险基金会、公务机关等等，“以便逐步实现革命”。

1882年10月，盖德和拉法格因在蒙吕松举行的群众大会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以“煽动内战”罪被送交重罪法院。

对他们的审讯(1883年4月)，成了一次新的宣传革命的机会。盖德在以后曾这样说：

“就对付我们共产主义的结论来说，派警察逮捕我们和让法官审判我们，要比找一些论据来驳倒我们容易。”

他们两人利用两次在圣佩拉纪监狱中度过的六个月时间，根据三年前马克思所写的导言的精神，起草了《法国工人党党纲》。这个《党纲》捍卫了革命改造社会的论点，指出可能派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已在不久前逝世，弗·恩格斯同意了盖德派的纲领。

1883年法国工人党代表大会(在鲁贝召开)由于只有代表六十个地方小组的二十六名代表参加而失败了。以后就决定：在党的组织和影响还未巩固之前，不再召开年度代表大会。

事实上，以后可能派的“多数派”越来越削弱，无政府主义派的工会也逐渐四分五裂，而法国工人党则不断壮大，很快就成为最有影响和最巩固的社会主义组织。

可能派分裂成一些相互敌对的小集团，相形之下，法国工人党的进展更显得突出。布朗基派也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中央革命委员会”。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转向社会主义，形成了一股潮流。激进党议员饶勒斯开始转变了。1885年由激进党提名而当选为议员的巴斯利和卡梅利纳也参加了法国工人党。

为了庆祝这种进展，国际工人协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协会分裂后剩下的机构，决定委托法国工人党负责组织定于18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召开的国际代表

大会。

可能派方面，也决定于同日在巴黎召开第一国际脱党分子的国际代表大会。

盖德派组织的代表大会会有很多国家的代表参加，主要是德国的八十名代表。第二国际就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诞生的。

这次代表大会决定，每年在同一日期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工人示威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和其他一些要求。

提出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决议中说：“鉴于美国劳工联合会1888年12月圣路易代表大会上已经决定于1890年5月1日举行类似的示威，兹决定5月1日为国际示威日。”

这个口号吓坏了资产阶级。

一家资产阶级报纸后来写道：“在一些往常活跃喧闹的市区里，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冷清和沉寂。”<sup>①</sup>

1890年4月30日，政府在试图逮捕儒勒·盖德以后又公布了规定好的兵力部署，以便阻止任何示威游行，还特别明确了发给每个士兵的枪弹数量，必要时弹药兵可以再予补充。

有好几个团队调到巴黎来加强警戒。共和国近卫军全部编入塞纳省的宪兵队。

中央警察大队派五百名警察守卫和协广场，派一百名警察守卫马德莱纳广场，准备攻击任何小规模集会。

1890年5月1日十四时，预先组成的代表团，不顾这些威胁性的布告，在成千上万站在窗口和走廊上、站在马德莱纳教堂前空场上的群众的注视之下，走出罗亚尔街的摩拉尔酒店，向众议院行进。代表团包括社会党的众议院议员、市议员及工会代表，共十二人。其中一个衣着朴实、穿工人节日服装的是费林，另一

---

<sup>①</sup> 《世界画报》，1890年5月10日。

个穿农民青色罩衫的是梯弗里埃，博丹穿短装，瓦扬和费鲁耳戴着高筒礼帽。没有任何人拦阻他们。从前是巴黎公社的将军、现在是社会党瓦尔省议员的克吕泽烈，于波旁宫<sup>①</sup>栅栏门前，在死样的寂静中接待了他们。议长弗洛凯不得不接见他们，并承认他们的代表资格。他们带着八十二份请愿书，上面都签满了赞成“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名字。工人们突然涌上大街，任何障碍也阻挡不住这支波澜壮阔的游行队伍。

在同警察冲突的过程中，有些妇女和儿童被打倒在地上。示威的人们也用木棒打了警官巴科。

有三百人被捕，其中一百人被拘禁。这一消息又引起了一次大示威，当天晚上，在巴黎各区有八十多个地方举行了群众集会。

吓破了胆的“有钱的老爷们”，为了“防备万一”都逃出了首都，但是他们打算错了，因为外省也在举行示威：

马赛有五万人示威游行，里昂有四万人，鲁贝有三万五千人，里尔有两万人，加来有一万五千人，波尔多有一万二千人，兰斯有一万人，翁热有一万人，土伦有六千人，特鲁瓦有五千人，等等。有一百三十八个城镇或地方举行了示威游行，从卢瓦尔矿区到加尔矿区，处处都完全停止了工作。塞特港口的船，没有一只卸了货物。

在巴黎决定的第一次五一国际劳动节示威游行，使人们看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站起来了。

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分子开始对法国工人党的进展感到不安，他们策划一个以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纲领为基

---

<sup>①</sup> 波旁宫(Palais Bourbon),法国国民议会会址。——译者

础的重新統一。米勒兰千方百計地迎合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右派、可能派、“阿勒曼派”以及深得列諾得尔、爱尔威和拉加尔代勒等人贊賞的“自治联合会”。

他們的行动終於影响了盖德派，使盖德派不知不觉地远离了馬克思主义原則。

1891年5月1日，虎視眈眈的反动派进攻了，那一天爆发了多次冲突，在克里希(塞納省)双方都开了枪，在富尔米(諾尔省)也有武装冲突；死亡十人，受伤七十人。

法国工人党意识到必須爭取农民群众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便在1892年的馬賽代表大会上拟訂了“党的土地綱領”。

这一綱領得到处境极为困难的农业工人和个体农民的拥护，也得到恩格斯的贊許。这个綱領帮助法国工人党取得了1893年大选中的胜利。

盖德对这次胜利估計过高了，因而必然要犯极严重的錯誤。

资产階級报纸发动了一次攻势，誣蔑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是“无祖国的人”，是“德国的代理人”。盖德对此害怕了，就設法使法国工人党通过了下述決議：

“法国一旦受到攻击，法国工人党的社会主义者是最坚决的保卫者。”

第二年，他对馬賽代表大会通过的正确的“土地綱領”作了机会主义的修改，企图爭取更多的农民的选票，甚至想爭取那些剝削农业劳动者的人的选票。

恩格斯立即譴責了“这种直接违反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行为”。

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右派分子利用这种分歧渗入了法国工人党，并竭力利用党的影响和它在选举中的胜利，企图把党引上改



良主义的道路。

盖德派領袖們同意放松紀律，允許党内出現不同的傾向，这就注定了法国工人党的瓦解。

1896年，在圣芒德(塞納省)的一次宴会上，米勒兰实现了他搞了五年的陰謀，使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同意“通过普选夺取政权”的論点。右派“独立社会主义者”，依靠他們自己在选举中的胜利，終于使法国工人党放弃了它的基本目标。

三年后，1899年6月，“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同意了和屠杀巴黎公社的劊子手加里腓一起参加瓦德克·魯索的政府。

革命的工人憤怒了，他們團結在盖德和像瓦揚那样的布朗基主义者的周围，組成了新的“法兰西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而贊成米勒兰并同意和資產階級政府合作的“內閣主义者”，則組織了一个法国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

早已放弃了激进主义并被塔尔訥省拥护社会主义的工人选为議會会員的饒勒斯，很快就成了“法国社会党”“內閣主义者”的領袖。

盖德虽然犯了机会主义的錯誤，但他仍然忠于建立一个无产階級共和国的思想。饒勒斯回答盖德說：

“爭取社会主义，現在只有一个有效的方法：这就是合法地爭取大多数。”

盖德虽然仍旧反对階級合作和通过普选爭取社会主义的錯誤論点，但是他却不像饒勒斯那样善于联系人民群众。饒勒斯是个有才能的演說家。工人階級对于他割断与資產階級出身的一切联系而轉向工人階級感到十分滿意。他的報紙——1904年創办的《人道报》，有着很大的影响。

盖德派、布朗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采取了同样的宗

派主义的态度，結果使他們更加陷于孤立，而饒勒斯派的影响却越来越大。

此外，1902年在工会代表大会(蒙彼利埃)上成立的法国总工会(劳动总同盟)，已经同盖德派断絕关系。在1893年有二十二万三千工人参加罢工的工会运动，現在只有十三万三千人，在工人阶级中占极少数。

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案件<sup>①</sup>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怒。盖德对这一案件却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他說：

“让资产阶级去互相吞噬吧；鼠疫和霍乱都不是好东西！”

可是饒勒斯毫不犹豫地领导了抗議运动，他的声望因此更提高了。

盖德派和它的領袖同时衰老下去，不久就被改良主义者“吞并了”。

党员人数較多(一万七千名)的法兰西社会党在同意让它的議員同有右派傾向的議員共同組成一个社会党議會党团之后，又无原則地接受了同法国社会党(党员一万人)合并。

1905年4月25日，盖德派和布朗基主义者同改良主义者，甚至同反馬克思主义者，在巴黎寰球大厅联合起来。

于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誕生了……

### 三、从社会爱国主义到神圣同盟

二十世紀初，当法国社会党統一的时候，大工业的发展还是緩慢的，因此，还存在着人数众多的中間社会阶层。

---

<sup>①</sup> 1894年法国反动軍人依据捏造的間諜罪和叛国罪，对犹太籍軍官德雷福斯判处徒刑。此案发生后，成了当时法国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斗争的中心問題。到1906年，德雷福斯终于被宣判无罪并复职。——譯者

农村的主要所有制是分散的小农所有制。农村人口在数量上多于城市人口。

小农虽然負債累累，并且已经面临土地被剝夺的威胁，却还不是一无所有。

至于工人，大部分是在行业很多而每家只有几个伙計的作坊里作工。这說明在小企业里行会思想占有統治地位。另一方面，集中在大企业里的工人，因被迫遵守过份严格的紀律而引起的一种反抗思想，使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潮有了市場。

总工会的干部頑固地把所有政治活动家都看作“一路貨色”，統一的社会民主主义派的机会主义傾向更助长了他們这种頑固性，并使他們在工会中更加孤立。

为了反对年轻的法国社会党的議會主义，1906年10月召开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亚眠宪章”，宣布总工会“不靠任何政治派別，为消灭雇佣階級和雇主階級”而斗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从法国社会党改良主义者的机会主义思想中得到了武器，他們认为：工会是唯一的工人組織，在目前，有了工会一切都可以解决；在将来，工会是未来无产階級社会的骨架。

因此，总工会派实际上同他們所譴責的改良主义者是殊途同归的，他們主张：一旦所有的工人都参加了工会，一次总罢工就能使資本主义让位給他們。

因此，在总工会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領袖們看来，加强工会就是未来无产階級社会逐步发展的基础，而为了建立未来的无产階級社会，既不需要政治組織，也不需要革命。

不久列宁就指出：“在工人运动中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sup>①</sup>以后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列宁

<sup>①</sup> 参閱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頁。——譯者

的正确。

資本主义的集中是依靠銀行的支持而完成的。銀行掌握着全部財政資本，它促使小商业、小企业、小农戶因負債而破产。

这些銀行是被收买的新聞界的主宰，它們通过狡猾的宣传吸收那些靠利息为生的小有产者的資金，同时为抵銷革命的思潮而宣传下述思想：“法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法国是1789年思想的搖籃”，等等。

教会假装服从共和主义的法律，实际上帮助散布“世俗的和民主的”幻想，企图欺騙最穷苦的阶层。

大資產階級，通过大权在握的激进社会党，掌握着国家命运。激进社会党虽然离小資產階級政党的本性越来越远，但还继续得到民主人士的同情。

这个伪装的、善于籠絡人心的反动政党，巧妙地利用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又許願，又收买，并打着民主的幌子，实行真正的独裁。

然而，社会党还从它革命的历史中保持了某些无產階級的传统，这些传统使它反对它与之合作的政权。

1907年春天，南部葡萄种植区的农民和农业工人进行了“抗稅罢工”之后暴动了。調去鎮压的貝济埃第十七步兵团举行了起义，站在罢工者一边。

饒勒斯和社会党議員发动一次伟大的斗争来反对“恢复摩洛哥秩序”的远征。但是，饒勒斯一方面譴責了“資本主义强盜們准备的大規模的掠夺性远征”，另一方面却又承认有必要把欧洲“和平的”文明的好处帶給摩洛哥的落后民族。

这种立場同样表現在威胁性的阴影已开始籠罩欧洲的帝国主义战争問題上。1907年9月，饒勒斯参加了在斯图加特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

罗莎·卢森堡以俄国代表团和波兰代表团的名义說：“一旦战争爆发，我們的任务不仅要鼓动群众尽速結束已经发生的战争，而且要利用战争来加速統治阶级的崩潰。”①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決議向世界无产者指出：“将要爆发的战争既不是民族战争，也不是正义战争；而是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決議确认“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讲保卫祖国的原則只能欺騙人民。”②

然而，饒勒斯在第一次汇报中竟宣称：

“不可能有誤解！国际社会主义者在斯图加特表示反对战争，拥护民族独立，但同时也贊成民族自卫。”③

因此，当饒勒斯大声疾呼地号召无产阶级起来要求成立一个“国际法庭”来进行仲裁和防止战争的时候，列宁駁斥他說：“这样的法庭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机构”，列宁还揭露了“这种只能导致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战争政策面前投降的和平主义幻想的危险”。

夏龙代表大会实际上同意在任何地方同自称“左派”的一切政党或候选人联合竞选，因而后来在1910年的大选中，社会党議會党团的議員从三十人增加到一百零三人。

盖德派也堕落到“保卫祖国”的合法主义傾向的泥坑中去，像論战家馬賽尔·桑巴和不可制服的反爱国主义者古斯塔夫·爱尔威那样的“左派”空談家，不久也追随盖德派了。

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应当在本国受到侵略时保卫祖国的論点有了发展，而且，思想上已经完全瓦解的法国社会党的議員和領袖們相信了帝国主义的宣传，他們事先就同意把敌人德国看

① 参閱列宁：《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4—65頁。——譯者

② 列宁—季諾維也夫：《反潮流》第2卷。

③ 同上。

作侵略者。

1914年7月，社会党和总工会的一部分领袖，感觉到群众在迫于眉睫的危险面前越来越不安了，才谈起反对好战主义，可惜已经太晚了。

古斯塔夫·爱尔威的《社会战争》和《工会斗争》号召工人于7月27日上街示威。因为政府宣布禁止这次示威，浸透了合法主义思想的这次示威的鼓动者，也就不再坚持了。

但是，资产阶级正在不遗余力地准备一场骇人听闻的战争，它把沙文主义的煽动推到了顶峰。

饶勒斯在一次演说中揭露了战争和战争的可怕，群众注意地聆听了他的演说。

尽管饶勒斯的和平主义理论——“如果祖国受到攻击，人民将被迫决定进行卫国战争”——同防御战争很相适应，资产阶级仍然害怕他的号召的效果。资产阶级是不高兴人们用血流成河的形象去代替战旗飘飘的形象的。

因此，资产阶级就诬蔑饶勒斯；由于他是和平主义者，就诬控他是听从德国人指挥的。对于反动宣传来说，所差的只是一件工具了。1914年7月31日，一名狂热分子杀害了让·饶勒斯。

接到总动员令的劳动者纷纷要求社会党说明：他们应该做什么，怎样才能制止战争。

鉴于工人群集在社会党各支部的办公处要求答复，社会党领袖们最后于8月2日在巴黎瓦格拉姆大厦召开了群众大会。

桑巴在大会上说：“你们要为保卫法国文化和人民的自由而战。”

龙格说：“如果明天法国受到侵犯，社会党人怎么能够不带头去保卫革命和民主的法国、1789年百科全书的法国、1848年6



月的法国<sup>①</sup>和饒勒斯的法国呢？”

宣战了。在饒斯勒的葬礼上，萊翁·石烏“以即将开赴前线的人——其中也有我自己——的名义”发表讲话，鼓动参加葬礼的劳动者去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爱德华·瓦揚也忧郁地要求工人宣誓“为祖国、为共和国、为革命而尽自己的天职”。以塞巴斯提安·富尔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随声附和。

各种倾向的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堕落到这种地步：他们同帝国主义者结成神圣同盟，拥护战争，背弃了自己的誓言。

他们的爱国狂热已经无以复加，连资产阶级最大的报纸《时报》都在1914年8月4日欢呼说：“我们对于爱德华·瓦揚和他的朋友们没有更多的要求了！”

《人道报》成了以工人阶级为对象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喉舌，说什么“1914年应征入伍的青年大概已经在兵营里钻研理论了”。

社会党议会党团——馬賽尔·加香也被牵连在内——一致通过了一个声明。根据这个声明，“不准有任何软弱的表现，从将领到士兵，都应该对胜利抱有坚定的信心”。

此外，儒勒·盖德和馬賽尔·桑巴都参加了神圣同盟的政府，社会党的党员参加了“保卫共和国委员会”，这样一来，在本来已经被多年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弄得不像样子的工人阶级队伍里，又播下了可怕的混乱种子。

首先发生了一些零星的反应，随后又产生了一个革命运动，但还不是有组织的。最初是罗尼省工会联合会派驻总工会领导机构的代表莫納特，于1914年11月公开声明退出总工会。

其他各色各样的、纯和平主义的反对派，也在这里或那里出

<sup>①</sup> 1848年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馬克思称这次起义为“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巨大的一次事变”。——譯者

現和发展起来，例如利木贊的《中部人民报》以及安省的《斥候报》就表示过反对意見。安省的《斥候报》在追述了爱德华·瓦揚参加过巴黎公社的事实以后，“要求公民瓦揚說明他过去和現在的态度互相矛盾的理由”。

在巴黎、里昂、格勒諾布尔和沃約納克斯，国际主义的宣传与和平主义的宣传都有所发展。馬克思主义的思潮首先在靠近瑞士的某些地区重新兴起，这并不是偶然的。在瑞士靠近我国边境的地方，有一个布尔什維克流亡小組，在列宁的领导下，开始进行革命失敗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以便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一名法国社会党女党员路易斯·索摩諾，参加了伯尔尼国际(妇女和青年)会议。以后她被捕了。《工人生活报》同五金工会联合会的前领导人联合起来进行反战宣传。

起初受民族沙文主义宣传蒙騙的其他一些人，不久也清醒过来，又回到了宣传鼓动工作开展起来的革命者的行列。

社会党内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力量，同坚持神圣同盟的人决裂了，然后就在大战正酣时期揭露并反对他們。

未来的共产党的基础，就是从1915年开始的这种有组织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的。

## 第二章

# 从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8）到 第三国际

### 一、齐美尔瓦尔得会议

革命失败主义者在1915年8月15日工会联合会代表会议上第一次大胆地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有八十一票赞成石乌所支持的神圣同盟的主张，二十七票拥护革命少数派，十票弃权。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是唯一没有堕入神圣同盟的派别，他们不顾困难，宣传关于战争问题的正确立场：“一个民族为了摆脱被奴役状态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一个民族为了打破帝国主义者的资本主义奴役或殖民主义桎梏而进行的战争，也是正义的战争。但是，欧洲目前进行的战争丝毫没有这样的性质。这次战争不是正义战争，它是为瓜分世界而争夺起来的帝国主义战争。瓜分土耳其、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并吞加利西亚，是沙皇俄国的战争的目的。夺取英法殖民地、统治近东、并吞乌克兰及波罗的海各省，是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的目的。在商业上和海上排挤德国的竞争、夺取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是资本主义英国的战争的目的。并吞萨尔、夺回阿尔萨斯—洛林、‘复仇’，是普恩加赛的法国作战的目的。这些都不是我们的战争的目的，也不是工人阶级的战争的目的。

“因此，社会党人的义务是无情地反对这种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说明了法国社会党人同第二国际其他政党一起堕落到

神圣同盟的原因。

列宁在提到法国社会党人放弃了阶级斗争和把社会主义并入资本主义时指出，“这种堕落不是偶然的。他们已经变成机会主义的党”。

列宁解释说：资产阶级依靠掠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大发横财，他们使“成为工人贵族”的社会党参谋部追随他们的政策。“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了社会爱国主义者，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

必须指出：即使在这神圣同盟时期，也有人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虽然这种声音还只是个别的。

德国国会中的社会党议员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一次社会党议会党团的集会上，投票反对军事预算，并敢于发出“敌人就在我们国内”的呼声。这一呼声后来成了在一切帝国主义战争中团结国际主义者的口号。

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进行国际革命活动的真正的组织，是从1915年9月5日至8日齐美尔瓦尔得(瑞士)会议时开始的。

瑞士社会党人格里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布尔什维克派的影响下，在意大利社会党(该党也同墨索里尼一起堕入了神圣同盟)左翼领导人的帮助下，召集了国际社会党人会议。

虽然意大利社会党革命派的正式决议只建议邀请不同意帝国主义政府战争预算的并始终忠于阶级斗争和国际团结原则的工人党派参加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但是，这次会议还是大大“扩大”了。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和德国“中派”的代表，也都被邀参加了会议。

法国的两名代表是：工团主义者梅尔黑姆和社会党人布尔德朗。

同德国社会党十名代表比较起来，法国代表团人数显得特

別少，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法国工人运动的混乱状态。列宁和季諾維也夫代表布尔什維克派。

在齐美尔瓦尔得會議上，革命的左派处于少数地位。

因此，列宁在1915年夏天所写的《社会主义与战争》这本小册子中提出的論点沒有被接受。

列宁主张每个国家的社会党都要为“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而斗争，主张利用政府的困难，变战争为革命，列宁答复和平主义者說：

“誰希望取得持久的民主的和平，誰就應該拥护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sup>①</sup>

然而，多数代表拒絕签署第二国际的死亡证书，虽然机会主义早已把第二国际引入神圣同盟了〔梅尔黑姆說：“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石烏和政府是三个头戴一頂帽子”<sup>②</sup>〕。

但是，齐美尔瓦尔得決議仍然是重要的第一步，主要是因为決議主张交战国工人党和社会党恢复联系。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萌芽，是民族沙文主义組織的裂縫。

抱着怀疑态度发言的梅尔黑姆和布尔德朗（“法国工人再也不相信任何东西，也不相信任何人；他們已经听膩了无政府主义和爱尔威主义的空談”<sup>③</sup>），回国以后，同意組織和推动“重建国际关系委员会”。

这个由齐美尔瓦尔得會議誕生的委员会的成員大多数是社会党右派或机会主义者，清醒的工团主义者，其中包括：梅尔黑

- 
- ①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5頁。——譯者）
- ② 列宁：《国际社会党人代表會議上的革命馬克思主义者》，參閱《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0頁。——譯者
- ③ 列宁：《国际社会党人代表會議上的革命馬克思主义者》，參閱《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69頁。——譯者

姆、洛利欧、莫納特、布尔德朗、罗斯梅、阿·杜努瓦、卡尔捷埃、馬里·麦佑和路易斯·索摩諾。这个委员会沒有接受严酷的教訓，它仍然分成政治派和工会派两派。这两派本身又都有各种不同的傾向。

委员会含含糊糊地要求“通过重建国际关系而取得和平”，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发号召，发表宣传和平主义的文章和提出反对镇压国际主义战士的請願书方面。

“重建国际关系委员会”虽然不主张建立任何集中的組織，也不主张在工厂和军队里展开群众活动，但是它促进了社会党革命少数派的发展。

当1915年圣诞节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即将举行的时候，好些省委会都支持同各国社会党，“甚至同敌国的”社会党重建国际关系的要求。表示这种态度的有上維也納省、伊澤尔省、罗尼河口省、沃克呂茲省和上馬恩省。龙格和普雷斯曼提出的一个含混的、机会主义的提案，阻止了左派的发展，他們还借口维护党的团结，使左派分子成了参加战争政府的叛徒們的尾巴。

然而，布尔德朗的动議仍然获得了七十六票(对两千七百三十六票)。

一件重要的政治事件出现在1915年的代表大会上。旁听席上的党员們唱起了战争开始后就再也听不到的《国际歌》。多数派气极了，威胁着要把这种“公众”赶出去。

在1916年4月9日全国委员会會議上，齐美尔瓦尔得派取得了进展。上一年圣诞节代表大会上贊成布尔德朗提案的七十六票变成了九百六十票，多数派获得了一千九百票。

这一成就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因为在九百六十票里，有許多龙格派的人。机会主义者害怕革命派，他們采取渗入革命派，使

革命派在思想意识上离开自己目标的做法。

因此，齐美尔瓦尔得派也染上了龙格派的社会和平主义的論点，这种毫无效果的論点，事实上支持了社会沙文主义。

龙格派利用全体劳动者和士兵希望和平的情緒，主张通过各交战国社会党議員参加內閣的办法来获得和平，以使互相接近成为可能。在人們吹噓这种主张的时候，战争继续进行着，而变战争为革命的宣传却被窒息了。龙格派主张通过“和平地社会化了的”帝国主义政府去求得和平，反对通过人民的行动来爭取和平。

法国社会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邀参加第二次国际社会党人會議的。

## 二、昆塔爾會議

第二次国际社会党人代表會議于1916年5月<sup>①</sup>24日到30日在昆塔爾举行，通常称为“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得代表會議”。

社会沙文主义多数派加紧活动，企图阻止會議的召开，至少打算让神圣同盟的部长們从中作梗，使最左傾的代表无法去瑞士。

因此，布尔德朗、梅尔黑姆和馬里·麦佑(教师工会)都沒能領到护照。

代表“法国”出席昆塔爾會議的是亚历山大·布朗、布里臧和腊凡杜让。这三位“昆塔爾的巡礼者”并非齐美尔瓦尔得少数派所委派的代表，甚至也不是这个少数派的“右翼”所委派的代表。他們是以私人名义、以省議員的身份参加的，他們連齐美尔

---

<sup>①</sup> 应为4月。——譯者

瓦尔得會議所主張的反戰活動同社會和平主義的活動都區分不清。他們深受龍格關於“崇高的法國”的論點的影響，為法國“反抗普魯士侵略的”民族自衛戰爭辯護。儘管如此，他們在群眾運動的推動之下，還是傾向於一貫的國際主義派。

昆塔爾會議上終於提出了第二國際破產的問題。第二國際的正式領導人以及會址設在海牙的社會黨人國際局執行委員會，都成了英法帝國主義的代理人。龍格去請求法國戰爭政府里的社會黨部長召開社會黨人國際局會議，這難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嗎？

第二次代表會議又向前進了一步，因為會議所通過的提綱畢竟是反對社會和平主義的欺騙的。

昆塔爾會議的討論和決議雖然還散發出和平主義的氣味，但決議中明確地指出了必須“立即結束社會黨人同資本主義戰爭政府的合作”，並且堅持各交戰國的所有社會黨議員有義務“投票反對用於繼續戰爭的軍事預算”。

會後，這三位代表信守誓言，拒絕投票通過有儒勒·蓋德、桑巴和托馬參加的法國政府所要求的新的戰爭預算。

在其他交戰國里，革命潮流也在擴大。

帝國主義者由於意識到他們的危險，了解到後方厭戰、發生兵變和士兵聯歡，就分別在本國發起“爭取正義和平”的籠絡人心的宣傳運動。

美國總統威爾遜於1917年初大聲叫嚷和平，德國的威廉二世和法國的普恩加賽也都隨聲吶喊。

威爾遜主義的這種籠絡人心的思想深入工人群眾，甚至連社會黨少數派也受到影響。大家看到，向威爾遜致“賀電”的，既有像石烏之流的右派分子，也有齊美爾瓦爾得派的梅爾黑姆、布里臧和臘凡杜讓。



于是，左派根据革命的反应进行了整顿，把梅尔黑姆和布尔德朗开除出“重建国际关系委员会”，因为他们给威尔逊总统捧场。

取得了委员会领导权的洛利欧，偕同拉波波特、马里·麦佑、卡尔捷埃、路易斯·索摩诺等人一起到瑞士去，与列宁讨论了制服少数派中右翼分子的办法。洛利欧在遵循列宁的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的意见的时期，正确地、有效地领导了反对战争和反对机会主义的革命斗争。

### 三、大战结束和第三国际的成立

洛利欧和列宁会见以后，在法国才提出了“第二国际死亡了；第三国际万岁”的口号。

这种见解，列宁早在世界大战初期就提出来了，不过当时还没有有人在法国社会党中传布。

洛利欧关于这个论题的第一篇文章是在瑞士法语区的革命报纸《新国际》上发表的。

第三国际的思想通过罗曼·罗兰创办的另一种瑞士法语刊物《明日》深入到法国。

列宁认为单是这种书面宣传还不够，于是派他的最亲信妇女干部印涅萨·阿尔曼德到巴黎去，责成她推动和整顿“重建国际关系委员会”的活动。

印涅萨·阿尔曼德组织出版和散发了一种叫做《齐美尔瓦尔得派社会党人与战争》的秘密小册子，在委员会内部建立了一个革命的核心，这个核心的任务是根据秘密小册子的纲领，把其他党员引导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这样整顿内部的核心力量逐渐使法国的齐美尔瓦尔得派采

取了明确的立場。这一核心的主要功績在于揭露了机会主义者(龙格派及其他),同时指出了机会主义者同真正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战士之间的距离。

列宁热烈支持这种活动,建議“法国重建国际关系委员会”“公布关于沙文主义社会党人和其他龙格派的真相,明确地提出必要的分裂的問題”。<sup>①</sup>

列宁还強調仍然留在“委员会”里的所謂“中派”分子的危險,指出“这些中派分子的作用是:当群众向左时,他們也往左轉,但他們的目的却是为了以后把群众再拉到右边去”。

这场严酷的世界大战的1916年冬季战役,造成了更多的死亡。司令部連老年人和极年轻的人都召去入伍,这批人一到前线,士气更加低落了。

1917年2月,响起了俄国革命的炮声,打倒了“全俄罗斯的沙皇”,为第三国际的拥护者的宣传工作創造了有利条件,因为俄国革命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是反对战争的一种斗争方法。

法国司令部为了緩和群众的急躁情緒和防止叛变,宣布說:春季大攻势将結束战争。

这就是什曼代达姆<sup>②</sup>攻势,在这次攻势中,政府为了挽救它的国际威望,狠心地叫好几万法国士兵当了机枪扫射的目标。

《齐美尔瓦尔得派社会党人与战争》这本小册子对于最初在前线爆发的兵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思想传布得很快。最初是个别的、零星的违犯紀律或反抗行动,以后就出现了整师整师的兵变,拒絕打仗,成群結队返回巴黎。成群的逃兵被枪毙,被用机枪扫射,甚至还遭到七五炮的轰击。

① 列宁:《論法国反对派的任务》。(參閱《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3頁。——譯者)

② 法国安納省山脊上的公路。——譯者

后方，1916年秋天开始的罢工又爆发了，而且越来越频繁。1917年有二十九万四千人参加了六百九十六次罢工，而且主要发生在巴黎冶金工业、銀行和大百貨公司。

1917年5月1日，举行了一次“拥护俄国二月革命”群众大会，一万名示威者呼吁“起义的人民推翻阶级政府，建立由工人代表和转向人民的士兵代表组成的政权”。

同一天，瓦郎斯子弹工厂的工人宣布罢工。圣太田和波尔多爆发了严重的骚乱事件。5月30日，雷诺汽车公司的三万名五金工人在比朗库尔停止了工作。6月，罢工运动扩大了，而且进展很激烈，连巴黎的警察也提出了权利要求书，年轻的时装女工也列队拥向爱丽舍宫。

从1917年5月30日到6月15日，军队中的兵变波及一百一十五个作战单位，其中有七十五个步兵团、二十三个狙击兵营、十二个炮兵团。驻在克弗尔的第三百七十步兵团，整团都开往巴黎。镇压是很残酷的：五分之一的人遭到枪杀。

德国海军也发起兵变响应。

这时候，4月间回到俄国的列宁正在不顾孟什维克的反对而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并使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多数。

在彼得格勒，历史向前跃进了一步。

1917年10月25日晨，《阿芙乐尔号》的水兵响应列宁的号召，炮轰了“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同时，革命军队占领了车站、邮电局、国家银行。

胜利的突击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

在1917年10月苏维埃革命的影响下，尽管有惊慌万状的资产阶级拼命宣传，法国的群众运动仍然更加广泛地发展起来。

布里藏和馬賽耳·卡皮創办的《波瀾报》，虽然不是革命的喉舌，甚至还标榜着“和平主义、工团主义和拥护女权”，但是它

在刊登士兵們从战壕中給报館写来的信件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該报印数增加了，报纸在前线发行达数万份，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給报館写信的士兵是很多的。

政府对《波瀾报》进行新聞检查，但不敢禁止它出版。政府认为該报思想模糊，又兼宣揚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义，可能会防止更危险的革命思想的发展。然而写信的士兵和該报的讀者却从讀报中得出革命的結論，因为該报成了战争反对者的真正的“联络员”了。

洛利欧集团也发行了《平民报》，支持正确的革命立場，发表列宁的文章和年轻苏維埃国家的文件。

士兵和劳动者讀到苏維埃的法令非常激动，因为这些法令废除了地主所有制，把土地交給“耕者”使用，沒收資本家的財產。

年轻的苏維埃共和国，由于協約国拒絕它的和平呼吁，而頒布了第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法令——和平法令。通过布列斯特—立托斯克条約，苏維埃俄国結束了同德国的战争，从而取得了組織苏維埃政权所必需的喘息時間。

資產階級宣传进行了更加猖狂的攻击，把“布尔什維克”比做“德国鬼子”。可能当部长的社会党人曾經派出代表团到俄国去，“支持俄国人坚持到底”，現在他們决心支持反革命將軍們，甚至組織远征軍进行干涉。

各国的帝国主义者联合組成了反对苏維埃共和国的神圣同盟<sup>①</sup>。年轻的紅軍，在俄国人民和国际无產階級的支援下，一一打敗了干涉軍。

齐美尔瓦尔得派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几乎淹沒在各行各业

---

<sup>①</sup> 神圣同盟 (La Sainte-Alliance) 是1815年俄国、奥国和普魯士之間簽訂的同盟条約，目的在于反对欧洲革命和民族运动。这里指反动联盟。——譯者

的含混主义当中。

在1918年7月28—29日的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洛利欧革命派只获得一百五十二票，而龙格却以一千五百五十四票对一千一百七十二票，打败了列诺得尔派。

龙格勾结右派，成立了一个中派，来反对洛利欧的齐美尔瓦尔得派。加香和勃鲁姆组成的另一派，在准备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塞纳省联合会上获得了八百四十五票（洛利欧得九百二十二票，龙格得五千九百九十九票）。

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于1918年10月7—8日召开。会上多数通过了一份致威尔逊总统的贺电。大部分齐美尔瓦尔得派也跟着同意了，同洛利欧一起反对的只有少数党员。他们的缺点在于没有象列宁早就向他们指出的那样，揭露龙格这个大喊拥护苏维埃却坚决反对成立第三国际的分子。

手足无措的洛利欧又犯了更多的错误。为了避免孤立，他同意了他认为包含在龙格派提案中的“某些真正反对战争的建

议”。最后，洛利欧发表了一个始终被党员所抵制和轻视的原则声明之后，又同意了一项既不谈成立第三国际的必要性、又不谈十月革命的提案。他接受了党的副司库的职位，自弃于革命的劳动者。革命劳动者认为洛利欧同龙格派妥协了，或者认为他的同意证明龙格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社会党人，要不洛利欧派怎么会同他合作呢。

正因为如此，龙格才得以在迷失方向的群众面前以值得群众信仰的社会党人自居，以俄国革命的朋友自居，以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敌人自居。但在实际上，他是又一次挽救了社会爱国主义者。

兵变继续发生。士兵听到德国水兵兄弟们兵变的消息越多，

就越拒絕战斗。尽管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誣蔑宣传，甚至說布尔什維克因为缺乏食物而醃嬰兒來吃，“十月革命”仍然指明了士兵們的斗争方向。

1918年春天，政府把一百二十万現役軍人部署在国内，在“后方”，以便“維持秩序”，其中有四个騎兵师——全軍共有六个騎兵师——是“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騷乱”的。以后騙取了寬厚声誉的貝当，无情地处决了一百五十名参加兵变的士兵。

帝国主义的統治者們，因为害怕发生一次世界革命，终于在1918年11月11日停战，結束了这场战争。

社会爱国主义者們召开了伯尔尼国际代表大会，企图复活第二国际，并抹掉永远刻在第二国际身上的“社会沙文主义”这一頁。洛利欧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据說是为了“利用这个讲坛来揭露渗入第二国际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并把真誠的社会主义者爭取到我們这方面来”。

列諾得尔、阿尔伯·托馬之流支持反对俄国革命的“干涉主义者”。加香和勃魯姆领导了一个“中派”，而龙格派則继续混用籠絡人心的“左”的詞句和社会爱国主义。

虽然列宁曾对龙格派說过：“請你們也饒恕第三国际吧！請你們不加入第三国际来为它造福吧！”<sup>①</sup>但是，像布里臧、布朗和韦尔弗依这类分子还希望洛利欧派革命者同龙格的“中派”联合。虽然这样，他們却是坚决拥护参加第三国际的。

战争刚一結束，就有一支强大的工会力量大大支援了俄国革命。已经摆脱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加斯頓·蒙穆索，发起了一次反石烏神圣同盟工团主义、拥护齐美尔瓦尔得立場的宣传运动。他在铁路工会联合会中得了四万九千四百五十八票，

<sup>①</sup> 列宁：《在布拉古舍—列弗尔托沃区非党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4頁。——譯者

对方是十万六千七百一十票。

尽管因复員回来的新会员增加而造成了思想混乱，所有的工会联合会还是都参加了少数派的这次运动。

生活費用高涨、法郎貶值、煤荒、运输危机和电荒，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要求权利运动和政治运动。

由于克里孟梭政府释放了刺杀饒勒斯的凶手，1919年4月6日在巴黎举行了有三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有些复員軍人把他們的軍功章丢在饒勒斯雕象的脚下。

政府害怕了，于是通过了拖延达十年之久的八小时工作制法律。

派去干涉苏維埃俄国的法国軍隊受到革命的宣传鼓动的影响，同布尔什維克工农兵之間的联欢活动越来越普遍，以致克里孟梭政府终于从俄国撤回了法国軍隊。

在俄国布尔什維克倡議下，在波兰、奥地利、匈牙利、芬兰和拉脫維亞等国共产党以及美洲和巴尔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国际代表大会，打算建立一个“世界革命党”。

有三十五个政党和組織同意派代表团参加大会。各代表团的代表資格都经过仔細审查。为了挫敗各种反对意見和阴谋，列宁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直到最后一分钟，爭論一直很激烈。当一切障碍似乎都已消除了的时候，德国代表埃貝尔莱因却要求推迟成立新的工人国际，他的借口是欧洲真正革命的政党还太少。

虽然匈牙利和巴伐利亚还没有正式成立苏維埃共和国（两星期后才成立的），但是，要在这两个国家成立苏維埃共和国的消息却对爭論起了决定性作用。

最后，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瑞典社会民主党、巴尔干社会

民主主义革命工人联盟和匈牙利共产党，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推动下，通过它们的代表拉柯夫斯基、格魯伯、格里姆隆德和魯德年斯基，提出了下列提案：

“(上述)各党代表建議成立共产国际。

“1. ——爭取无产階級专政的斗争，要求全世界所有接受这一纲领的共产主义者，共同建立一个統一的、坚决的国际組織。

“2. ——現在，建立共产国际的需要更加迫切，因为目前在伯尔尼，以后还可能在其他地方，有人试图恢复旧的机会主义国际，并将无产階級内部一切思想混乱、犹豫不决的分子全部糾集在它的周围。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无产階級必須同社会主义的反叛分子断然分裂。

“3. ——如果正在莫斯科举行的會議不成立第三国际，那就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各国共产党并不是团結一致的。这将削弱我們的陣地，并使各国无产階級中犹豫不决的分子，思想更加混乱。

“4. ——因此，組織第三国际，在历史上是絕對不可避免的，正在莫斯科举行的會議必須使之实现。”<sup>①</sup>

这项提案，除去德国代表的五票以外，获得一致通过。

经过两天的討論，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4日誕生了。

1919年4月16日，被派往黑海去反对苏維埃人的法国舰队上的人员发生了兵变。

勒普罗太号的輪机軍官安德烈·馬尔梯企图动員該舰投向布尔什维克。他被捕了，但大家都已知道了他的动机，兵变扩大了。法兰西号、瓦德克·魯索号、正义号、让·巴尔号、吉尚号等

---

<sup>①</sup>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提纲》。



軍艦都发生了兵变。吉尚号的兵变是水手长夏尔·狄戎领导的。

这里，水兵拒絕向法国国旗敬礼，那里，唱着《国际歌》教訓那些傲慢或威胁人的軍官。兵变者的代表团从一个軍艦到另一个軍艦，进行协商。在陆地上，同俄国布尔什維克取得了联系。

4月20日，当三色旗<sup>①</sup>在法兰西号舰尾升起，軍官們立正致敬时，水兵們却在舰首向一个水兵緩緩举起的紅旗致敬。

兵变代表武勒曼、杜布利埃、諾塔、狄戎等来見舰长并告訴舰长：舰上人員要求立即回法国去，不願同苏維埃人打仗。

黑海上的水兵們的行为是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第一次伟大的表現，他們证明了：他們能够扼住本国帝国主义的手，阻止它对一个自由国家的人民进行非正义的战争。

乌克兰士兵和黑海水兵的兵变在拯救年轻的而且还很軟弱的苏維埃俄罗斯共和国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参加兵变的水兵回到法国以后被海軍法庭判处了徒刑，但几年监禁并不能抹煞他們的历史性行为的意义。

應該提一下那时候的另一个伟大人物雅娜·拉布尔勃，她是一个到沙皇俄国来教姑娘們法文的“家庭女教师”。从十月革命第一天起，她就参加了革命。

她在敖得薩创办了一份法文报纸，“呼吁1871年公社社員的儿女們不要扼杀伟大的俄国革命”。同布尔什維克发生关系的法国士兵和水兵們，散发雅娜·拉布尔勃的呼吁书，这也是使（法国）政府决定“調回”軍队以免他們参加苏維埃革命的原因。法国司令部在敖得薩枪杀了雅娜·拉布尔勃。

同一时期，“重建国际关系委员会”在它的最革命的分子和

---

① 即法国国旗。——譯者

几个阴谋家的参加下，改组成为发动群众的“争取加入第三国际委员会”。

有些人利用战后的贫困、为使复员军人就业而改组军事工业的困难等等，要求“没收发战争财和国难财的人的财产”。

频繁的罢工和示威，常常演变成流血的毆杀。仅在1919年4月一个月內，就有四十七名警察和十九名警官在激烈的冲突中被打死。

1919年5月1日，尽管社会党和总工会反对，但由于基层的压力，还是举行了示威。这个战后第一个五一节，具有声势浩大的政治总罢工的性质。

在巴黎，有五十多万人举行示威。调来镇压示威者的士兵，不是直接同示威者联欢，就是不执行命令。警察和龙骑兵被成千上万的工人撞倒、赶走。第二天警察局承认有四百七十名“警察人员”受了伤。有一个青年工人洛尔纳被打死。他殯葬时，有三十万人示威。

大街上的搏斗越来越剧烈，有时竟发展到建立街垒。沃克吕兹省的社会党議員亚历山大·布朗受重伤。万塞纳炮台的士兵譁变了。瓦扬·古久里和雷蒙·勒费夫尔率领几千复员军人，在和协桥上向派去镇压他們的士兵发出呼吁。于是骑兵插刀入鞘，步兵背枪上肩。

馬赛尔·加香开始意识到正确的道路，他就五一节骚乱問題质問了政府，五一节那天有很多示威者伤亡(也有六百名共和国近卫軍、四百七十名警察和两名警官受伤)。

黑海水兵调回后，加香又就“他們调回法国的条件”向政府提出质問。6月間，巴黎地区有二十万冶金工人罢工。

那时就已感觉到非常需要一个集中的工人政党。有了这样的政党，通过統一組織力量和进行正确的报道，就能无往不胜。

正是因为沒有这个政党，所以1919年5月那些英勇的罢工者对于黑海水兵起义、軍营发生兵变和外省自发的罢工运动才都毫无所知！

而各帝国主义政府却因此得以施展其干涉阴谋，并援助企图消灭苏維埃的“白卫”軍。

当时已经称为“共产国际”的第三国际发出号召，要求在全世界发动群众性的政治罢工，要求从俄国撤出外国軍隊，并声援年轻的匈牙利革命。

預定罢工的日子是1919年7月21日，劳动者对这一号召感到非常兴奋。

当时还在法国社会党“中派”手里的《人道报》被迫发表声明，要求停止对俄国的武装干涉和全面撤退仍在作战的法国軍隊。但是，在龙格派和法国总工会右翼领导人(石烏、杜木兰和梅尔黑姆)的支持下，中派分子终于破坏了7月21日的罢工。

“爭取加入第三国际委员会”的领导者們，主要是洛利欧、蒙穆索、卡尔捷埃、佩里加、腊迪斯、罗斯梅、哈斯費耳、馬尔梯內、考夫曼、肖夫隆、莫納特等人，他們沒有能够主动进行一次把社会党引向共产国际的討論。佩里加甚至还建立了一个“共产党”和它的报纸《国际报》，并径自申請参加第三国际。塞納省工团主义青年联盟、集体主义学生联合会、社会党罗尼省委会也效仿他直接申請参加第三国际。像布杜、昂克梯耳那样的捣乱分子也建立了所謂分支组织和他們自己的报纸《布尔什維克报》！甚至连某些无政府主义集团，如安德烈·吉腊尔集团及其《国际未来报》，也不能不向第三国际表示同情。

分裂的社会党是在思想混乱最严重的情况下——第三国际拥护者未能消除这种混乱——参加1919年11月16日的大选的，因而遭到了失敗(在八百多万选票中得到一百八十万票)。

社会党领导人在当选議員的人数問題(下降到六十八人)上大發議論,推說是选举方式不好,但是他們迴避討論得票总数减少表明工人階級对該党曖昧而又矛盾的政策感到失望、甚至感到厌恶这个問題。这个“統一的”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既有像勒費夫尔这样的革命者,又有像保尔·崩庫尔那样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样的党是不会使革命的工人感到滿意的。在工会运动中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利用了这种厌恶情緒,主张用弃权办法来反对机会主义者。

为了破坏群众运动,石烏提出了“連續浪潮”的策略,这种策略使罢工分散,并且妨碍普遍行动。政府借口“陰謀危害国家安全”,逮捕了十八名工人干部,說来也巧,被捕者中有反对石烏的法国总工会革命领导人和“爭取加入第三国际委员会”的领导人。

人民群众的压力非但没有因此降低,反而增大了,以致于当被告出庭受审时,都被宣告无罪,陪审团长甚至还为对他们实施未决拘留提出抗議。

“爭取参加第三国际委员会”虽然只在社会党党员中征求会员,但也得到党外的广泛支持,特別得到法国总工会中蒙穆索、韦尔雅、勒普提所领导的革命派及其周刊《工人生活》的支持。根据亨利·巴比塞、瓦揚·古久里和勒費夫尔的号召而成立的“退伍軍人维护共和协会”也支持“爭取加入第三国际委员会”。支持这个委员会的还有革命知识分子集团“光明社”。

1920年1月17日,共产国际向斯特拉斯堡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拍了賀电,并号召代表們“向所有背叛无产阶级的人公开宣战”。

当代表大会以絕大多数(四千三百三十票对三百三十七票)通过退出第二国际的时候,龙格派和中派却陰謀搞成了另一次

投票，贊成(三千零三十一票)重建第二国际……而拥护加入第三国际的人，因为未能明确地給以反駁，只得到一千六百二十一票。

然而，罢工运动还是“加强”了，1920年罢工一千八百三十二次，参加人数达一百三十一万七千人；而1919年罢工两千零二十六次，参加人数却只有一百一十五万。各次参加罢工的人数都增多了。

在馬尔梯、狄戎和其他黑海兵变参加者被判处数年苦役以后，又爆发了新的兵变，主要在布列斯特、土伦和图卢茲。

法国資產階級的報紙《晨报》在評述資本家因罢工而遭受的损失时写道：“战后的第一年，使我們受到的损失比战时的一年还要大！”

但是資本家只字不提他們使生活費用上漲了三倍，他們造成的煤荒和运输危机。

法国总工会的改良主义领导落在了分会的后边，这些分会团结起来，不顾领导的反对而采取行动。巴黎地区的二十九个工会组织，越过它们的全国领导机构，自行配合起来组织行动。1920年2月10日铁路工人罢工爆发时，参加罢工的有七十万人。

政府感觉到一个新的革命五一节实际上在酝酿着，就试图采用恫吓的办法。

陆军部长重复他的同事在劳动人民举行第一次世界性示威那天用过的語調威胁着說：“军队仍然是政府的力量。要知道，军队是荷枪实弹的！”

1920年5月1日，二十二万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

碼頭工人、海員、矿工、运输工人都支援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在馬賽，教师們第一次参加了工人的游行队伍，并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話。由自称“公民团结志愿队”的工賊駕駛的巴黎公共

汽車受到罢工者的攻击。警察开了枪，打死两名示威者。几乎普遍地自动停工了，1920年的五一节可以认为是法国无产阶级直到那时所经历的最有力量的一个五一节。

铁路工人的罢工运动，在其他行业“罢工浪潮”的支持下，继续到1920年5月28日。

1920年6月底，社会党斯特拉斯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去，以便“了解俄国革命的局势和寻求恢复社会党国际统一的办法”。

这个由馬賽尔·加香和安德烈·弗罗薩尔組成的代表团立即被邀請参加1920年7月19日在莫斯科开幕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且給了他們发言权。

## 第三章

### 法国共产党誕生

#### 一、图尔代表大会的筹备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秘书处欢迎两位法国社会党代表出席大会，并根据列宁的指示起草了一封《給法国社会党全体党员和法国全体觉悟的无产者的信》。

这封信首先提到法国社会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絕大多数决定退出第二国际——目前被全世界觉悟的劳动者看作“叛徒的组织”，但是对于以后又投票通过拖延执行的决定表示惊讶。

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秘书处指出，加香和弗罗薩尔的书面发言“已经用各种文字在共产国际的机关报刊上发表”，希望把秘书处的信也翻譯出来，在法国社会党的报纸上发表。

这封信着重指出法国資本主义充当了“国际宪兵”的角色，它“在组织反苏維埃俄国的掠夺性战争中也起着主要的作用”，它是“凡尔賽分赃条约的主謀者”，然后說明法国工人及其政党負有特殊的責任，“他們应该击退最疯狂的、最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进攻”。

信里继续說：“我們遺憾地看到，法国社会党内部的情况对于完成事态发展所給予它的历史使命是最不利的。如果我們說在四年帝国主义战争期間，除了德国以外，任何地方也沒有比在你們国家像你們党的前多数派那样卑鄙地背叛社会主义的話，

那么，法国的无产者是会同意我們的。

“前多数派领导人列諾得尔、托馬、桑巴等在1914年8月4日以后的行为，并不比德国的謝德曼和諾斯克之流的卑鄙叛变强多少。你們党的领导人不仅投票贊成战争預算，而且把党的一切报纸、党的所有组织机构用于为貪得无厭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效劳。他們帮助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駭人听闻的沙文主义的逆流。他們帮助了资产阶级在工厂里建立专制制度，废除保护劳方的最起码的法律。他們同意承担帝国主义的屠杀的责任。他們参加了资产阶级的政府。他們干出了协約国领导人所干的最骯髒的勾当。

“当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时，阿尔伯·托馬以党的名义接受法国帝国主义者的委托，到俄国来劝说俄国的工人和士兵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屠杀。法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帮助了已经向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宣战的俄国白卫軍发动进攻。

“至于你們党的前少数派，也从来没有对这个卑鄙的多数派进行有力而明确的原则斗争和革命的斗争，沒有把这种斗争看作一项神圣的义务。而在它成为多数派以后，仍继续奉行含混不明、軟弱无力的政策，继续走以前的机会主义路线。

“阿尔伯·托馬、列諾得尔、石烏等人，继续充当资产阶级仆从的令人痛恨的角色。在你們党的队伍中，不仅那些彻头彻尾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而且‘中派’的著名代表(龙格及其同伙)都一再肯定：1914—1918年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对于法国来说是一场卫国战争。”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秘书处的信在这样谴责了同帝国主义结成神圣同盟的残余并指出如果不驅逐沙文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党就不能重振之后，提出了下列几点具体意見：

“1. 法国議會中的社会党議會党团既不是无产阶级的，也不



是革命的。每个議員都自由行动而不听从党的命令。这个不准备革命的議會党团的机会主义在群众中引起了对一切議會工作的厌恶，只能造成并加深无政府主义的錯誤和偏見，使人轻视那些从事阴谋活动的議員，这些議員自称社会党人，而实际上，他們是工人階級死敌的朋友。

“2. 你們的日报，首先是《人道报》和《人民报》，都不是革命的无产階級报纸，因为在这些报纸里，我們看不到有貫穿着拥护无产階級革命的宣传，至多只能找到几句关于无产階級专政的干燥无味、毫无生气的話。你們的机关报同法国資產階級的机关报完全一模一样。你們把报纸的主要篇幅用于議會和資產階級圈子里的生活瑣事。这些报纸不会也不願成为激情沸騰的无产階級群众的革命怒火的真正代言人。

“3. 必須指出，你們对农民和士兵的宣传也是这样。要么是沒有，要么是十足的改良主义的宣传。你們的党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給法国士兵讲过他們的无产階級革命义务？根据我們的了解，你們沒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讲过这些。如果反动派的力量太强，使社会党人不能合法地进行宣传，那么，任何觉悟的无产者都應該用秘密宣传来弥补合法宣传之不足。

“4. 你們对待工会的态度也是完全含混的。你們不但不反对总工会領導人的社会沙文主义思想进行系統的斗争，而且还支持这种思想。当石烏等一伙人帮助資產階級在阿姆斯特丹重建黄色工会国际的时候，当这个石烏同阿尔伯·托馬去参加帝国主义組織的国际劳工會議的时候，当他們背信弃义地破坏1919年7月21日罢工的时候，你們都沒有向这些无耻的叛徒宣战，你們都沒有撕下他們的假面具，你們都沒有在全法国人民面前揭露他們的嘴脸。

“5. 法国資產階級監禁了洛利欧、莫納特、苏瓦林和一大批

其他同志。你們为击退法国資本家的这些进攻做了些什么？除了紙上空談以外，你們又怎样表示了你們对这些被捕同志的真正的、有效的团結一致？

“为什么你們不以实际行动去迫使米勒兰政府对你們采取同对洛利欧和他的朋友們一样的措施？

“为什么你們不敲警钟？

“6. 你們对待你們党的共产主义左派的态度也有很多可指責的地方。你們党的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对于共产主义者只是勉强地給他們开一个門縫，而对于社会爱国主义者則热情接待。《人道报》同《人民报》一样，拒絕刊登共产主义組織的付費的公告，却接受国債的广告。他們非但不設法同法国共产主义者接近，反而千方百計反对他們。

“7. 最后，讓我們看一看你們对待国际的态度。你們已经决定退出第二国际，而同时你們又宣布与比利时的‘社会党人’团結一致，也就是說，同第二国际的領導人、社会叛徒王德威尔得团結一致。共产国际最重要的文件在你們的报纸上一律不刊登。你們在递交到莫斯科的报告中，却继续解释你們不参加第三国际的原因是由于西欧最强的党还没有参加。但是你們不該忘記：如果你們說的‘最强的党’是指染有社会沙文主义的党，那么我們會答复你們說：我們不需要那样的党，我們絕不会接納它們加入共产国际。但是欧洲和美洲真正革命的政党是同我們站在一起的。我們不允許別人混入我們的革命队伍。共产国际应当永远成为共产主义工人的战斗的国际組織。”<sup>①</sup>

《給法国社会党全体黨員和法国全体觉悟的无产者的信》在結尾时提出了几点要求法国社会党进行革命改造的建議。建議的第八点說：“法国党也應該改变名称，应以法国共产党的姿态

<sup>①</sup>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轉載于1957年12月号《共产主义手册》)。

出現在全世界。”

这封信的要点已如上述，正式发信的日子是1920年7月26日。馬賽尔·加香和安德烈·弗罗薩尔研究了文件以后，打电报給《人道报》說：“依我們看来，参加第三国际势在必行。”

在1920年10月底的“別利維卢瓦茲”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以五千四百四十三票通过了青年共产国际代表沃耳尼的提案，决定参加共产国际，而累訥的改良主义动議只得到一千九百五十八票。阿尔薩斯—洛林的一千五百票全部贊成共产主义派的提案。

加香和弗罗薩尔带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接受法国社会党参加国际的“二十一条”回到法国。

在預定1920年12月召开的图尔代表大会的筹备期間，加香和弗罗薩尔到法国各地去举行群众大会，报告在苏維埃俄国訪問的经过。这次宣传激发了革命劳动人民的热情，而那些“重建第二国际的人”的影响显著下降了。

在預备性的省代表大会上，所有无产阶级占多数的省委会，除諾尔省和上維也納省以外，都表示贊成参加第三国际。

这种趋势在法国总工会中也有所发展，而且在10月奥尔良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現出来。在这次會議上，共产主义派获得一千四百八十五票，而石烏派却只有六百五十九票。

社会党塞納省委会以一万三千四百八十八票通过参加第三国际，龙格—保罗·富尔的提案只得到二千一百一十四票，勃魯姆—鮑利的提案只得到一千零六十一票。

## 二、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

准备具有历史意义的图尔代表大会的整个宣传工作，都是

围绕着共产国际提出的著名的二十一条进行的，这二十一条阐发了并且明确了1920年7月給法国社会党人和觉悟的无产者的“信”里所确定的立場。

二十一条的全文如下：

1. 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須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并符合第三国际的綱領和決議。

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須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不應該把无产阶级专政只当做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談論，而應該很好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使每一个普通的男工、女工、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們报刊上系統登載的日常生活中的事实，认识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不管整个党目前是合法的或是非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應該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領導；出版机构不得濫用职权执行与党的政策不相符合的政策。在报纸上、在群众集会上、在工会、合作社中，在第三国际拥护者所能利用的一切場合，不仅要不断地、无情地斥責资产阶级，还要斥責他們的帮凶，即各色各样的改良主义者。

2. 凡是願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都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所担負的比較重要的职务(在党组织、工会、議會党团、合作社、市政机关等等中的职务)，提拔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們，最初甚至不必害怕让普通工人来代替有经验的活动家。

3. 在欧美各国，阶级斗争几乎都已进入国内战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信賴资产阶级法制。他們必須在各个地方建立平行的秘密机构，以便在决定关头能够

帮助党执行自己的革命职责。在所有由于实行戒严或者特别法令而使共产党人不能公开进行工作的国家里，绝对必须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

4. 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职责要求绝对必须在军队中进行有系统的和坚持不渝的宣传鼓动工作。

公开的宣传工作如果因特别法令而难以进行时，就应当秘密地进行。如果放弃这项工作，就等于背叛革命职责，这同第三国际成员的称号是不相容的。

5. 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农村中进行鼓动工作。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得到哪怕是一部分农村劳动者(雇农和贫农)的拥护，不能用自己的政策去中立一部分落后的农村居民，那就不能取得胜利。

在目前这个时期，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工作具有头等意义。这项工作主要应当通过同农村有联系的工人共产党员去进行。放弃这项工作，或者把它交给不可靠的半改良主义者，就等于放弃无产阶级革命。

6. 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不仅要揭露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而且要揭露假仁假义的社会和平主义，要不断地向工人证明；除了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之外，任何国际仲裁法庭、任何关于裁减军备的谈判、任何对于国际联盟的“民主”改组，都不能使人类摆脱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7.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要承认必须同改良主义和中派的政策完全决裂，并在各级组织的党员中宣传这一点。否则，就不可能执行彻底的共产主义政策。

共产国际无条件地、坚决地要求在最短期内实行这种决裂。共产国际决不能容许像屠拉梯、考茨基、希法亭、龙格、麦克唐纳、莫迪利扬尼之流的著名的改良主义者有权自

称为第三国际的成员，不能容许第三国际内有他们的代表。这样会使第三国际在很大程度上重蹈第二国际的覆辙。

8. 在资产阶级占有殖民地并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里，党在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特别明确的路线。

凡是属于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们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从这些殖民地赶出去，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

9.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在工会、合作社及其他群众性的工人组织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宣传工作。必须在这些组织内部成立共产党支部，这些支部应该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工作，争取工会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这些支部必须时时刻刻揭露社会爱国主义者的背叛行为和“中派”的动摇表现。这些共产党支部应该完全服从整个党的领导。

10. 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同阿姆斯特丹黄色工会“国际”进行坚决斗争。它应当在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中间反复地宣传同黄色阿姆斯特丹国际实行决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它应该竭力加强参加共产国际红色工会的国际团结。

11. 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重新审查其议会党团的人员成分，清除不可靠的分子，使议会党团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每个共产党议员都使自己的全部工作服从于真正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利益。

12. 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像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

13. 在共产党员可以公开进行工作的国家里，共产党应该定期清洗党组织的成员，以便不断清除那些混入党内的自私自利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14.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全力支持每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进行的斗争。它应该不倦地进行宣传，使工人拒绝给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运送军用物资。应该在敌人派去扼杀苏维埃共和国的军队中公开地或者秘密地进行宣传工作。

15. 凡是到目前为止还保留着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党，必须在最短期内修改这些纲领，并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新的合乎共产国际精神的共产主义纲领。按照规定，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都应该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果某党的纲领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准，该党有权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16.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是在非常激烈的战争时期进行活动的，因此，必须考虑到各国种种不同的斗争条件，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对某些问题作出全体成员都应当执行的决议。

17. 鉴于上述种种，一切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

某国家的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名称問題不只是一个形式問題，而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問題。共产国际已经宣布要同整个资产阶级旧世界和一切旧黄色社会民主党进行坚决斗争。

必須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都清楚地知道共产党同那些背叛了工人阶级旗帜的旧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之间的区别。

18. 各国党的一切领导机关报都必须刊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所有重要的正式文件。

19. 凡是已经加入和正在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在最短期内，至迟不得晚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四个月，召开一次特别代表大会，以便就上述条件发表意见。各党中央委员会应注意使各级地方组织都了解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

20. 凡是现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但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自己的以往策略的党，在沒有加入以前必須設法做到，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它的一切中央领导机构内，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同志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就公开而明确地主张加入第三国际的。只有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才允许有例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有权允许第7条中提到的中派代表可以例外。

21. 党员如果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条件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这一条也适用于特别代表大会的代表。①

在社会党的所有支部中，关于这二十一条的讨论，都非常热烈。

---

① 参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1—187页。——译者



由于条文十分明确，主张重建第二国际的“重建派”不得不就每一点表示态度。于是他们丢掉了假面具，露出了右派分子的真面目。

1920年12月25日，图尔代表大会开幕时，同时提出了三个提案。

加香—弗罗薩尔派所支持的第三国际的提案，同意接受二十一条。勃魯姆—鮑利的提案，主张重建第二国际，而龙格—保罗·富尔的分散革命力量的提案，则“赞成有保留的加入”。

另外，列諾得尔还准备了一项“社会党反抗”的提案。

但是，代表大会一开幕，决议实际上已经确定了。

### 三、图尔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5日—30日)

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图尔代表大会上，拥护加入第三国际的人同主张恢复声名狼藉的第二国际的重建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馬賽尔·加香列举了他访问苏维埃俄国期间亲身见到和听到的事情，他的发言在争论中占了压倒的优势：

“我们看到了一种使我们这些老社会主义者心弦震动的情景，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欧洲最大的国家，一个彻底摆脱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完全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代表领导的国家的情景。

同志们，这是世界历史上破天荒的事件，我要求大家认真研究这一事件，并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

加香在着重指出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以后，向仇视“莫斯科的国际”的人说：

“同志们，我们应当时刻记住俄国革命的伟大事迹，我

认为它应该在每个人的头脑里占主要地位；如果人们能够理解的话，它对这次大会的决议就必然会起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并不要求大家同我们一样热情，因为大家认为我们的热情并不是发自理智，而是出于脆弱的感情；但是，既然大家都富于理智，头脑冷静，不轻信自己的想象，为什么固执地否认无可辩驳的现实呢？然而，这是活生生的现实啊！

“俄罗斯共和国肯定地巩固地建立起来了，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了，它号召你们同它一起在它创立的国际的新战线上展开斗争。

“我知道你们有反对意见。大家不是对它的存在不满意，而是对它所采取的方法不满意，大家认为，它所采取的手段违背国际社会主义的全部传统。

“我愿意借这一般辩论中给我的有限时间来回答这种责难。大家给组织和领导1917年十月革命的党加上了使用暴力的党的罪名。

“同志们，俄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一样，从来不是由于好战而决定使用暴力来解放自己的。恰恰相反，在这样野蛮的时代，世界上只有他们具有善良和人道的情感。但是，在同时，他们接受了许多经验和历史教训，他们必须利用这些教训。从很多世纪以来，他们忍受着各种压迫，他们多次正义的起义运动总是遭到了非常残酷的镇压，以致于现在，他们不得不使用这种唯一能使人类摆脱奴役地位的暴力手段。”

马赛尔·加香在结束发言时呼吁成立一个坚强的共产党，他说：

“俄国党在自己长期而悲惨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一种纪律，三年前这种纪律使它取得胜利，现在仍然是这种为全

体党员，不分上下，都自觉服从的坚强果敢的作风保证了它目前的强大……

“我并不是說在我們的国家內也立刻就可以建立一个同样完善的組織；然而現在應該是我們朝这个方向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了。我們有責任立刻修改我們的党章，并且把确切、严格和严重的任务交給我們公选的代表、我們的党员以及一切全心全意献身于党的人們。

“对于我們來說，当前的任务就是积极展开一場有力的宣传，坚决而明确地反击軍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粉碎資產階級民族自卫的謊言。

“面对正在筹划中的战争，面对气焰囂張的帝国主义，无产階級的組織在行动和教育方面有着越来越明确的責任。我认为，我們首先要立即热情地站在这个曾經同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斗争并且在自己領土內战胜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伟大国家方面来。

“我們的任务是把我們的意志明明白白地告訴資產階級：我們决定走伟大俄国革命的道路，同俄国站在一起，革命的俄国是今天世界上反对帝国主义的主要堡垒。”

毫無疑問，改良主义的領袖之一、前神圣同盟部长桑巴的办公厅主任萊翁·勃魯姆当然猛烈地攻击了加入共产国际的主张。当他意识到自己失敗了的时候，他就預先声明不承认最后的表决，并且表示他的朋友們将不顾民主传统，拒絕服从多数的決議，他說：

“你們认为多数通过就能够改变我的意识形态嗎？你們认为我会因为有多少票贊成和多少票反对就会在这样的問題上改变我的思想嗎？你們认为数字真有这种力量嗎？你們之中誰也不会这样认为。只有一件事情能够改变我的

决定，就是共产国际改变。”

萊翁·勃魯姆意识到共产党的誕生已经不可避免，因而在把共产党比作“一种广泛的烧炭党组织”以后，发动了一个后来被一切反共分子经常采用的攻击：共产党“听从莫斯科的指使”。

“是誰来决定党生活的最重要的条例和決議呢？是你们从来不认识的那些人！”

丹尼埃·勒努反駁他說：

“带头搞分裂的是勃魯姆公民。我們要对我们刚才听到的发言和讲话表示抗議，我們可以說，这次演說的主要部分，也就是关于受莫斯科指使的那一部分，只不过是把預审法官儒斯兰先生誣蔑我們被监禁的同志时所使用的語言原封搬到大会上來。

“我过去是一直为尽可能广泛的团結而奋斗的。我声明，一个真正革命的社会党人听了我們刚才都听到的挑衅性的讲话以后，不可能再同萊翁·勃魯姆共同呆在一个党内。”前帝国主义战争政府的閣員桑巴发言譴責新誕生的共产党“会給政府以鎮压的口实”。他說：

“我非常清楚，莫斯科这个极吸引着你们。但是，在莫斯科对面还有另一个极，它虽然不那么亮，不那么有吸引力，但是它吸引着我們——我的朋友們和我：这就是英国，这就是伦敦。”

陷于二十一条包围之中的龙格和保罗·富尔，再也不能站在那左右搖摆、模稜两可的立場来誘使党员倾向于改良主义的論点。这一次他們公开攻击了第三国际，說什么“革命的紀律使人窒息”，并且表示拒絕“执行任何秘密工作”。

退伍軍人维护共和协会的創始人之一保尔·瓦揚—古久里

答复了“重建派”，他說：

“龙格，您认为可能資產階級会不抵抗嗎？龙格，您认为必須等到資產階級开始破坏革命时才对它采取暴力手段嗎？它早就对我们使用暴力手段了，而且今后还要更残酷地使用这种手段。难道您认为必須到桑巴所預見的那个时期到来的时候(这个时期也許已经很近了)，也就是資產階級使用他們所准备好的一切鎮压手段——不仅是監獄和棍棒，还有巷战用的小型坦克、飞机和毒瓦斯——的时候，我們才應該考虑是否真地用武力抵抗資產階級嗎？”

“我认为應該在这个时期以前就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精神考虑：必須預防資產階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候所能加給无产阶级的危險，并且保证能够防范資產階級的一切必要的暴力，以便使您所預見的那种破坏不能实现，或者至少要尽可能彻底打垮資產階級，使这种破坏縮小。

“您曾談到各种危險，革命可能招致的一切冒險，資產階級政府的挑衅所能导致的一切冒險。但是，請您相信，这一切，我們不但都知道，而且认真地考虑过。正是因为我們考虑到这种令人不安的明天可能給我們中間的优秀人物造成死亡，我們才希望現在我們的党内就有一个統一的領導。

“我們希望紧密团结地向前进，我們希望避免小資產階級的机会主义，因为当工人階級投入激烈战斗的决定性时刻，这种机会主义有可能使領導人变成蓬斯·比拉多<sup>①</sup>。”

瓦揚一古久里在图尔清楚地看到有些人不能再“共同工作”了，但是他仍然为未来的团结奠定了基础，他說：

“我們将来还可能再站到一起，以便采取共同行动。我

---

① 据說，羅馬总督比拉多由于优柔寡断，明知耶穌无罪而听任其由犹太宗教法官判处死刑。見《新約全書》。——譯者

仍然希望你们中間的某些人在事实教育下重新回到我們方面来；因为人总是难免要犯錯誤的，因为人对自己的責任总有看不清的时候。

“我們不但会看到我們队伍的壮大，而且，尽管不能否认，目前世界共产主义的党派还是分散的，而且是很軟弱的（这是某些人最为高兴的事），但同样不可能否认的是，当法国社会党这样一个大党宣布：‘目前在国际运动中，在国际共产党中又多了一股力量，一股巨大的力量’的时候，世界上会掀起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

“那时，将到处流传这样的消息：革命的法国在很多年放弃自己的传统并践踏它所得到的的一切遗产以后，在一度成为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的土壤以后，终于变成了领导本国无产阶级以劳动和尊严取得不容否认和必不可少的成就的国家。”

曾经同加香一起訪問莫斯科，以后又参加拥护加入第三国际的群众集会的弗罗薩尔，并不是沒有其他目的的。当加香以加入第三国际的真誠来表示他决心同过去的錯誤、同他参与制定的神圣同盟各項議案决裂的时候，弗罗薩尔却像食心虫那样从内部进行破坏。他的发言很少掩飾这一点，以致萊翁·勃魯姆竟无耻地声称：

“我非常清楚，你們中間有些人是同我們心心相印的，他們是怀着从内部改組共产国际的衷情而参加共产国际的。但是我认为，这純粹是幻想。因为共产国际是一个非常强大、非常一致、非常穩固的体系。”

外省代表大多数主张加入共产国际。

有“昆塔尔的巡礼者”布朗参加的沃克呂茲代表团的一位代表德南特起立发言說：

“我們贊成加入第三国际，因为第三国际譴責改良主义，譴責使我們感到可耻的、‘战争的社会主义’的过去。因此，我們沃克呂茲的代表們热烈地贊成加入第三国际。右派社会党人可以同資產階級結成一伙，但是他們阻止不了俄国革命的胜利。”

多尔多涅省的代表也作了同样的发言：

“我必須告訴大家，我們可以說是全体一致地贊成加入第三国际，这是因为：我們实在厌恶这个战争的社会主义，这个侵略的社会主义，这个滿手沾着鮮血的社会主义。”

1920年12月28日，当代表大会以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克拉拉·蔡特金来不了的时候，主席台上宣布她到了，她是冲破米勒兰在所有边防线、港口、車站和公路設置的重重封鎖而秘密来到法国的。

罗莎·卢森堡和任陸軍少尉时因在大战方酣中号召工人进行革命罢工被社会沙文主义分子杀害的德国社会党人李卜克内西的战友来到了图尔。

这位白发蒼蒼而热情洋溢的女战士很快就使大会上的右派嘲笑分子哑口无言了。

克拉拉·蔡特金指出，在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而毫无拥护社会主义的行动的人，不是革命者，她說：

“誰要想得到成果，他就得采取适当方法。誰宣誓要消灭資本主义制度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取得无产階級政权，他还必須贊成一个高度集中和有严格紀律的党在思想意识和組織上的統一，因为，这样一个党是使言論变成行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克拉拉·蔡特金热情地号召大会要无保留地贊成加入第三国际：

“只表示贊成第三国际的原則和策略还不够。还必须建立組織上的保证，以便使这些原則和策略每天在革命的政策中体现出来。

“必須接受因那些空喊革命、毫无行动表現的人頑强反对而著名的二十一条。”

最后，这位德国女战士在向大家說明她是属于哪个革命社会主义派的同时，用震惊大会的語言談到法国和德国无产阶级的友爱：

“战争的罪恶毁灭或威胁了文化遺留給我们的最美好的建筑。但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天才的结合将会創造出比瑰丽的大教堂更持久的事业。这种结合一定会建起最宏伟和最巩固的建筑物；一定建起共产主义社会和諧的輝煌大厦，这里将不再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奴隶主和奴隶，而只有为人类福利和文化而自由劳动的工人。”<sup>①</sup>

由季諾維也夫簽署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封电报粉碎了龙格派的最后阴谋——他們根据弗罗薩尔的暗示提出的有保留的“加入”的提案。

勒特罗盖宣讀了莫斯科的电报，电报說，中派“过去是、現在仍然是資產阶级对无产阶级起影响的坚决的代理人。共产国际和这类決議的提議人之間沒有任何共同之点。”

这时，列諾得尔已撤销了他的“社会党抵抗”的提案而参加了贊成勃魯姆—鮑利提案的集团来反对参加第三国际，于是龙格派也站到列諾得尔一边去。

图尔社会党代表大会以三千零二十八票对勃魯姆提案所得的一千零二十二票，决定加入共产国际。

---

<sup>①</sup> 所引发言，均載1920年12月26日《共产主义通报》和《人道报》。



表决的结果公布以后，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的人拒绝服从多数的意志，并且决定在另一个大厅举行大会。终于形成了分裂。

多数派还没有摆脱变相的社会民主主义，他们借口适应时代，没有立刻称新党为共产党，而称为社会党（共产国际法国支部）。

当选为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有：亚历山大·布朗、博亚耶、布罗、加香、卡捷埃、安东尼奥·科安、阿麦捷·杜努瓦、东迪科耳、富尔尼埃、弗罗萨尔、古尔多、凯尔、乔治·勒维、洛利欧、保罗一路易、吕西·莱西亚格、梅里克、拉波波特、勒努、塞利埃、塞尔旺捷埃、苏瓦林、特兰、保·瓦扬—古久里。指定八名候补委员：马尔特—比哥、哈登贝尔格、拉洛亚沃、梅尔西埃、马尔特·皮歇雷耳、帕利科、贝斯太耳和雷韦尔萨。

路·奥·弗罗萨尔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 第四章

### 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最初活动

#### 一、图尔代表大会以后的形势

产生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图尔社会党代表大会，在閉会前通过了保尔·瓦揚—古久里起草的《告法国工人和农民书》。

书中着重指出：

“我們的党應該是伟大的党，我們的党應該是强大而有紀律的党，它既是普通黨員的領導，也是当选議員的黨員的領導。它在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革命蔭底下而复兴起来的共产国际中應該无愧于它的过去，无愧于巴尔夫，无愧于1848年6月的烈士，无愧于巴黎公社，无愧于饒勒斯，无愧于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光輝未来。战斗要更激烈、更广泛地继续下去。这絕不是暴动和冒险。我們是时刻准备好进攻的劳动者，我們修好我們的出发陣地，我們对敌人要永远保持戒备状态，因为我們知道，敌人是残酷无情和蓄謀已久的。图尔代表大会的決議應該是全体法国无产者的最高命令！让加入第三国际的声音像即将到来的伟大的变化預告那样轰动全世界吧！”<sup>①</sup>

拒絕服从多数派民主表决的少数派，在图尔代表大会以前，当《人道报》社长馬賽尔·加香去苏維埃俄国的时候，曾企图霸

---

<sup>①</sup> 《人道报》，1920年12月30日。

占《人道报》。

他們成为分裂派以后，又向巴黎公社时代任币制局局长、現在掌握党报多数股票的卡梅利納玩弄阴謀。

卡梅利納热烈拥护刚刚为巴黎拉歇茲神甫公墓的烈士們报了仇的苏維埃公社。他刚正廉洁，拒絕了萊翁·勃魯姆和龙格的心腹的收买。

因此，《人道报》在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新旗帜下仍然是无产阶级的报纸。

但是，无论图尔代表大会的表决，还是党的机关报的维护或共产国际的兄弟支持，都未能使这个产生于社会党并严重继承該党作风的党一下子变成新型的、革命的党。

尚待解决的最困难問題就是必須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組織改变成一个有組織的、真正维护共产国际原則的党。

但是，1921年初，法国的政治形势，完全不利于这种改变。

实际上，1920年的罢工失敗以后，革命运动进入了低潮。分裂以及形成对立的两党之間的論战，引起了一定的混乱。随之而来的工会的分裂，使革命群众的情緒更加低落了。

在共产国际法国支部中，还留有同韦尔弗依之流的含混主义者勾結在一起的弗罗薩尔分子，他們不惜作出机会主义的让步，来取得同图尔代表大会少数派的和解。

“有经验的”干部大多数还同少数派在一起。少数派虽然只拥有三万名党员，但是他們竟严重地損害了拥有十三万党员的年轻的共产国际法国支部，因为，沒有任何能使这些本来思想傾向各不相同的党员团結起来的那种深刻的思想一致。

新党虽然接受了保证内部团結的二十一条，但又借口“言論自由”，容許了各种“傾向”的存在。

在新党内，有出版《人民日报》的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集团，

有巴黎“福布尔俱乐部”的空談派，有联合另一和平主义傾向的《波瀾报》集团，有“人权同盟”的成員，有共济会基层组织の成員，有“苏維埃”巴黎小組左傾分子，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等等。

由于非常缺乏思想意识的一致，爭取加入第三国际委员会到1921年10月即加入第三国际九个月以后解散了。

分裂也在各省反映出来，到处发生了爭夺报刊、省委会的财务机构、印刷机构等等或大或小的斗争。共产党的领导机构还没有摆脱社会民主主义的作风，它同意了根据老方式进行改組。1921年夏天第一次行政代表大会連修改“党章草案”都未作到这一事实，最清楚不过地說明了思想意识已经混乱到什么程度。革命的主张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相持不下。

有些人問：“党章需要規定关于反对民族自卫的一条嗎？”另一些人要求确定“党应该怎样对待配戴勳章的党员？”或者，“共产党的小业主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工人？”

弗罗薩尔依靠別有用心的拥护第三国际的宣传运动保住了总书记的职位，从而使右傾傾向得到发展。

法布尔、梅里克、皮沃克等人的《人民日报》鼓吹“不同傾向和解”的主张。弗罗薩尔不但不譴責这种与共产国际条件背道而馳的觀點，反而非常“友好地”参加了該报的公开討論。

左派的小资产阶级有他們的每日晚报《国际报》，丹尼埃·勤努任社长。該报发表的对共产国际的指示的批評說，这种指示“对俄国的农民和落后工人或許有用，但是法国人不需要它。”

当1921年3月德国爆发无产阶级起义的时候，党的右派不但不給予支持，反而对它加以嘲笑。

布里臧在《波瀾报》上說，这是“拿着扫帚柄起义”。

当塞拉蒂由于拒絕服从共产国际的決議而被开除出年轻的

意大利共产党的时候，拉波波特竟在党的刊物上肆无忌惮地为他辩护。

当政府征召1919年适龄青年入伍去打击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提出了“拒绝参军和举行起义性总罢工”的提案。党的领导机构反对了这种冒险的口号，没有采纳，但是也没有警告法国无产者提防“局部动员”，更没有组织支持德国革命的活动。在工会方面，党也向右派的压力作了让步，实行弃权主义，说什么“工会是工会会员的事情”。

革命工会委员会是根据个人的创议而不是根据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党并没有工会小组委员会这样的组织。于是党内右派分子就利用工会讲坛攻击党，并为分裂主义分子石乌、杜木兰和他们的同伙效劳。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警告、提醒和建议，一般说来都未受到重视，特别是没有得到弗罗萨尔的重视。

捍卫共产国际观点的苏瓦林的《共产主义通报》也不敢直接攻击右派分子，而是委婉地反驳它本来应该断然粉碎的论点。

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代表，就在这种混乱状态中应邀参加了1921年6月22—7月12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 二、党内的各种倾向

十一名法国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他们代表着两种倾向：一个是“争取加入第三国际委员会”派，其中包括非常坚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另一个是加香和弗罗萨尔派。

大会要求各国共产党，主要是共产国际法国支部彻底改变

因袭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结构并以企业党支部为党的主要基层组织。

第三次代表大会谴责了在《共产主义通报》上宣传工会中立的阿麦捷·杜努瓦的论点，决定了党和工会的联系方式，党必须对工会进行监督。

第三次代表大会对“争取加入第三国际委员会”尚未解散表示惊讶，因而建议主要通过监督自称属于党的报纸来消除各种倾向和派别的斗争。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党内的情况如何呢？

共有五种倾向：

(1) 右的倾向(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这种倾向渗入到退伍军人的组织之中，有这种倾向的人都出身于非无产者，例如：认为共产主义是“爱的组织形式”的诗人乔治·皮沃克、新闻工作者维克多·梅里克、投机商亨利·塞利埃、韦尔弗依，等等。所有这些都拥护“党的言论自由和自主”。

他们要求同龙格派重新统一。

(2) “中派”的倾向。这种倾向的主要力量在外省，它的基础是工人和农民，它早就是最强大、最有代表性的。它的领导人是加香和弗罗萨尔。加香虽然还在摸索中，却是在为党的革命化而奋斗；弗罗萨尔则认为，这里有一种不能放弃的力量，如果可能的话，就利用这种力量反对共产国际。

(3) “极左”的倾向。这种倾向最复杂，它是由丹尼埃·勒努集团的右派分子、东迪科耳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及左倾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它宣扬工会不附属于党的论点，反对第三国际主张的统一战线的策略。

(4) “左”的倾向。这种倾向的负责人几乎全部是“争取加入第三国际委员会”的原有成员(洛利欧、罗斯梅、莫尔、特兰、瓦

揚一古久里、鮑里斯·蘇瓦林)。他們雖然犯過一些錯誤，出現過各種含混主義的思潮，但是他們最接近共產國際的論點。

(5)所謂“巴黎極左”的傾向。這種傾向主張無政府主義，受愛爾威主義殘餘的滋養，是佩里卡爾在圖爾大會以前組成的“共產黨”的後身，也是海涅、勒羅亞和拉韋爾尼的“蘇維埃聯盟”的繼續。

這五種主要傾向在黨的會議上、黨的報刊上和黨容許其在“身邊”存在的《波瀾報》或《人民日報》這樣的機關報上表現出來。

如果說這五種傾向概括了整個黨，那是錯誤的；實際上，這五種傾向只代表着彼此鬥爭的主要思潮，至於大多數共產主義戰士則在注視着它們。大多數黨員先是贊成和支持“中派”，最後是支持同共產國際論點最接近而且主張以支持俄國革命為全世界共產主義者的主要任務之一的“左”派。

圖爾代表大會後十個月，即1921年11月在馬賽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最革命的黨員為實現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代表大會關於整頓工作的號召作出了很大努力。

洛特一加隆的農民選出的代表讓·勒諾要求批准農民提出的綱領，然後他又提出了一個土地問題提綱。

代表大會鑑於只有雇用工人和使用現代機器的大規模經營的大莊園能立即社會化，因而提出對小農戶的田產和靠佃農經營的資本主義田產實行中間土地制度的主張：

“取消一切對分制、租佃制和雇傭制，同時，把土地無償地交給從土地資本主義下解放出來的農民。”<sup>①</sup>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十期中同意這個完全正確的提綱的

---

① 《共產黨和農民問題》，社會出版社。

基本思想，并且強調指出：

“務必制定一个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措施的纲领’，以促使农民自願过渡到农业社会化，并使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状况得到迅速的改善；立刻沒收（即无償地剝夺）用移民、佃农或雇佣工人的劳动耕种的土地；把这些土地交給現在耕种这些土地的劳动者，并要这些劳动者建立‘生产合作社’。”<sup>①</sup>

馬賽全国代表大会結束的时候，弗罗薩尔提出共产党指导委员会新委員的名单如下：

弗罗薩尔、加香、拉波波特、东迪科耳、馬尔特·比哥、加尔歇里、瓦揚—古久里、勒努、洛利欧、梅里克、呂西·萊西亚格、凱尔、卡尔捷埃、托姆馬济、保罗—路易、苏提夫、让·勒諾、儒勒·布朗、路易斯·博丹、費迪南·富尔、巴腊邦、乔治·勒維、布罗代耳和布埃。指定八名候补委員：韦尔弗依、特兰、古尔多、貝斯太耳、呂西·科利亚尔、皮沃克、杜努瓦和多尔摩亚。

在当选人中不再有鮑里斯·苏瓦林了，他当时是法国共产党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为党的布尔什維克化而斗争的《共产主义通报》負責人。这样提名显然是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种阴谋。

当时曾爆发一場非常激烈的爭論，代表大会通过表决批准清除苏瓦林，同时选出右派分子韦尔弗依。

凱尔、托姆馬济、貝斯太耳和馬尔特·比哥提出了强烈的抗議。党的左派（保尔·瓦揚—古久里、特兰、洛利欧和阿麦捷·杜努瓦）“为了表示他們与苏瓦林团結一致”，提出辞职。

这是年轻的共产党的第一次危机。

---

<sup>①</sup> 《共产党和农民問題》，社会出版社。（參閱列宁：《論法国共产党的土地提綱》，《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7頁。——譯者）



这种危机是以法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危机形式表现出来的。

在政治方面，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建議全国共产党面向群众，共产国际的纲领着重指出：

“统一战线是对資本进行斗争和依据阶级精神动员群众的最有效的手段，是揭穿和孤立改良主义首脑的极好方法。”

共产国际法国支部在激烈的爭論中討論了这个主要問題，但結果更加深了早就使党陷于混乱的不和。

当这几种傾向为拥护或反对统一战线而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工会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在勒阿弗尔的罢工中，有四名工人被“警察巡邏队”打死。在工会分裂时产生的法国統一总工会举行了抗議罢工，并且引起了巨大反响。工人们推举蒙穆索和色馬尔为他們的领导人（圣太田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否决了瓦揚—古久里、特兰、洛利欧和杜努瓦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議，认为这会使党彻底分裂；它决定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解决法国共产党的危机。

莫斯科的一切尝试、劝告和召唤都毫无效果。例如，反对统一战线的丹尼埃·勒努从莫斯科回来說，他那一派“要成为共产国际有紀律的战士”，但随后就又开始了一场含混主义的斗争，以致人們不得不要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他进行批評。当指导委员会要求开除《人民日报》的右派分子法布尔的时候，拉波特說，“放着机会主义的大象不打，却用大炮轰击臭虫”。

弗罗薩尔不能再继续长期玩弄两面手段了，据他自己說，他是因为感情关系才反对开除右派分子韦尔弗依的。

1922年10月，曼努伊斯基秘密来到巴黎，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参加拉格伦季—奥—貝耳的代表大会。

中派仍旧占多数(一千六百九十八票),但左派也不可抗拒地发展了(一千五百一十六票),以加香为首的中派正直分子开始动摇并脱离弗罗萨尔。左派按照曼努伊斯基的路线取得了胜利,这就是使各种倾向一致同意要求共产国际进行仲裁。

就在这时候,普恩加赛抓住一个可笑的借口——战败的德国在应偿付的木材中缺少电线杆,要求以鲁尔“作抵押”。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恰好在1922年11月举行。这次大会的目的是解决使法国共产党陷于瘫痪的争端和帮助它在鲁尔纠纷中光荣地负起它的革命任务。

派往莫斯科参加讨论的代表团由二十五名代表组成,代表着党的各种倾向。右派代表是勒努、杜雷、莱斯帕纽耳、勒韦耳和韦尔兹。“中派”代表是马赛尔·加香、皮埃尔·多尔摩亚、里埃耳、加默龙、帕克罗、吕西·莱西亚格、亨捷斯和凯尔。忠于共产国际纪律的左派代表是苏瓦林、罗斯梅、马尔特·比哥、贝隆、洛里当、里厄、达维德和佩儒。让·勒诺“孤身一人”,他主要是以《农民之声》编辑的资格参加代表团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有三名代表:加布里埃·佩里、莫里斯·拉波特和雅克·多里奥。

11月9日季诺维也夫所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谈到了法国支部的问题:

“法国共产党处在最困难的创始时期。它还没有学会团结劳动者。‘中间派’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者不如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绝不容许这种成员存在。左派,虽然有错误,但是只有它捍卫了共产国际的策略;我们只赞成左派。

“令人奇怪的是,我们共产党所需要的成员非要到党外、到工团主义者的队伍中去寻求不可。所以,代表大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真正的无产者、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引到我们这里来。

“在法国，把党看成是一个政客组织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我们不幸地必须承认这一点，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对法国党的批评太少了；那时法国党还太年轻，而我们也还有别的事情要作。这也许也是执行委员会的错误，不管怎样说，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对法国党太宽容了，这是事实；对法国党来说这是一个不幸。它已处于分裂的边缘。然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sup>①</sup>

世界代表大会首先批判了“左派”的错误，指出它使自己的成员辞去《人道报》编辑部的职务，让该报落入右派之手，它还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辞去了指导委员会的职务。接着，代表大会分析了产生分裂的根源。

这是打入“中派”并使之腐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但是要摒弃它并不容易，因为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群众支持它。这是挑拨离间分子和作为资产阶级打入党内的“通道”的共济会派的影响。

在党的三个书记中，有凯尔和苏提夫两人承认自己是参加共济会的。

（总书记弗罗萨尔大概是在脱党以后才承认他参加过共济会。）

因此，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宣布，凡与共济会有联系而不公开同它断绝关系的党员应一律开除出党。脱离共济会的党员，两年内不得担任任何负责职务，以资警惕。

预定在1923年1月1日实行的清党措施也打击了混进党内的“人权同盟”分子和所有为资产阶级报刊撰稿的党员。

---

<sup>①</sup> 《共产主义通报》，1922年12月7日。

为了取消“专业”議員和小資產階級知识分子在領導机构中的霸权，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即将到来的議會选举中，工人至少要占党的候选人数的十分之九。

大会指出，把阿拉伯人看作“劣等种族”的阿尔及利亚地区的共产党人，不配称为共产党员。

最后，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根据各派得票比例，建議法国共产党指导委员会重新改組，由左派和中派各十名党员及勒努的“右派”五名工人党员組成。

1922年12月16日，共产党指导委员会接到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各项決議之后，宣布它将忠实地遵守紀律，并为有效地貫徹这些決議而努力。

到1923年1月1日——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規定的清洗党的領導机构的最后期限，弗罗薩尔提出辞职书，辞去了党内的职务。

根据布伦全国委员会的決議，右派分子被清除出《人道报》的編輯部。像党的指导委员会委員保罗·路易那样作风的共产主义新聞工作者，也就是既給《人道报》撰稿又給激进党报刊撰稿的人，遭到了同样下场。

“冒险投机的”委員，如科尔东和亨利·塞利埃之流，也相继辞职。为了建立一个“中間的”党，他們企图将社会党和共产党合办一种报——《平等报》。这种企图很快就破产了。

为了抵抗共产国际，乔治·皮沃克、梅里克、拉丰、亨利·托尔斯、摩里柴、夏尔·呂西、貝納尔·勒卡歇、加西埃等人組成一个“抵抗委员会”。

他們制造了一项所謂“否认莫斯科有权从法国共产党中遴选可靠代理人”的“抵抗”提案，有一百人在上面签了名，这些人立即被开除出党。

《人道报》着重指出，这些人正是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所谴责的那些有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它庆幸地说，“手术刀正好剜掉了脓疮”<sup>①</sup>。

法国共产党在清除了那些从图尔建党大会就想把党拉回改良主义道路上去的人以后更加强大了，并且很快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优秀“支部”之一。

---

<sup>①</sup> 《人道报》，1923年1月8日。

## 第五章

### 关于魯尔問題的斗争

#### 一、占領魯尔

法国共产党人早在1919年就曾譴責和反对凡尔賽条約，因为这个条約把一些可耻的条件强加于德国人民，它本身就孕育着一場新的战争。

当时馬賽尔·加香強調指出：

“盟国的外交官們最近簽訂的条約完全是战争条約。如果让其中任何一个条約继续存在下去，肯定会重新把我們推进同我們刚刚摆脱的战争同样可怕的战争中去。”

1922年，当钢铁公司和銀行的老板們要求普恩加賽上台的时候，已经不难看出，反动財政寡头企图加重德国人民和苏維埃俄国人民的負担来克服自己的危机。

1922年，在苏維埃人应邀参加的热那亚第一次国际會議上，苏維埃发言人契切林提出了普遍裁軍的建議。

普恩加賽疯狂地反对这个建議，坚决要求德国賠償。

于是契切林提出一份两千五百亿金法郎的賬单，这笔款正好等于受“協約国”資助的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弗兰格尔的白匪干涉軍給苏維埃俄国造成的損失。

資產階級外交家們的不安並沒有因苏联代表同战敗国德国在拉巴洛簽訂睦邻条約而平靜下来。

但是，帝国主义法国的代表們是不可能沿着这条和平的道

路走的。大发战争财的钢铁业委员会的报纸《时报》一方面唱出爱国高调，另一方面要求德国赔偿。其实，这只不过是为了排除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罢了。

当反德宣传谈到要迫使德国偿付战债就必须取得一些“抵押品”的时候，《时报》认为鲁尔是一个最好的抵押品，它指出：“掌握了鲁尔，就掌握了德国。”

其实，这是它看中了鲁尔的廉价焦炭，可以用来把钢铁业委员会从“收复”的洛林矿采掘的矿石炼成铁和钢。

唯其主子之命是听的普恩加普政府找到了一个可笑的借口，说在德国交付的战争赔偿中缺少五万五千立方米电线杆，因此要求“清一色议会”的议员们同意取得一件抵押品。

德国共产党和摆脱了党内清算分子的法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立刻决定组织一次共同行动来反对这种罪恶勾当。

1923年1月3日，在拉格伦季—奥—贝耳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加香代表共产党，色马尔和蒙穆索代表统一总工会讲了话。德国共产党的一位代表带来了“莱茵河彼岸兄弟”的一封信表示声援的贺信。

1923年1月5日，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离巴黎去埃森，参加将在那里举行的反对占领鲁尔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英国、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共产党的代表。

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由党的两位书记马赛尔·加香和安德烈·凯尔率领，在临去之前，安德烈·凯尔发表了一篇题为《取消凡尔赛条约》的论文。统一总工会派皮埃尔·色马尔、加斯頓·蒙穆索、马索和雅各布为代表。

埃森会议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第一次真正的先发制人的

大示威，會議在1923年1月7日发表了一篇《告協約国和战敗国劳动人民书》。

后来事态的发展令人痛心证明了这篇告人民书的預見是正确的。因为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們特在这里全文轉載：

### 反对資本主义的海盜行徑

欧洲的工人群众們，占領魯尔意味着一場新的战争，因为这会加深各国間的敌对，也会激起和加剧民族主义的情緒，虽然德国方面还没有一支准备抵抗的武装力量。

不論从法国方面还是从德国方面來說，这都会激起最过激的反动势力，并且会为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开辟道路。这实际是播下了国际战争的新种子。

劳动者們，

只有你們能够阻止这个即将来临的危險……而且，你們只有打破国界，組成一条共同防线，以兄弟般联合起来的劳动群众的联合防御去对抗資產阶级的联合攻势，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大家團結起来，把一切战争負担和经济恢复的費用都推到資本家們——真正战犯們的身上去。

德国的劳动者們，

你們的敌人不是法国士兵，不是法国工人，也不是法国的小农，他們同你們一样，都受着剝削，都是資產阶级的牺牲品。你們的共同敌人是德国資本主义和法国資本主义。

你們的迫切任务就是同本国的資產阶级进行斗争，不管他是亚利安人还是犹太人。你們国内的資產阶级分子此刻正忙于同他們的法国弟兄达成他們的阶级諒解，以便瓜



分战利品并在各地阻止无产阶级說話。

你們要用国际团结和全体劳动人民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共同斗争来反对所谓国社党人及其同盟者——各条顿党的夸夸其谈的民族主义。

世界各国的劳动群众們！

今天你們就应该迫使所有領袖，包括那些直到今天还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領袖同资本家們去进行斗争，同时要他們不去反对战斗的无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

劳动群众們！

威胁着你們的危险不仅迫在眼前，而且非常之大。时间紧迫。为了共同防御，行动起来吧，战斗吧！

1923年1月7日于埃森

法国共产党

法国统一总工会

德国共产党

比利时共产党

英国共产党

意大利共产党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荷兰共产党<sup>①</sup>

当天晚上，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下，国际会议的代表們在埃森向魯尔的一万名劳动群众讲了話。

皮埃尔·色馬尔向杜伊斯堡的德国冶金工人讲了話。1月8日，馬賽尔·加香在法兰克福讲了話；9日在斯图加特讲了

---

<sup>①</sup> 《人道报》，1923年1月10日。

話。色馬尔 9 日在科隆又参加了一次工人群众大会。

果然不出共产党所料，1923年 1 月10日法国政府借口保护一个大約由五十名工程师組成的“調查团”，派軍隊四万五千人进入魯尔，与比利时的五千軍隊共同占領了魯尔。

为了制止共产党和由加布里埃·佩里推动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宣传，政府在采取战争行动以后，还对无产阶级組織采取了镇压行动。它大事逮捕，并搜查了《人道报》和統一总工会。

統一总工会的色馬尔、蒙穆索、卡札耳、雅各布、古尔多、拉尔提格、馬索等人同共产党政治局的馬腊納一起被投进了監獄。

保尔·瓦揚一古久里迫不得已，以《阶级战争》为題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1923年 1 月11日《人道报》的著名的社論。社論說：

“这是钢铁业委员会与今后必将合成一伙的德国大工业家們所策划的一系列剝削人民的可怕的英雄行径。

“在波尔多杀过德国鬼子的普恩加賚先生現在成了斯汀斯先生的钢铁业委员会和‘魯登道夫的代言人’阿尔諾·雷赫堡联合政策的奴才，这是多么大的諷刺！

“讓他們都跟德国鬼子去吧！

“我們，要同穷汉、劳动者和資本主义制度的永久牺牲品在一起。

“让普恩加賚先生跟大工业家和屠杀一百五十万法国人的德国將軍去吧！”

这篇文章表明镇压是吓不倒共产党人的。

出席埃森會議的法国代表們剛回到法国就被捕了，只有馬賽尔·加香因有議員豁免权仍然享有自由。

政府控告他阴谋危害国内外安全，要求取消他的豁免权。

1923年1月18日，展开了一场辩论。

加香当场声明：

“我在这里决不想为我的行动委员会的同志们的行为辩护，也决不想为我自己的行为辩护。我们不需要任何辩护，因为我们没有犯任何罪。

“我们对我们的最近的行为负完全责任。我也像被监禁的人一样负有责任，难道这还用说吗？”<sup>①</sup>

他在概括地叙述埃森会议的讨论之后指出，德国劳动者和法国劳动者认为，占领鲁尔是向他们的共同敌人德国沙文主义的磨盘里注水。

他非常明确地预告，占领鲁尔会鼓舞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会十倍地反对非正义的凡尔赛条约，会准备一场报复性的战争。

尽管马赛尔·加香当时在议会里只有十位共产党员同事，但是仍有一百四十三票支持他，反对取消他的豁免权。三百七十一票的多数（其中包括罗伯特·舒曼和温德耳两票）决定把他交付“审判”，四十一名议员弃权。

1923年1月20日马赛尔·加香在桑第监狱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相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加布里埃·佩里也因“煽动军人违抗命令”而羁押在这里。

当一小撮市议员和省议员在第一次考验中就从党内逃跑了的时候，数以百计的无产者来充实了党的队伍。

以前一直批评法国共产党人的共产国际书记处，1923年2月11日写信给马赛尔·加香说：

“谁也没有料到您会那样快地到桑第监狱去休息。您和

---

<sup>①</sup> 《政府公报》，1923年1月19日。

您一起被監禁的其他同志們挽回了法國無產階級的榮譽。  
您的英勇行為贏得了各國共產黨人的高度評價。

“法國工人運動畢竟走上了正確的道路。您的全體俄國朋友們，尤其是列寧同志，向您和您一起被監禁的全體同志們致以最友好的問候。”

強大的德國共產黨的黨員也組織了聲援法國革命者的大規模示威。

參加埃森會議的代表們被監禁的消息剛一傳出，柏林就舉行了一次群眾大會，並通過了一項臨時動議，成千上萬的柏林工人共產黨員“向法國勞動者及其被捕的領袖們致兄弟的問候。共產黨和統一總工會的被監禁的戰士們通過他們同法國軍國主義的英勇鬥爭表明了，他們同普恩加賽先生的帝國主義毫無共同之點。

“德國工人階級清楚地認識到現在有兩個法國，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法國和革命無產階級的法國。

“我們，柏林的工人們，在這裡鄭重聲明：法國同志們支持我們同我國資產階級政府進行鬥爭是對我們的最大的幫助。”<sup>①</sup>

在鎮壓高潮中，《火線上》——1914—1918年戰爭的戰士們的反抗和希望的呼聲——的作者，偉大的亨利·巴比塞，參加了共產黨，以此來表示他同被監禁的法國共產黨人的團結一致。

由於這些被監禁的人能及時了解事態的發展，又用一看便知的筆名在黨的報刊上發表文章，所以司法部長決定，凡“按規定”前來探望他們的人，都須經過最“嚴格的檢查”。

加強鎮壓不但沒有制止共產黨的鼓動工作，反而使它十倍地加強了。

---

<sup>①</sup> 《人道報》，1923年1月13日。

党、共产主义青年团和统一总工会的报刊都一再谴责政府的好战阴谋，并且揭穿它的底细。

安德烈·凯尔当了党的总书记以后，发表了一本抨击钢铁业委员会和占领鲁尔的小册子。另一本三色封面、装订精美的小册子，向派往鲁尔的士兵们阐明了“为什么雅克·崩诺姆<sup>①</sup>要留在鲁尔？”

与此同时，德国共产党人也对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打击了当时德国政府的首脑库诺和钢铁大王克虏伯·冯·博伦。

在国会——德国第二院的讲坛上，克拉拉·蔡特金号召“要像同普恩加查斗争那样同库诺作斗争，像同其德国同类斯汀斯作斗争那样同克罗佐的许奈特斗争，因为所有这些人都不例外地是一模一样的资本主义的代表”。

1923年3月，预审法官儒斯兰拿出了他对付共产党被告人的“炸弹”。这就是一封硬说是“共产国际西欧书记处”从汉堡寄来的假信。

被监禁的人，特别是加香，都指出，这封信彻头彻尾是人们为了陷害他们而伪造出来的。因为共产国际西欧书记处早在1921年就撤销了。写信日期是1923年1月，而“拿出来”的时候已经是3月。法官说信是从扩大执行委员会发出的，其实扩大执委会从1922年6月以来就一直沒有举行过会议。伪件上签署着德国共产党人盖施克的名字，盖施克马上提出一份经公证人证明的文件，证明“有人无耻地盗用了他的名字”。

这种把戏非常拙劣，以致在未决前拘留四个月之后，法官不得不把被告全部释放，只有佩里因另外的案由——在军队里进

---

<sup>①</sup> 意思是法国的农民。——译者

行宣传——继续起訴。被拘留的人提出，如果不同时释放加布里埃·佩里，他們就拒絕出獄，結果，他們在1923年5月7日被强制出獄。

同一天，政府頒布命令，將參議院組成最高法院，“以便对被控应由加香、蒙穆索、馬腊納、古尔多、呼貝尔、貝隆、皮埃特里、特兰、帕克罗、拉尔提格、卡札耳、雅各布、馬索、色馬尔、凱因、代耳福斯、普罗沃、馬里·吉約等先生以及所有其他被秘密检举的人負責的危害国家内外安全罪进行裁定”。加布里埃·佩里、拉波特和塞利埃也以在軍隊中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据說如此)罪被追訴。

1923年5月23日，參議院应邀来进行裁定。

用七小时的时间宣讀了一份冗长的起訴书之后，參議院举行秘密會議进行討論。

当參議員們回来的时候，他們宣布以一百四十五票对一百零四票否决了將參議院組成最高法院和审讯被告。

參議院議長拒絕同控訴了那么长时间的检察官握手。全体被告都被释放了，只有德国共产党議員海萊因（因传递德国共产党的声援信而被捕）和加布里埃·佩里除外。

认为受到侮辱的普恩加賽，当天晚上就向共和国总统米勒兰提出辞职，米勒兰总统要求他“留任”。

第二天，《人道报》写道：

“最高法院判刑的罪犯是普恩加賽！”<sup>①</sup>

海萊因和加布里埃·佩里进行了为期十二天的絕食。由于人民的压力，不久他們也被释放了。

在被占領的魯尔，国际主义的斗争仍在继续。特别是共产

---

① 《人道报》，1923年5月25日。

主义青年团在军队中进行着激烈的宣传，在军队中洛兹雷领导的鼓动组进行了巨大的工作。

但是，“反对占领鲁尔行动委员会”主要是由有组织的战士们组织起来的，他们只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少数。

担心失业和日益贫困的群众不能永远注视着这个不管怎样说也还没有切身关系的鲁尔。但是，行动委员会在占领军的士兵和德国劳动人民中所取得的成就却比较广泛、比较深入。

这是由于法国士兵同德国人民、革命的工人和屡次进行示威游行的鲁尔罢工者发生了直接联系的结果。

国际主义号召的士兵联欢，更直接、更有效地感动了士兵们。

因此，年轻的法国共产党在鲁尔作出了卓越的革命活动。

《人道报》为士兵们出了专刊。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卫报》发行了增刊——《新兵》，它从第一期就号召士兵们“同德国的无产者和失业的工人兄弟们联欢”。

德国共产党人也发行了一种名叫《鲁尔回声》的期刊。这份期刊一直深入到法国军营中去，补充了《人道报》和《新兵》的宣传。

有了这样的组织，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 二、鲁尔区的革命活动

占领鲁尔这件事被德国国社党人所利用，他们很快就把希特勒捧上了台。

法国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用宣传联欢来反对企图把法国统治者和法国钢铁工业资本家同法国人民混淆起来的反法宣传。

3月31日，一支法国分遣部队在埃森向德国工人开了枪，打死十三人，伤三十人，从这天以后，联欢宣传更加强了。

共同起草的呼吁书分别用德文和法文印发出来：

“士兵們，你們像黑海水兵和乌克兰的陸軍士兵那样联欢吧！”

士兵們，法国的資本家同德国的資本家是一伙。

你們这些穿着軍装的劳动者要和你們的德国劳动兄弟团结起来。”

在法国劳动人民和德国劳动人民举行了一次国际团结的“五一”节以后，这种鼓动收到了效果。

1923年6月7日，德国共产党議員斯托克尔在国会中說：

“在格耳曾基尔亨，法国士兵同我們德国工人采取了共同的立場，他們帮助德国工人驅逐并打击自命为国社党人的法西斯分子。”

在万貝耳，一个德国工人由于同法国士兵联欢而遭到德国警察杀害。

法国士兵湊錢帮助死者的妻子，并且向死者献了花圈。

在多特蒙德，第三十一步兵分队保护了德国工人，使他們未遭受“本国”警察的迫害。

在諾伊施塔特，阿尔及利亚狙击兵第二十八分队拒絕向闖入市政府的失业工人开枪。1923年11月，当陸軍部长馬奇諾来检閱駐魯尔部队的时候，他受到了士兵們的藐視。

过了不久，就发生了第一批兵变。

在杜伊斯堡、多特蒙德和埃森，士兵們拒絕向示威游行的德国工人开枪，并且加入他們的游行队伍，有时还带头示威。德国工人向捐款援助德国共产党主办的《魯尔回声报》的法国士兵买《人道报》。后来，有一百三十五名参加示威游行的人被捕，其中



有十五名是法国士兵。

在美因茲成立的审判德国工人和法国士兵的軍事法庭对三十七名在押人員总共判处了一百三十三年的徒刑。

1924年6月3日，哈尔杜恩中士和在魯尔从事宣传鼓动工作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亨利·洛茲雷一起受到了审訊。

軍事法庭上校庭长問哈尔杜恩中士：“你是一个下級軍官嗎？”他回答說：“是的，但是我首先是一个工人！”<sup>①</sup>

洛茲雷被判处十年监禁，哈尔杜恩被判两年监禁，其他三十五名被告也都判了不同的徒刑，但这一切絲毫未能扭轉局面，因为軍事当局直到1927年从沒有停止过审訊参加兵变和违抗命令的士兵。

1927年5月20日，最后一次审訊判处了三个下級軍官：瓦德克·吕伊利埃、貝特洛、罗歇·腊蒙的徒刑，罪名是“煽动軍人违抗命令”。

可以肯定，如果当时德国革命能够胜利的話，党在法国軍隊中的革命工作将会做得更好，人們絕不能派这支軍隊去进攻一个德意志苏維埃共和国。

可惜事情不是这样，由于缺乏法国和德国广大群众的支持，結果使“民族复仇主义者”从这次占領魯尔中得到了好处。

### 三、希特勒关于魯尔的話

1926年，希特勒发表了他写的《我的奋斗》，这是他个人的宣言，也是他所糾集的国社党的复仇主义的理論。

指出希特勒对占領魯尔的問題說了些什么，这并不是沒有

---

<sup>①</sup> 《美因茲的审判》，1924年。

意义的：

“由于魯尔被占领，命运之神再一次向德国人民伸出手，以便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因为这件事乍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深重的灾难，仔细看一下，它却包含着结束德国苦难的一种手段。

“从政治观点来看，法国占领魯尔，首先使英国对它感到真正的、深刻的不满；不仅英国外交界如此，英国最广大的底层也如此。

“这个大陆国家国力的出人意料的重新加强，特别在英吉利海峡彼岸的经济界中引起了明显的不安。

“因为法国现在是以一个军事和政治强国在欧洲占着德国过去从未有过的位置，同时法国还获得了一些经济资源，使它有了一个能够同英国在政治上抗衡的特权地位。

“法国占领了魯尔，等于从英国手中抢走了全部战利品，胜利就不再属于英国的主动灵活的外交，而属于福煦元帅和他所代表的法国。

“法国在意大利所激起的情绪，自从战争结束后就已经没有一点亲切的味道，而带有不共戴天的仇恨的性质。

“第二次战争将要来临。首先应当使法国完全孤立，要让这第二次战争不再是德国对全世界的战争，而成为德国抵抗扰乱全世界的法国的自卫战争。

“最后，大家必须清楚地懂得这一事实：德国人民的死敌、无情的仇敌现在是、将来还是法国。

“不管过去和将来统治法国的是谁，是波旁家族或雅各宾派也好，是拿破仑或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也好，是教权派共和主义分子或赤色布尔什维克也好，这都没有关系，反正法国的最终目的将永远是强占莱茵河疆界，巩固它在这条河

上的地位，同时，竭力使德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法国不希望有一个名叫德国的强国。

“但是，我們今天不是为重新爭得世界强国的地位而斗争；我們要为我們祖国的生存、为我們民族的統一、为我們子孙每天的面包而奋斗。”<sup>①</sup>

从这几段話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不論是凡尔賽条約，还是魯尔的占領，都成了希特勒用来煽动受侮辱和被侵夺的德国人民去仇恨法国和进行复仇战争的工具。

#### 四、1924年的选举

1924年1月里昂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共产党正处在布尔什維克化的高潮中。党由于壮大了，并且联系了工人群众，因而正准备全力投入选举运动。这倒不是为了取得議員席位，而是为了鼓动法国工人和农民，动員和团結他們。

因此，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工农联盟纲领”，并且制定了自己的选举策略。

大会特別决定：为了建立工农联盟，将向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建議成立一个統一的选举陣线，以便挫敗“民族联盟”，“民族联盟”是法国反动派在占領魯尔的气氛下，利用“要德国鬼子賠償！”这个沙文主义的口号而策划出来的。許多退伍軍人和战争受害者——伤員或陣亡將士家屬——都上了这个口号的当。

在工会方面，里昂代表大会决定在法国統一总工会和法国总工会中普遍发展“共产党的工会小组”，以挫敗无政府主义者企图建立第三个法国总工会的阴谋。

(1924年1月11日，无政府主义者在拉格伦季—奧—貝耳的

<sup>①</sup> 《我的奋斗》，善本出版社。

一次群众大会上向共产党员发动了残酷的进攻。)

有了这些共产党工会小组，在共产党的监督下，才有可能把争取切身利益的要求同政治活动的必要性结合起来。

大会在分析了鲁尔地区所获得的初步成就之后，通过决议确定了军队中革命组织的秘密形式问题。联队中第一批秘密基层支部得到了加强和发展。

在提出集中领导问题的时候，党内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潮显示出仍然有力量，并且借口政治局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而反对民主集中制。

例如他们说：塞纳省委员会的领导人，特别是特兰和苏珊·吉罗，以严重的宗派主义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和党的纪律进行过斗争，使党成为一个狂热者的宗派。

当里昂代表大会刚刚改选了中央委员会并且选出皮埃尔·色马尔为党的总书记的时候，1924年1月21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逝世的噩耗传来。列宁逝世了！

里昂代表大会强调指出了列宁对党的一切教益，代表大会庄严地保证，要做列宁思想的忠实受托人，遵循着列宁的道路，要在法国锻炼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共产党经过这样的武装之后，投入了1924年5月的选举运动。根据里昂代表大会的决议，共产党向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建议以“工农联盟”的形式建立一个竞选联合阵线。

但是，社会党同赫里欧的激进党、同白里安的“社会共和党”早已举行过秘密会谈，并同他们组成了所谓“左翼联盟”的竞选联盟。这种阴谋欺骗了一部分工人阶级和一些劳动农民，因为这一“联盟”很有势力，并且拿包括从法国行动党的“积极分子”一直到有某些激进倾向的右派的所谓“民族联盟”的右派联盟的纸老虎来扰乱人心。劳动者本想挫败“左翼联盟”这一阴谋，但

大部分受了他們的欺騙。尽管如此，图尔代表大会以后第一次参加竞选的共产党，还是取得了二十六个議席。通过这次选举运动，有許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在巴黎地区更多，因为凡是共产党能够揭穿“左翼联盟”是资产阶级用来制服不肯追随“民族联盟”的人的另一翼的地方，那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共产党。

在許多省份里，由于政治上的混乱和尚未布尔什維克化的干部們缺乏訓練，人們把这个“联盟”看成了左派政治組織，而不敢加以指責。由于改良主义的法国总工会支持“左翼联盟”，担保它是工人立場，人們害怕自己可能受到孤立从而认为，“左翼联盟”的人当选要比民族联盟的人当选好。另外一种政治錯誤是，沒有让各地居民都同意“工农联盟”的候选人，而往往以純选举“联盟”的名义向居民提出他們毫无认识的一些候选人，同时也不給他們指出选举以后还要保持而且要扩大工农联盟的活动远景。

在维护了反对左翼联盟和民族联盟这两种资产阶级傾向的正确路线的巴黎地区，机会主义分子攻击了党，說什么党的鼓动工作是为了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为了选举的胜利。第一批投降分子为了爭取“更多的选票”和避免“选民的不安”提出把“党的旗帜掩盖起来”的問題。

数字是說明問題的：“民族联盟”失敗了，左翼联盟胜利了。至于共产党，虽然还不到五万党员，却获得了八十七万七千票，其中三十万票是在巴黎区得到的。在二十六名当选人中，有十四名是从巴黎区、巴黎市和“紅色地带”选举出来的。

选举刚一結束共产党就发表了一項声明，揭露左翼联盟的无能。

党在里昂代表大会所确定的第一个行动綱領的影响之下，甚至沒有维护已经取得政权的左翼联盟的正确立場，反而提出

“可以实现的各点”来“挖苦”左翼联盟，说它在执行这个纲领时克服不了资本家的障碍。这种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原谅了左翼联盟政府，把他们的责任推到大资产阶级身上，其实他们就是大资产阶级的备用工具。但是，预言左翼联盟将要垮台，特别是它将遇到无法克服的财政困难，倒还有积极的意义。

受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支持的赫里欧政府，违背他的财政纲领，并且根据樊尚·奥里约领导的财政委员会的建议提出了一个跟“左翼联盟”的诺言背道而驰的预算。赫里欧接着就开始审讯共产党，特别派人搜查了博比尼的中央党校。为了弥补财政寡头们向瑞士输出资本所造成的亏空，赫里欧发行的钞票达三十亿之多(1924年)，超过了法定限额。身为银行家的参议员马尔萨揭露了这种“秘密的”做法，使政府成为少数派……这就使赫里欧得以借口在“银墙”<sup>①</sup>面前失败而辞职，并且使他有日后再被起用的机会。

左翼联盟开始崩溃了。潘勒韦代替了赫里欧，他任命凯约为财政部长，凯约立刻宣布“大贖罪”期到来了。过了几个星期，凯约被“免职”。白里安接替了潘勒韦。白里安“断送了”手下的三个财政部长(鲁舍、杜梅尔、佩雷)，法郎还是不停地贬值。

煤矿业、法国生产协会和许奈特银行的领导人组成了一个“专家”委员会。当一英镑值二百零二法国法郎的时候，政府要求有不再作财政报告的全权。赫里欧执行了这种全权，他重新出任内阁总理。这时英镑的价值超过了二百四十法郎。赫里欧在出席议会的当天就被罢免了；这时捣乱分子在巴黎示威游行，潘勒韦又当上了总理。

1925年春天，就在这种财政危机和政治制度解体的气氛中爆发了摩洛哥战争。

<sup>①</sup> 指法国的金融垄断资本。——译者

## 第六章

# 摩洛哥战争

### 一、摩洛哥战争开始时共产党的情况

人们知道，1924年赫里欧政府在通过它的平衡主义策略来欺骗劳动群众和缓和资本主义压力的时候，作出了大量矛盾百出的决定。

例如，它在正式承认苏联政府之后，又在1924年11月28日下令搜查共产党的党部；在庄严地把让·饶勒斯的骨灰移入伟人祠之后，又突然削减本来就很低的工资。

1924年11月24日，移送饶勒斯骨灰的仪式是对党的思想坚定性的一次考验，因为党曾经宣传把移送骨灰的行列变成争取和平的示威游行。

十万巴黎劳动者参加了这次游行，收到了非常巨大的效果。

党的巴黎地区的领导人由于没考虑到由政府决定的这次正式游行的绝对合法性，从而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参加这次仪式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表明“将要发生突变的革命前期已经到来”。

因此，在“左翼联盟”政府执政时期竟作出了一些冒险主义的结论，喊出了诸如“立刻夺取政权”或“成立革命法庭”一类的口号！这说明党未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现实的政治形势。

托洛茨基主义的曲解进入了党内，这种曲解主要是没有得到指导委员会批准就出版了鲍里斯·苏瓦林的托洛茨基纲领性小册子《新方针》而引进来的。

罗斯梅和莫纳特等人也离开了《人道报》编辑部，企图把党的领导拖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去。

像苏瓦林之流的某些分子居然说出“共产国际组织已经腐朽，必须烙它一下”。针对他们的这种态度，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于1924年5月宣布开除鲍里斯·苏瓦林，并建议法国共产党领导不仅要注意党的意识形态的一致，同时还要按民主集中制的结构决定党的组织。由此，罗斯梅、莫纳特、洛利欧、杜努瓦、帕兹和德拉加尔德等人成立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集团。

取消了省委的基层组织，成立了二十四四个地区委员会，每个地区委员会包括三个到五个省。每个地区委员会划分若干总支，直接领导地方支部和企业支部。

人们过分偏激地执行了企业支部的口号，以致走上了另一极端：把不在工厂中工作的地方党员也划归企业支部领导。以前是忽略企业工作，专搞地方工作，现在又放弃了地方工作，专搞人为地组成的企业支部的工作。

中央领导机构设立鼓动宣传、工会、青年和殖民等“工作部门”，中央领导机构称为“中央委员会”。

尽管改变组织做得很机械——例如规定到1925年1月1日所有旧的地方总支一律解散，但是由于这种布尔什维克化的结构而使党迅速地发展了。

《支部日报》搞得有声有色，从而产生了吸收党员和展开活动的新形式；这一点也说明了，党在企业里的政治活动完全可以同工会活动协调起来。



党中央出版了理論月刊《布尔什維主义手册》，从而取代了由苏瓦林继续发行的《共产主义通报》。

中央委员会各工作部門由于党员各負专責，发挥了个人专长，从而促进了这种組織上的发展。

因此，“殖民地部”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殖民地部”的指导下，在反对摩洛哥战争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

## 二、反对摩洛哥战争的行动

在对摩洛哥进行殖民征服的战争之前，西班牙的独裁者普里摩·德·里韦腊已经进行了一场战争，里夫的军队在1924年9月打败了他。

法国共产党领导机构曾经給阿卜杜勒·克里姆拍了一封由皮埃尔·色马尔和雅克·多里奥签署的电报，全文如下：

“法国共产党議会党团、法国共产党指导委员会和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全国委员会祝賀摩洛哥人民在反对西班牙帝国主义分子中所取得的光辉胜利。

“我們向摩洛哥人民的英勇領袖阿卜杜勒·克里姆致敬。

“我們希望摩洛哥人民在反对西班牙帝国主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后，继续同法国和欧洲的无产阶级一道对包括法帝国主义者在內的所有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直到摩洛哥的土地获得彻底的解放。

“摩洛哥独立万岁！”

“殖民地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万岁！”

当法国军队进攻摩洛哥的时候，法国共产党指导委员会提

出了三个口号：

- (一)即刻同里夫人举行和平談判，
- (二)承认独立的里夫共和国，
- (三)从摩洛哥撤軍。

党不是只提出这些口号，还立即动员了劳动者，并进行了紧张的鼓动工作；在月亮公园举行了有一万八千工人参加的示威；接着在社员墙前举行了有六万人参加的示威；在全法国都召开了群众大会；在各工厂里都举行了示威和罢工，等等。

法国共产党议会党团充分利用了众议院讲坛作为宣传工具，而且他们从波旁宫发言，主要是面向法国劳动者，而不是面向议会的多数派。

马赛尔·加香和在以宣传鼓动“瓦解军队士气”罪下狱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的雅克·多里奥的发言，是利用资产阶级议会从事革命宣传的典范。

他们先指出里夫战争的真正原因，是银行、特别是巴黎荷兰银行的作用，然后揭下了发动这次战争的潘勒韦政府和它的前任——策划这次战争的赫里欧政府的假面具。

他们在讲话结束时，号召人们仿效黑海水兵和鲁尔兵士：“派到那里去的兵士会向里夫人伸出兄弟之手，他们将迫使你们进行和平談判！”

阿卜杜勒·克里姆命令将共产党议员的这些发言译成阿拉伯文，并设法分送到各个争取独立的里夫人的部落中去。

党立刻成立了一个“反对摩洛哥战争和叙利亚战争行动委员会”，因为法帝国主义也同时在叙利亚进行着一场殖民冒险行动。

反殖民主义工作的负责人皮埃尔·色马尔扩大了“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中除了共产党以外，还有法国统一总工会、

退伍軍人維護共和協會、共產主義青年團、無產階級團結委員會和“光明社”的知識分子。不久，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左派少數派的許多黨員，石烏的一些聯合工會和一些沒有組織的勞動者也參加了這個運動。

法國共產黨諾爾—加來海峽地區委員會書記莫里斯·多列士在同皮埃爾·色馬爾訪蘇回國之後被調到行動委員會擔任領導工作，他組織了幾次“反對殖民掠奪”的會議。

1924年7月23日，多列士寫信給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和改良主義的法國總工會領導，建議採取共同行動反對摩洛哥戰爭。8月15日舉行的社會黨代表大會不僅沒有答复這封信，反而宣稱：“反對向士兵們進行任何蠱惑性的宣傳，因為這會使士兵成為法國軍國主義和外國布爾什維主義政策的双重犧牲品”。

1925年夏天，巴黎、里爾、里昂、馬賽、波爾多、斯特拉斯堡和貝濟埃等地先後舉行了多次工人代表大會，共有七千三百二十位代表參加，其中改良主義的工會會員三百二十名，社會黨人二百名，自治工會會員三十一名，無黨派人士一千一百七十三名。

這些代表大會的任務是：提出反對摩洛哥戰爭的政治性總罷工的口號，按照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具體準備總罷工。

但是，黨也利用這種群眾行動加強了反對凱約稅法和爭取工人的合理要求的行動。

就在這時候犯了一個錯誤。這次總罷工未能收到奇襲的效果；罷工的組織者對准备工作遲遲地進行了三個月，使資本家們有了進行反宣傳和準備武器的時間，也使政府有了組織鎮壓的機會。

在總罷工的準備——這項工作由包括多列士在內的一個三人委員會負責——過程中，政府就逮捕了二百七十四名黨員，他們總共被判了一百二十年以上的監禁。

委员会以下列十二个城市作为活动中心，巴黎、里尔、里昂、馬賽、特魯瓦、維埃爾宗、尼姆、南特、卢昂、波尔多、图卢茲和里摩日。

这些分散在各地的委员会也没有把工作做得完善。因此，经过了几个月的討論，当商定的日期来到的时候，他們又請求行动委员会把罢工推迟一个星期，到1925年10月19日举行。

然而，酝酿了很久的这次罢工终于在10月12日举行了，参加罢工的有九十万工人；这是一次規模巨大的具有反殖民主义性质和政治性质的罢工。参加这次运动的除二十万矿工以外，还有十五万冶金工人、十万建筑工人和十万纺织工人。

在普托，共产党员薩巴捷埃在一次搏斗中牺牲了，使这一天成为光輝的日子。后来有十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共产党的理論武装得到充实以后，对反对摩洛哥战争行动委员会的工作进行了批評，并且通过对行动委员会所犯錯誤的分析，加强了統一战线的策略。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对危險考虑得过多，因而在1925年10月它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項決議，命令社会党党员“立刻退出反对摩洛哥战争行动委员会”。

这种不安只能使人們进一步认识到，在基层和在革命行动中的統一战线的经验是多么宝贵。

主要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軍隊中进行的秘密革命工作加强了。軍营中和火車中都发出了示威。

一些秘密小组甚至在駐摩洛哥的軍隊中，进行与摩洛哥友好的宣传，虽然那里条件非常困难，而且危險非常大。

“誰支持銀行家們所发动的这场战争呢？”《人道报》問道，“包括社会党在內的所有資產階級政党”。利奧太元帅的侄子皮埃尔·利奧太写給一个名叫瓦耳坦—佩里尼翁的信中有这样一

句話：“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樣，勃魯姆是深知底細的。”

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人同殖民主义者互相勾結的这种赤裸裸的揭发，大大有助于团结基层的策略，因为感到憤慨的社会党工人又加入了行动委员会。

这一运动也使党的领导作用得到了肯定，因为党把统一总工会和其他群众运动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领导它们进行斗争。党的报刊发表了来自各市的、统一总工会或改良主义工会地方总支的和与“行动委员会”重新发生联系的社会党各总支的提議、电报、決議和抗議等，因而在运动中也起了巨大的作用。

士兵們的信和可以引起另一些事件的事件都被刊登出来。在将近十个月的期間，政府只能从馬賽和賽特港运走士兵。革命的铁路員工使列車拋錨，或是把列車开往錯誤的方向。

只要指出有好些部队从前线撤回来和一千三百七十一名軍人在运动中被判了刑，就可以了解反对殖民侵略战争的列宁主义行动的功效。

至于共产党，党的政治局，像统一总工会的领导机构一样，遭到了法庭的迫害。

但是，经过1925—1926年的这次行动以后，党更壮大了。

党在经受魯尔事件的考验之后，又光荣地经受了摩洛哥战争的考验，在摩洛哥战争期間，党同殖民主义及其右的或左的一切同盟者进行了斗争，同时向劳动人民指出，他們的利益是同里夫人和德魯茲人的利益紧密相連的，他們應該同这些民族携起手来。

党遵循了卡尔·馬克思如下的教导：“如果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不对受宗主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的解放运动給予直接和坚决的支持，就不能够形成一个共同革命战线，因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

## 第七章

### 阿尔薩斯—洛林問題

#### 一、1925年的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

1925年9月20日，共产党代表大会在斯特拉斯堡开幕。会上，七百一十名代表除了討論反对摩洛哥战争的問題以外，还討論了复杂的阿尔薩斯—洛林問題。

从10月5日到16日，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英国等国政府代表在洛迦諾(瑞士)举行了一次會議。

最后議定书規定，战敗国德国按照凡尔賽条約各款承认萊因河的新边界，以及一些所謂“除在合法自卫的情况下”不得发动战争的維护和平的保证措施……

法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从斯特拉斯堡給参加洛迦諾會議的各部长写了一封公开信，揭露所謂的和平协定中包含着反苏战争的因素。

大会随后研究了党对于战争結束后又属于法国的阿尔薩斯—洛林的民族問題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阿尔薩斯—洛林的人民在由于“回到祖国怀抱”的大力宣传而产生某种狂喜之后开始发觉，换了国旗对于他們來說只不过是换了压迫者。

祖国的主要表現是用法国的官員、宪兵、兵士和法官代替德国的官員、宪兵、兵士和法官。

从前同德国大資本勾結在一起的大工业家現在只用法文改

了改他們的“公司名稱”就又同法國大資本勾結起來，勞動人民仍然受到迫害。成千名被列為“德國籍”的僱傭工人被驅逐出境，小商人和手工業者被剝奪，他們的財產被沒收。法國當局的代理人為了使阿爾薩斯—洛林的人民彼此對立，就任意地把他們劃分成四類。這裡85%的居民說德國方言，可是在學校里、官方文件中、報刊上却強迫使用法語。

因此，必然激起阿爾薩斯—洛林人民的不滿浪潮。反動分子——後來的希特勒的宣傳家們馬上就利用了這種不滿情緒，他們借口“反對法帝國主義”來欺騙當地人民，因為當時煽動人民起來反對法國帝國主義是很容易的事。

代表大會在《告阿爾薩斯—洛林工人、農民和手工業者書》中（它表明黨在意識形態方面有了進步），明確地“要求自決權”，希望阿爾薩斯—洛林人民“通過自由的公民投票確定自己的抉擇”。

同時，書中還揭露了只為教權派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所謂自治運動的卑鄙企圖。

斯特拉斯堡代表大會普遍地引用了列寧的教導，大會指出，“壓迫國家的共產黨人有義務捍衛自決權，甚至包括分離權，但這並不等於必須分離。”

代表大會的宣言指出，只有在下述條件下共產黨才能支持公民投票，這就是：保證公民投票必須沒有帝國主義的任何影響或壓力；在組織公民投票以前，法國的軍政當局必須撤出阿爾薩斯—洛林。

最後的口號是：“阿爾薩斯—洛林屬於阿爾薩斯—洛林人！”

這種立場雖然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對於阿爾薩斯—洛林的具體現實情況，特別是群眾的革命覺悟低這個情況，考慮得不够。

阿尔萨斯—洛林的共产党还受着社会民主党的小资产阶级影响的支配。教会的影响也相当大，因为政府与梵蒂冈签定的协议仍然存在。党的领导人呼贝尔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他屈服于社会民主党的压力，并且甘愿让莫雷尔之流的混进领导机构的冒险分子牵着走。

正因如此，曾经使法国统治者和阿尔萨斯—洛林大工业家们惴惴不安的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付诸实行。

一年后，各种自称拥护自治的团体在共产党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委员会的支持下成立了祖国同盟。呼贝尔和莫雷尔听任资产阶级团体去领导“国民行动”，而不去维护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的主张，因此，他们最后被开除出党。

不久，他们就成立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集团，如同他们过去领导党的地区委员会时站在右派立场上一样，这时又深深地陷入了左倾空谈的泥坑。

这种向教权派“立场”的投降，不仅仅是由于受到敌人连续入侵而产生的思潮影响的阿尔萨斯—洛林共产党人数少和思想弱。在党这一方面，没有充分向法国无产者进行解释也是一个大错误。

资产阶级马上就利用了大部分居民喜欢“阿尔萨斯—洛林从德国人手里收复回来”的爱国热情，谴责法国共产党希望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把阿尔萨斯—洛林从法国分割出去”，说它认为“这两个地区不可避免地会重新落入德国人手中”。

因此，由于没有大规模的、明确的宣传运动，本来能够同鼓吹自治的煽惑性政策进行斗争的阿尔萨斯—洛林的真正的革命者，竟未能得到法国劳动人民的支持。



## 第八章

### 公开信

#### 一、1925年12月的会议

斯特拉斯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不到两个月，党又在伊符里召开了全国会议(1925年11月)。

当时正是变摩洛哥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引起严重混乱的时期，这个口号是巴黎地区党的领导人特兰在把饒勒斯的骨灰移入伟人祠后不久提出的。这种极端的左倾主义很自然地在党内引起了改良主义的反应；1925年5月竞选(市镇选举)运动以后展开的“城市建设和公路管理”运动，使党成为左派集团的尾巴，使党走向分裂。

党在所得的选票受到重大损失(仅巴黎地区就损失五万票)以后，并没有进行自我检查。

宗派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人们并不是从政治方面清除与苏瓦林、莫纳特、罗斯梅、洛利欧、杜努瓦、帕兹等相勾结的右派分子或托洛茨基主义分子，而只是解除了他们的行政职务，以致使他们有可能指责党内缺乏民主。

基层党员根本没有听到任何理论说明，也没有得到讨论领导上“处理”情况的机会，因而他们不相信被解职的人“有错误”。

因此，最正确的决定也由于机械地执行而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例如，为了监督和领导革命工会——法国统一总工会——的工作，党决定组织一个八人委员会；统一总工会联络局四人；

党政治局四人。

工会代表們反对特兰关于拥护“革命法庭”的論点，因为他们們联系群众，知道特兰的論点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八人委员会分成两个互相敌对的小集团，使党和法国統一总工会对立起来，这不但无助于工会的活动，反而給統一总工会带来了混乱。

政治局作出什么决定来結束这种危机呢？它决定把八人委员会中的四名法国統一总工会代表全部吸收到政治局，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一切敌对現象！

党的这种宗派主义的机械的作法，表现为逐渐脱离群众，因而群众不了解党的口号，也就不再按照党的口号行动。

在工人群众大会上，党的許多发言人不是尽力作簡單明了的解释，而是用“这是共产国际作出的决定！”这类官腔来答复无产者所提出的疑問。

基层的工人党员很清楚地看出，这是有意規避，因而表示不滿。

党的领导机构，不但不接受基层的意見，糾正自己的錯誤，反而限制党内不可缺少的民主，压制批評。

鉴于在伊符里召开的全国會議沒能找出使党陷于孤立的“革命詞藻”的根源，共产国际执行局坚决主张征求全党的意見。

最后，政治局决定在1925年12月1—2日召开一次由中央委员会特別會議組成的有各区委书记和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人参加的扩大会議。

应邀前来发表意見的各省的代表，一致抗議反对领导的独裁作风，反对他們官僚主义地排斥党的所有老干部，反对用口号来指揮削弱党的“革命体操”。

尽管各区代表对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对苏珊·吉罗领导的意見不一致，这次會議仍然是“大快人心的會議”，苏珊·吉罗的

冒险主义终于被揭露出来了。

会议的大多数通过了一封给党员的信，虽然这封信还有错误和缺点，但是它使党能够纠正政治路线和进行内部整顿。

## 二、《给全体党员的公开信》

《公开信》首先指出12月1—2日的会议标志着“党的生活史上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接着分析了政治形势以及着重提出将来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公开信》指出，统一战线的策略从来没有通过正确的措施和群众的形式来彻底执行。《公开信》说，只有“自下而上地经过全面考虑”而制定的“统一战线”，才能实现和生效。它不应该是从一个领导到另一个领导以官僚主义的提案方式以及再加上一些像“对摩洛哥亲善”那样毫无内容和极不现实的口号而制定的。

《公开信》主张建立地区和地方行动委员会作为统一策略的基础，它谴责了把这种统一看作同社会党领袖联合的党的右倾观点。

最后，在对独裁的作风和对蓄意排斥密切联系群众的“老前辈”干部的作法加以谴责以后，《公开信》批评了党的工会负责人的官僚主义作风，谴责他们不是“灵活地在工会中进行说服工作”，而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这封《给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并不是毫无缺点的，但是，它已经为党开辟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在总结中，它要求党必须布尔什维克化。

在当时，自我批评只是刚刚开始，错误的根源还没有消灭，统一战线的策略也没有得到充分阐明，因而还不能保证党不产

生机会主义的倾向。

1926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届会议)在会议期间的大部分工作是对法国和法国共产党内的形势进行了分析。

执行委员会在关于法国资本主义结构的演变的权威性论述中指出：

“工业的集中、财政资本日益扩大的影响、财产的转移，在法国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一次最大的社会阶级分化。在议会制度范围内平静地发展着的古老的民主法国，已为一个新法国所代替，在这个新法国中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迅速激进化的破产的平民阶层，企图提出政权问题和通过议会以外的手段来解决政权问题的各个阶级。

“对立的政治的一极，是通过大银行联合起来的工业、商业和农业方面的大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掌握着经济命脉；它组成了强大的卡特尔和托拉斯；它随时可以指使自己的银行要求偿还二百亿短期贷款，从而随时制造议会危机。它不再满足于在议会中为它作代理人的腐朽的政党了。

“因此，大资本企图使议会永远服从自己的利益，或者利用它来粉碎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反抗，并且要用议会以外的手段来解决社会中的矛盾。

“与此同时，法国大资产阶级由于被出口狂热所推动，由于通货膨胀而大发横财，由于战胜德国而冲昏头脑，因此它企图继续在欧洲大陆和殖民地实行帝国主义扩张。”

执行委员会在分析了法国资本主义财政危机的原因和反应以后宣布：

“摆在我们党面前的首要任务是竭力向广大群众阐明无产阶级在反对大资本的斗争中的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只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并在强大的工会和群众性的

共产党内组织起来，才能在解决阶级矛盾的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

“因此，我们党的主要任务之一，不仅是通过宣传鼓动在广大无产阶级内部扩大自己的影响，并且要用组织群众的方法，通过组织去巩固这种影响。

“我们党必须充分意识到，如果它自己不争取工会，如果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加入工会，它就不能成功地领导无产阶级来进行阶级斗争。必须明确承认，直到目前为止，法国共产党还只是对工人运动的先锋队起作用。而社会党，则成为小资产阶级和在政治上落后阶层的尾巴。根据这种情况，法国共产党的右派制造了一套理论，说什么大资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围绕着通货膨胀、税收和盟国债务等问题所进行的斗争与无产阶级毫无关系。

“在法国，我们只有这样一种抉择：要么是无产阶级成功地把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大多数争取过来，通过革命的道路来解决当前应由大资本负责的危机；要么就象在意大利那样，小资产阶级追随大资产阶级，由大资产阶级建立以加强对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剥削为基础的反动统治，把全部危机的重担推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身上。

“在革命斗争的道路上，领导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带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层，把他们置于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下，在反对资本家的广大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这就是我们党的主要任务。”<sup>①</sup>

第六届执行委员会对1925年12月2日的《公开信》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一个大的进步，但也指出法国共产党必须迅速医治

---

<sup>①</sup> 《共产国际》，1926年3月号。

自己的“病症”。

委员会指出，根据列宁的教导，必须“说服，而不要压制”，它要求在党内实行民主，用通过广泛讨论得出的论据来驳倒右派，必须放弃那种“用通知的方式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想法。

1926年6月20—26日在里尔召开的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以《给全体党员的信》开始的整党运动中，广泛采取了共产国际的这些建议。

当论争开始时，形势并不很好。党员减少到五万人；法国统一总工会也失去了很大一部分会员；《人道报》正处于后退状态。

右派分子和“中派分子”组成了公开的集团，而且渗入了党的机关刊物。在洛利欧和海里乌斯“公然”写信给共产国际的时候，帕兹、马呼伊和罗亚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手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战争的论点》的文章，以后又发表了《二百五十人的信》，作为对《公开信》的答复。

还有另外一些文件发表在党的刊物上，共产党议会党团的某些成员也公开支持党内右派集团。例如，我们在一份右派文件中看到，必须“建立一些党的地方总支，因为那些支部是俄国的特点”。

文件还说，人们可以同意有“支部”存在，但支部不能有任何政治权力，只能由“总支”给予指示让它遵照执行。总之一句话，理论由总支发表，实践则是支部的事。如果考虑到企业支部的党员往往属于几个不同的总支，那就可以看到这种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情况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例如，让·勒诺为“暂时”恢复社会党地方总支的原有状态而提出取消支部的“战略撤退”。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右派坚持必须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联

合,并且认为“把群众和领袖分开的主张完全是空想。我们不能建立不要领袖的统一战线”。

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明确指出,最好的策略是在社会党中的劳动者面前揭露社会党领袖们一贯的背叛行为,从而争取行动的统一,不论这些领袖怎样反对。

共产国际的支持《公开信》的建议,使党采取了反对右派集团的坚决行动,不久,“二百五十人”集团也被肃清了。

苏珊·吉罗和特兰被清除出政治局。虽然有分裂主义分子亨贝尔多、摩兰和哥蒂耶三人表示强烈反对,第五次代表大会还是改选了中央委员会,并且把中派分子和右派分子都清除出去。

当时,党决定大规模开展吸收党员和宣传运动,并作出了《给党员的信》中未曾提到的实际结论。

## 第九章

### 塔底尤陰謀

#### 一、1926年要求恢復權利的鬥爭

果然不出共产国际第六届执行委员会所料，法国不久就爆发了经济和財政危机。

由于法郎貶值和随之而来的物价暴涨，法国統一总工会提出自动調整制的口号：要求工資随着生活費用而自然地調整。劳动大众很快就接受了这个口号，并根据它发动了罢工。大企业主用歇业来抵制罢工行动。并且，他們以“稳定貨幣”为借口，把普恩加賚捧上了台。

在里尔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过改組的中央委员会宣布：贊成由大資本家出資来稳定貨幣，并号召工人为不担負这些費用而进行鬥爭，首先反对由資產階級的“专家委员会”制定的数达八十亿的新稅收草案。

1926年6月和7月，在洛里昂、敦刻尔克、杜埃、紀沃尔等地自发地掀起了許多次要求恢復權利的运动。巴黎、馬賽和里昂的邮电部門也参加了这种活动。

为了引起政府鎮压和制造事件，叛乱集团聚众示威，特別在众議院前举行示威。

1926年7月11日，党在紅帽崗召开了一次反对凱約計劃的群众大会；7月26日，在“国际工会团结”的口号下，又在巴黎賽馬場召开一次群众大会。



起初，党对这些由基层自发掀起的罢工运动感到惊异，以后才控制了这种日益发展的运动，并且试图把它统一起来。党同法国统一总工会保持紧密联系，这往往使行动具有深刻的政治性质。

我們甚至发起了支持决定总罢工的英国劳动者的运动。布伦、敦刻尔克、波尔多等地的碼頭工人相继罢工，拒絕給运往英国的船只装貨。勒阿弗尔的海員拒絕接替英国海員，并且有十万矿工不顾法国总工会改良主义领导的反对，在1926年8月9日举行了声援罢工。为要求恢复权利而参加罢工的五金工人仅巴黎地区就有十万人。

当时，工会领导人缺乏经验，犹豫不决，同时犯了一些錯誤。对于一个失业者应该領取多少“生活补助”进行过爭論，并且撤回了要求二十五法郎的口号。由于担心被指控为煽动鬧事，巴黎地区法国统一总工会领导人同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取得一致意見以后，規定为十五到十八法郎的数额。

这是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影响的再度出現，因为一个革命政党提出的口号应当是“照发全部工資作为失业补助”，并且准备为爭取尽可能多的补助費而斗争。这时还出現了“监督生产”这一同样出自純改良主义的口号。在法国统一总工会取得党的同意以后起来反对“成批輸入劳动力”时，人們已经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抛之脑后。对于入境劳动者(数达几十万)的这种抗議，同沙文主义资产阶级的“他們来吃法国工人的面包”的口号如出一轍。入境最多的是意大利工人，他們是1922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执政以后从祖国逃亡出来或者被“强制契約”迫迁出来的。由于1926年法意敌对行动发展到双方军队都向边境集結的程度，党不得不表示支持外来的劳动者，反对法西斯。必須指出，当法国政府在法国社会党，特别是保尔·崩庫尔和列諾得尔

的贊助下，提出“战时全国总动员”的法律草案时，上述錯誤很快就被糾正过来，軍事准备也受到了譴責。

石烏提出的消除“連續浪潮”的策略由于遭到失敗而导致另一項錯誤，这就是法国統一总工会的領導不適当地把“不要局部罢工”的口号普遍化了。這項指示立即被改良主义分子和缺乏斗争性的工会所利用。他們借此拒絕一切地方或局部罢工的要求，尽管这种罢工有取得成功的可能。

企业主利用这种“罢工战略”，在个别的企业中强行降低工資。

1926年年底，当失业人数不断增长的时候，以募捐方式在“开工”的企业中开展的支援失业工人的运动遭到了党和法国統一总工会中某些領導人的宗派主义的反对。他們借口不应当让在业工人为失业工人出錢、承担危机的責任而制止了支援运动；其实当时完全可以建立起全国互助基金，当然同时要向得到帮助的失业者說明，他們应当如何迫使国家和企业主付給他們一笔解雇費，讓他們能过适当的生活。

此外，下述事实证明了一种中間立場的正确性：最主要的失业者的示威游行，恰好是在共产党所領導的并对失业者的救济作了充分安排的市鎮爆发的。

在1926年11月27日共产国际第七届扩大执行委员会會議上，执行局代表布哈林不得不声明說：

“法国共产党对所发生的階級力量变化的性质沒有足够的了解。

“从通貨膨脹政策过渡到通貨紧縮政策，从‘左派集团’的統治过渡到大資產階級的公开統治，也就是重工业和銀行业的統治，这种政权的轉移标志着大資本对工人階級采取坚强攻势的开始。对这一事实共产党未能給予充分的估

計。

“为此，党把整个注意力都集中在議会的各种策略上，而忽視对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动員工作。但是这个紧急时刻是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情緒极度高涨的信号，法国共产党却没有利用这种情緒，它表现得十分被动。”<sup>①</sup>

事实上，群众是完全拥护党的行动方針的，因为就在1926年这一年，党从自己所組織和监督的运动中吸收了五千名新黨員。

同一时期，法国統一总工会的會員也从五十一万二千人增加到五十四万一千人。

## 二、軍事計劃

法国共产党所发起的反法西斯运动，終于广泛深入群众，而使資產階級感到不安，于是，資產階級展开了一次旨在进行破坏的宣传运动。

激进党和社会党的刊物以反对意大利为宣传中心，掀起一股排外浪潮，企图反对党的正确立場，即援助我們的兄弟——意大利劳动者推翻墨索里尼法西斯統治的正确立場。

資產階級作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姿态，企图制造从中取利的混乱：既然他們也反对墨索里尼和“黑衫党”，工人階級就一定会同他們联合起来打倒法西斯主义。

这个阴謀很快就被党中央委员会揭穿。党中央委员会一再指出：反对法国資產階級和反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法国和意大利的无产階級应该并肩进行的共同斗争的两个方面。

---

<sup>①</sup> 《共产国际》，1926年12月号。

政府为了支持法国资产阶级的宣传，假惺惺地表示对墨索里尼分子的威胁感到不安，并向意大利边境调遣军队；墨索里尼也急忙向边境派兵。

政府的真正目的是想在1914—1918年的恐怖屠杀刚刚过去八年以后，重建一支新的帝国主义军队。

“部队编制”、“征召入伍”、“官兵员额配备”等法律草案，都得到社会党人的支持，一位社会党议员保尔·崩库尔甚至同意由他在议会上作关于“战时全国总动员”的报告。

政府为了掩盖这种改弦易辙并欺骗群众，在规定了“后备期”的同时，又把服役期限从十八个月缩减为一年。

巡逻队和“军事警察”的建立，战时全国总动员（不分老幼）的计划，以及未来士兵的军事训练和退伍军人的后备役期限的配合，确实可以大大加强法国的军事潜力。

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种以进步姿态出现的措施面前观望几天以后，终于揭穿了这一骗局。雅克·杜克洛和让·勒诺在众议院曾猛烈抨击社会党人、特别是积极参与这种极端重新军国主义化的保尔·崩库尔和列诺得尔。

“行动委员会”组织一次反对军事计划的请愿运动。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军队里鼓动起现役军人示威运动和后备兵的集体抗议。

资产阶级刊物疯狂起来，它宣传说，在布尔日、梅斯、布勒斯特、凡尔赛、布尔惹、夏龙、萨托里、阿腊斯、瑟堡等地都有数以百计的士兵唱《国际歌》。甚至说士兵们把受监禁的后备役人员都给释放了。

共产主义青年团巧妙地把军队里关于提高伙食、不许刁难、改善寝具等等日常要求同政治口号结合起来。

在这些活动所取得的具体成就中也暴露了党的缺点，党往

往听任他們单独行动。

資产階級报刊大肆攻击共产主义青年团，同时要求惩一儆百，但是这反而加强了組織青年领导反对軍国主义活动的傾向。

英国政府借口苏联工人和法国工人一样支持英国罢工工人，同莫斯科断絕了外交关系。法国政府虽然没有仿效这种作法，却毫无保留地支持英国。福煦还重弹了“对苏联进行干涉”的老調。

因多年監禁而被称为“囚徒”的安德烈·馬尔梯，从獄中发出一封《給福煦元帅的信》，他在信中号召劳动者行动起来，反对矛头指向苏联的战争威胁，要求他們“仿效黑海起义者的榜样”。由于这封信，他立即被加判五年監禁。

不久，法国政府以苏联駐法大使在莫斯科发表的一次談話为借口，也召回了它的駐苏大使。

劳动者看清楚了所謂法国加强“反法西斯的”軍事力量，不过是世界資本主义又想消灭苏联的前奏。

政府对中央委员会号召請願者团結起来反对軍事法令的行动感到恐惧，于是考虑进行全面镇压了。

### 三、1927年的《公开信》

1927年4月2日，共产国际主席团寄給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封长信，信中指出在临近預定于1928年举行的議會选举的时候，机会主义傾向日益严重，要求委员会对此提高警惕：

“党的全部政策應該是促使人們摆脱传统的議會生活，要通过广泛的階級斗争运动来领导明年的选举斗争。

“党所应考虑的选择策略不能是对‘左派’候选人放弃

竞选的手段，而应该是动员群众的方法；党必须坚决反对对‘左倾’政党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而且要在揭发‘社会党左派’的同时，谴责那种同社会党制定联合竞选名单的策略。”

共产国际的意见并没有彻底使党纠正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的一系列错误。

例如，1927年8月8日，为抗议美国处死两名意大利的反法西斯人士——萨柯和范泽蒂而在巴黎冬季赛车场举行的群众大会提出了“总罢工”的过激口号。

鉴于总罢工可能遭到失败，党的领导决定“恢复合法斗争”，并且从8月23日起，只在警察总监公署许可后才举行群众集会。

同样，当美国军团声称它要在巴黎游行并已得到法国政府支持的时候，《人道报》提出，党不“容忍这件事”，并号召举行反示威。由于未经充分准备，示威人数很少，只临时在克里希举行了一次群众集会，而杀害萨柯和范泽蒂的刽子手的同谋者却安然在巴黎市中心进行了游行。

在众议院，有人要求取消马塞尔·加香的议员豁免权，共产党议员却不投票反对。合法主义甚至发展到这种地步：接到判决通知书的党员竟自动携带提箱走进桑第监狱去。

1927年11月9—10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共产国际的来信，最后又决定发表一封《给党员的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指出，在目前，法帝国主义的政策是针对苏联的，战争威胁是劳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原因。信中也提出了势在必行的整党问题，因为，“由于阶级斗争的加剧，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变得更加严重了”。

“必须执行坚决反抗镇压的政策，要利用1928年的选举来反对民族联盟，不仅要组织议会斗争，而且更主要的是组

织群众的直接斗争，不仅要依靠选举人，而且要依靠包括千百万不参加投票的妇女、青年、士兵、殖民地和外国的劳动者在内的全体劳动者。

“在这场斗争过程中，党必须指出社会党领袖的有害的和反对工人的作用；由于他们放任自由，他们在客观上就成了民族联盟的继续。统一战线应该以阶级对阶级的方式组织起来。”

关于选举的策略，《公开信》中作了如下的规定：

“(1)第二轮选举和第一轮完全一样，共产党要以自己的候选人同资产阶级的候选人相对抗，不管后者是激进的还是反动的。在复选时，不能为反对普恩加索而选达拉第，也不能为反对马奇诺而选潘勒韦。

(2)共产党应该立即向社会党建议，在第二轮选举中组成‘工人联盟’，以便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候选人，而支持社会党或共产党的候选人。自认为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的两党，必须在同意一个最低纲领的条件下，在竞选中互相退让。

(3)共产党声明，如果社会党拒绝共产党提出的成立工农联盟的建议，共产党就要支持无产阶级的候选人，来同进行反革命活动、主张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反对共产主义的所有社会党领导人相对抗。”<sup>①</sup>

新的选举策略这样确定后，过了几个星期，法国共产党提出了最低纲领：完全支持八小时工作制，反对一切降低工资的措施，维护工会的权利，在“工农联盟”的基层委员会中建立社会党工人及其同情者同共产党工人或其同情者的统一组织。

---

<sup>①</sup> 《布尔什维主义手册》，1927年12月号。

以社会党和共产党劳动者所能接受的纲领为基础、目的在于揭露社会党领导人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的统一政策草案还不够明确，并且引起了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委员之间的意见分歧。

向法国社会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最低”纲领如下：

- “——完全支持八小时工作制；
- 反对一切降低工资的措施；
- 发给完全失业或部分失业的劳动者补助费；
- 争取所有法国和外国雇工的工会权利；
- 保护青年工人和妇女；
- 支持劳动农民、佃农或农业工人的同业组织；
- 减轻中、小农户的赋税；
- 取消消费税；
- 废除战债；
- 银行收归国有；
- 对资本课税、对下层人民减免税；
- 取消后备役期，立即无先决条件地实行一年服役制；
- 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危险而斗争；
- 保卫苏联不受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犯；
- 取消殖民地的一切现行特别法；
- 法国人和土著的服役期限相等；
- 释放一切被监禁的政治犯（包括按“普通刑事犯”处理的政治犯）、水兵、士兵和土著；
- 废除‘恶毒法’；
- 在工厂中建立统一战线，进行斗争。”<sup>①</sup>

根据共同的最低纲领的这些建议，共同行动的纲领可以概

---

<sup>①</sup> 《人道报》，1927年11月24日。



括为“以阶级对阶级”这个口号，很显然，这里说的不是一个单纯的竞选联盟，而是“一个阶级联盟，这个联盟有保证把共同行动扩大到选举范围以外的适当手段，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反对白色和三色反动势力的斗争”。

有些中央委员，特别是亨利·塞利埃和让·勒诺，主张“在第二轮选举时再沿用共和党的传统作法”，并且谴责“以阶级对阶级”的策略是“狂妄”的。多里奥和贝纳尔则主张“必须考虑特殊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宁可选举一个社会党的候选人，也不选举右派候选人。这样，他们指望利用第二轮选举不声不响地迫使我党无原则地退出竞选。另外，他们也主张领导上的统一。

拉波波特成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论点的拥护者，他毫不考虑社会党干部和反动领袖的政策是一路货色，而在对两者不同程度的危害性作了估计之后断言：

“我宁愿挨五十棍子，而不愿挨一百棍子！”

其他人硬说新的选举策略的结果将是选出反动的众议院。

《公开信》的目的是把举选运动放在第二位作为党的总方针的补充，由于它缺乏明确的说服力，因而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讨论的主要问题成了选举问题。

在1928年1月9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公开信》所确定的选举策略终于以二十三票对十三票获得通过。

1928年2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分析了法国的形势以后，批准了中央委员会的某些决议，补充了光明的前景，并特别指出：

“所谓社会党左派，在这一时期并没有表现为忠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不屈不挠的反对派，而更清楚地表现为混淆视听，竭力操纵社会党影响下的工人的集团，成了阻止他们转向共产党的障碍。”

有些人对新策略躊躇不决，有些人指責这一策略为“孤立和灾难的策略”。劳动人民对这两种人的回答是：在1928年5月議會选举中投了共产党一百零七万票，比1924年多了二十万票。由于选区的划分和投票的規定，党得的一百零七万票只取得了十四个議席；而法国社会党得的一百六十万票却取得了一百个議席；不过，在群众中間，还是共产党的声望高。

#### 四、策划阴謀

《公开信》含混不清的地方所引起的錯誤，开始反映到統一战线的策略上。退出政权的激进党人和社会党人成了反对派，他們竟敢以同情的态度談論共产党人是“共和大軍中的流浪儿”来欺騙工人。由于与这些奇怪的联盟者結成了某种竞选联盟，或者只是領导上在某种方面达成了協議而未加說明，党在很多問題上割断了自己同工人的联系。某些地区的領导人忘記了列宁說的这种援助“等于用绳子帮助上吊的人”，他們居然同激进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举行了联席會議。結果，党不仅沒有从这种地方性的妥协中得到任何好处，反而使革命的劳动者认为党“妥协了”，以致党在他們中間丧失了威信。領导人之間商定的互相退让这件事，使选举人大为震惊；于是在議會中重新出現了机会主义，并且放弃了群众行动。

薩罗以政府的名义鼓励党的蜕变，并且划出了蜕化的范围，他在众議院宣布：“許可共产党自由活动，但不准在軍隊、殖民地和工厂中活动”。資本主义沒有改变。它許可共产党人进行一切活动，但不許他們革命。如果革命者同資本主义妥协，那么合法主义永远意味着放弃革命原則。

当时由于色馬尔被監禁，党的領导机构沒有坚决回击薩罗

的威胁，只把他的声明看作笑谈，而在第一次镇压浪潮袭来的时候，政治局又只看作是使右派选举人安心的选举手段！

在1929年2月17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党清洗了机会主义分子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政府看到党的力量加强，便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声称“共产主义就是敌人！”。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9年4月在圣德尼召开，因为皮埃尔·色马尔未能出席，由贝诺瓦·弗拉商作了报告。

弗拉商在分析了法国的形势、战争的危險和镇压的法西斯性质以后批评了党内的右倾，同时强调指出这种倾向是国际范围的类似倾向的反映。

实际上，代表们都曾发言驳斥托洛茨基的论点，也驳斥了认为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会自行缓和的布哈林论点。

雅克·多里奥由于害怕孤立而放弃了他的右派立场，并保证维护大会上多数人的路线。

大会宣布：必须对右派和托洛茨基主义倾向进行无情的政治斗争，同时着重指出，必须剥下这些取消派倾向的伪装。还宣布必须竭尽全力实现基层统一战线。

为了坚决领导劳动大众要求恢复权利的运动，大会决定向悲观主义者进行斗争，党要针对每一特殊情况采取适当的行动。

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大会决定在1929年8月1日举行“民族日”来反对即将爆发的战争。要求工人在这一天的十一时停止工作，走上街头，表示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由于在这以前政治局处于分裂状态，所以每个候选人都必须对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所确定的路线表示意见。因此，党领导的统一在这次大会选出的新政治局中便得到巩固。新政治局的委员是：亨利·巴尔贝、马赛尔·加香、皮埃尔·塞洛尔、

安德烈·費腊、貝諾瓦·弗拉商、雅克·多里奧、亨利·洛茲雷、安德烈·馬尔梯、加斯頓·蒙穆索、皮埃尔·色馬尔和莫里斯·多列士。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听信了人們背后对皮埃尔·色馬尔的誹謗(色馬尔正被監禁,无法替自己辯护),决定用集体书记处来代替他的党总书记的职位。书记处的成员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同意后确定如下:亨利·巴尔貝負責同共产国际的联络工作;皮埃尔·塞洛尔負責政治协商和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联络工作;莫里斯·多列士負責組織工作;貝諾瓦·弗拉商負責工会工作。这样做的实际目的是,以不显出在总书记处只更換色馬尔一人的方式把他挤掉。

1929年8月1日全国示威的口号引起政府加强镇压是必然的,因为政府已经决定禁止示威运动。

1929年6月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党领导的阿歇尔市鎮的一所房子里开会时,警察前来干涉。参加这次半秘密會議的人得到崗哨及时发出的警报,四散避开。只有留在房內躲进壁櫥的莫里斯·多列士被捕入獄。

由于党坚持8月1日的口号,政府进行了搜查和預防性的拘留。

1929年7月底,在圣乔治新鎮开会的中央委員几乎全体被捕。到8月1日前夕,共有四千黨員以“准备参加示威的嫌疑分子”被捕。

成千上万的工人不顾政府出动大批軍警进行镇压,也不考虑这次示威比罢工更危险,他們都按照拟定的口号高呼“反对反苏战争的威胁”。

普恩加賽政府的內政部长安德烈·塔底尤出任內閣总理,他提出了他那臭名远揚的“危害国内外安全的阴谋”的指控,对

党发动了一次有计划的镇压。

塔底尤在洗劫了党部和法国统一总工会之后，又攻击《人道报》，派警察洗劫了该报馆。为党和党的新闻机关以及很多群众组织管理财产的“工农银行”也被指控为接受莫斯科津贴而遭到搜查。党的日报被迫停刊了。“合法主义”分子，特别是某些因职务关系而资产阶级化了的当选人腐化堕落了，并且组成一个所谓“工农党”来和党对抗。这个党把巴黎的七名市议员拉去了六名，即亨利·塞利埃、加尔歇里、若利、日利斯、卡斯太拉兹和卡米伊·雷诺。在圣德尼（多里奥的分裂影响已在这里开始露头），在克里希，在下塞纳省和卢瓦尔省，由于佩特吕斯·富尔的影响，也都发生了类似的背叛行为。机会主义分子在法国统一总工会中掀起了同样的运动，并且试图利用大部分领导人被监禁的机会再一次对“工会政治化”进行诽谤。

弗拉商、腊卡蒙、古尔多、杜提叶耳、米多耳、科斯特和其他中央委员，在监狱中同已被监禁的皮埃尔·色马尔、马尔梯、瓦扬—古久里、加布里埃·佩里、拉康、布通内和多列士等会合了。

党陷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中，党员人数日益下降。混在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合法主义分子把8月1日的示威称作使党脱离群众的“暴动企图”。

中国将军和白卫军在满洲对苏联发动的武装侵犯证明，党号召劳动者示威游行所反对的战争威胁并非无的放矢。

机会主义的倾向，特别是由习惯于“合法职务”的当选人、工会常务秘书所表现的机会主义倾向，通过《人道报》的合法主义倾向显露出来。党已决定根据圣德尼代表大会的决议，委托皮埃尔·色马尔负责对《人道报》进行整顿，只是等待他恢复自由。

地下活动并没有怎样推进党的加强政治路线的工作，法国

統一总工会代表大会(1929年9月15日)則使这种政治路线更迷失了方向。

譴責“8月1日的冒险”的少数派集团(包括一些法国共产党党员)又提出了工会独立的論点,“因为共产党的全面监护使法国統一总工会成为非法组织了”。

有一百四十八个工会被拖到这种立場上去,但占絕大多数的九百四十三個工会都譴責这种立場。少数派还继续批評“斯大林的冒险政策”,某些工会甚至开除了一些支持統一总工会代表大会多数派意見的会员。

这时,党不得不采取相当的措施,以适应塔底尤的阴谋所造成的形势。这种措施是党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取得联系以后决定的。

## 第十章

### 巴尔貝—塞洛尔集团

#### 一、共产国际的指示

前面已经談过，1929年4月7日在圣德尼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任命的集体書記处中有亨利·巴尔貝和皮埃尔·塞洛尔。

此外，在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中代表法国共产党的亨利·巴尔貝，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員。

1928年年底，共产国际执行局看到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勇战斗精神已经挽救了党在反对軍国主义斗争中所表现的懦弱和动摇，因而想使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优秀干部进入法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給党灌輸一些新的血液。負責西方問題的共产国际代表曼努伊斯基和皮亚特尼茨基同时建議，把法国統一总工会中有能力組織胜利罢工的优秀成員也吸收到党的新领导机构中来。

这种革新的目的是想消除直到那时仍然存在于党政治局内部的右派、机会主义和合法主义的傾向，同时“监督”共产国际所不信任的某些领导人。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召开了一次會議研究这些問題。青年干部和经过考验的党员雷蒙·居約、弗朗索瓦·皮佑、亨利·洛茲雷、古斯塔夫·加洛潘、安德烈·費腊和皮埃尔·塞洛尔等参加了这次會議，他們都贊成巴尔貝代表共产国

际所提出的观点。

征求在獄中的多列士和色馬尔的意見时，他們也都表示贊同。

圣德尼代表大会实现了这个指示，因为塞洛尔、費腊和洛茲雷被吸收到政治局中来。

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个集体领导（巴尔貝—塞洛尔—多列士—弗拉商）。莫里斯·多列士在1929年4月21日《人道报》上写道，党有了一个“集体負責的政治書記处”。

当多列士还被监禁，書記处由巴尔貝、塞洛尔和弗拉商負責的时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对此正式表示支持，于是在1929年12月发表了如下声明：

“最近几个月来，法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它显示出克服外来困难并战胜内部反抗的坚强意志。”<sup>①</sup>

因此，由“年轻的和工团主义的”成员組成党的领导核心这件事，无疑是得到共产国际同意的。

但是，巴尔貝和塞洛尔犯了很多宗派主义錯誤和其他严重錯誤，例如，由于极力贊揚共产主义青年“挽回了党的荣誉”的才干，結果使得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同党员对立起来。

由于他們的錯誤，本来是好事的干部更新变成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監視党的派別組織。

但是必須承认，党的领导机构，特别是集体書記处，也曾贊成他們的这种作法。

后来，在1931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會議上，甚至莫里斯·多列士在替导致这种錯誤的原則进行辯护时

---

<sup>①</sup> 《人道报》，1929年4月21日。



也不得不承认所犯錯誤应由集体負責，他說：

“我們从共产主义青年团組織中吸收干部的事情做得过分了，从政治局領導到省区和支部領導，处处都有他們。当然，是历史条件和尽快地把青年战士吸收到党的最高負責崗位上去的必要性要求这样做的。”<sup>①</sup>

## 二、派別活动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領導，特别是雷蒙·居約、弗朗索瓦·皮佑和費腊，完全支持由于巴尔貝和塞洛尔的宗派主义作风而形成的派別集团。

皮佑是这个集团的政治綱領的起草人，也是《共产主义青年在党的布尔什維克化中的作用》这本小册子的作者。

背后誣蔑皮埃尔·色馬尔是可疑分子，而且“可能是坐探”的謠言，也使党的領導人采取了保密作法。党以防止間諜滲入和党的半地下性为借口，在提拔干部問題上排除了任何民主方式，于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領導人或这个集团的“心腹”就被引进各級党組織中来了。

与此同时，由于宗派主义的政治立場，党同社会党劳动者的統一战线也不能貫徹执行。在继续进行分裂活动的多里奧的勢力范围内，人們还可以看到共产党工人同社会党工人的激烈冲突。

一部分中央委員被监禁这一事实，既不利于討論，又使得整頓工作无法进行。

当时，为了反对旧的“合法主义”，共产国际所批准的党章規

---

<sup>①</sup> 《多列士全集》第2卷第1册第207頁。

定：凡被監禁的黨員都不得向資產階級法庭交付罰金。這樣規定的目的在於激起群眾的極度不滿，從而迫使法庭釋放被捕人員。但是，黨的報刊的負責人却長期被拘押在監獄里。

莫里斯·多列士自作主張不遵守這項規定，並且為了得到自由而交付了一部分罰金。他立即恢復了自己在集體書記處中的職位，並與巴爾貝和塞洛爾共同負責黨的工作將近兩年。當他的違反紀律行為受到批評時，他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寫了一份辯護，要求許可“黨在工作上不可缺少的”領導人不受這種規定的限制。

但是與此同時，莫里斯·多列士還對黨和勞動者隱瞞了他獲釋的情節。

很久以後，他不得不在《人民的兒子》中寫道：“我深信這派的領導者們是錯誤的，我不遵守他們的決定。我交付了罰款的一部分，我就被釋放了。”但是，他在1930年4月27日《人道報》上所寫的卻與此不同：“由於工人的行動我才得以出獄。”

為了不增加黨的困難，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很久以後認可了這種違反紀律的既成事實，但是明確指出“在一般情況下拒絕交付罰金的必要性”。<sup>①</sup>

因此，硬說不付罰金的這項反對合法主義的規定是由巴爾貝和塞洛爾集團作出的，是絕對不正確的，在這方面該集團只是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決議，特別是若尼亞·貝爾利奧茲在中央委員會給予了最有力的支持。

此外，在這個半合法的時期，黨的“技術”機構分成兩個活動部門，其中之一是秘密的，它的活動中心設於比利時。

共產國際特派駐布魯塞爾的常任代表斯捷潘諾夫，負責監

---

<sup>①</sup> 《人道報》，1930年10月7日。

督这个秘密机构的活动。

多里奥掀起一个公开攻击共产国际的宣传运动，控訴共产国际“发动了”改变党领导机构的“宫廷革命”。由于斯捷潘諾夫的指示，这个运动被粉碎了；斯捷潘諾夫在党的无可否认的削弱证明巴尔貝—塞洛尔集团的危害性以前，一直是这个集团的支持者。

在1930年3月举行的一次消极的全国會議以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曾邀請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共同研究了当前的局势。結果，决定改变过去引起如此不幸后果的作法。

在莫斯科商討以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會議上，貝諾瓦·弗拉商和亨利·巴尔貝作了报告，并没有譴責巴尔貝—塞洛尔集团。

在后来人們认为是“譴責这个坐探集团”的那一天，莫里斯·多列士签署了一份文件，文件指出：

“共产国际特别关怀我們法国共产党。共产国际的这种批評帮助所以成为必要和有利的迫切理由何在呢？

“难道是法国共产党执行了违反最近各次国际會議決議的政策嗎？絕對不是。法国共产党的总方針是符合共产国际的方針的。”<sup>①</sup>

这份签署日期为1930年7月的文件指出，在这一阶段，党领导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

从这份文件中还可以看到，党员人数从1926年的五万五千人下降到1930年的三万九千人；《人道报》的十八万訂戶减少了三万訂戶。

共产国际書記处建議法国共产党进行改变以后，亨利·巴

---

① 《共产国际》，1930年7月20日，第21期（轉載于《多列士全集》第2卷第1册第44頁）。

尔貝在1930年7月17—18日的中央委员会會議上致閉幕辞时說：

“必須坚决实现改变”。<sup>①</sup>

这次會議的決議“由政治局根据塞洛尔和多列士的报告作了修改”。<sup>②</sup>

同样，在一本包括貝諾瓦·弗拉商和莫里斯·多列士在1931年2月28日至3月1日的會議上所作报告的小册子里，我們可以讀到下面多列士报告中的一段話：

“我要以會議的名义向亨利·巴尔貝同志致敬，由于遭到迫害，他不能同我們一起开会，但是，我們刚才向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是他亲笔起草的。”

这一切都清楚地证明，巴尔貝和塞洛尔在政治局的同意下同党的另外两位書記——多列士和弗拉商一起工作过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后来有人硬說是在巴尔貝和塞洛尔“作为坐探集团被清算”以后。

根据連通器原理，为从政治上加强党的干部而“过分抽調”共产主义青年团干部，必然要削弱青年团。集体書記处主张在青年团的各級組織中都应有一名党的干部，以便进行监督、指导和帮助。于是根据集体書記处的決議，委托安德烈·馬尔梯代表政治局帮助青年团。

对此莫里斯·多列士写道：

“中央委员会指派一位最有才干和最积极的干部馬尔梯去领导共产主义青年团，这表明中央委员会具体领导和帮助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心。”<sup>③</sup>

平衡恢复了，把共产主义青年团放在党的先鋒位置的偏差

---

① 《人道报》，1930年7月24日。

② 《人道报》，1930年7月26日。

③ 《人道报》，1931年6月21日。

糾正了，“派別”也很快就敗露了。

在錯誤地認為只包括巴爾貝和塞洛爾二人的“集團”被揭發以後，人們才正式譴責他們所犯的錯誤。1931年7月，這個集團的成員之一雷蒙·居約承認了自己所參與的派別活動，並發動了對這個集團的清算。事情敗露了，處分卻很輕，並不像以後幾年謠傳的那樣。居約由於在自我批評中揭發了這個集團而“免於處分”。在1931年3月為這個集團編寫“理論”小冊子的皮佑同洛茲雷一樣，只受到了批評；亨利·巴爾貝和拒絕接受處分的塞洛爾下放到基層去。

從更新黨的干部的指示開始時就組成的這個集團的派別性質，甚至在被揭發以後人們也只承認這是錯誤而不是重罪，是過失而不是坐探活動。

這個派別集團受到譴責以後過了四個月，集團的成員之一弗朗索瓦·皮佑寫道：

“我所參加過的這個集團，在最近時期作了很多危害黨的事情。這個集團大大地妨害了黨的清洗和組織工作。因此，參加這個集團的同志們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sup>①</sup>

不久以後，黨的理論雜誌發表文章說：

“幾個月以前，集團的成員之一皮佑同志寫了一本關於《共產主義青年在黨的布爾什維克化中的作用》的小冊子。

“我們掌握了這本小冊子，認為它是這個集團的政治綱領。”<sup>②</sup>

塞洛爾仍然堅持共產主義青年起革命先鋒作用的托洛茨基主義論點，直到1932年10月，也就是在集團成員之一雷蒙·居約揭發這個集團過了十五個月以後，或者說在後來人們所謂逐出

---

① 《人道報》，1931年6月2日。

② 《布爾什維主義手冊》，1931年11月5日。

“坐探巴尔貝和塞洛尔”那天过了十五个月之后，他才被他所在的小組开除出党。

在最后确定开除塞洛尔的时期，雅克·杜克洛曾用这样的话向亨利·巴尔貝致敬：

“以领导‘这个集团’的巴尔貝同志为例。很清楚，他的錯誤特別严重，但是他认识到錯誤的严重性，并且开始糾正，以后他用自己的工作和正确态度证明他是一个誠实的党员，因而取得了党的信任。”<sup>①</sup>

1932年11月，亨利·巴尔貝被捕以后，党曾为他进行辯护，《人道报》几次要“立即恢复他的自由”。

在1931年作为从轻处理的理由的錯誤和过失，到1934年巴尔貝被开除以后才变成“坐探活动”。而到1936年，当这些事实已不为人所注意的时候，人們又故意歪曲事实，編造出一套“巴尔貝—塞洛尔坐探集团”的說法，把这个集团的同謀者的名字一笔勾銷。然后，人們竟把打倒这个“集团”的功劳归于这个集团的某些成員。

关于这个“集团”的历史真相已经清楚，現在应该說明它給党造成了多么重大的損失。它歪曲了根据经过考验的能力来选拔干部的准則，它利用卑鄙的阿諛手段使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党对立；它最后把党支部变成了脱离群众的、凶恶的宗派小組。

共产国际建議进行一次革新的改变，并向刚刚取消发言限制的全党最广泛地征求意见，这些建議終于被採納了，于是开始进行局部的整頓。

中央委员会扼要轉达了执行委员会的指示，莫里斯·多列士根据这个指示发起了一次运动，让党员打消顾虑，自由发表意

---

<sup>①</sup> 《人道报》，1932年10月13日。

見。

为此党書記发表了兩篇著名的文章：《党内不要傀儡》和《人人要自由发表意見》。<sup>①</sup>

各个地区委员会都为恢复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斗争。由于恢复了列宁的组织原则，一个新的入党高潮掀起来了；很多已经脱离党的党员又恢复了党籍。

为了保卫党中央机关刊物而在反击塔底尤阴谋的时候诞生的勇敢的“保卫《人道报》委员会”得到了发展，达到两千个，《人道报》的印数也迅速上升了。

党的力量加强了，以前不能贯彻的统一路线，现在又能执行了。

日益加剧的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威胁，必然要起推动争取和平和自由统一行动的作用。

---

<sup>①</sup> 《人道报》，1931年8月14—21日。

## 第十一章

# 反法西斯行动和同社会党人的联合

### 一、阿姆斯特丹—普累耳

法西斯的威胁出现在国家的大门口。

墨索里尼的“黑衫党”以越来越狂暴的镇压方式来束缚意大利。

在德国，由于凡尔赛条约的不公平条件而产生的和由于鲁尔区被占领而激起的民族沙文主义运动，显然变成了希特勒上台的运动。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战争。

1933年<sup>①</sup>6月26日，党竭力响应两位伟大知识分子——亨利·巴比塞和罗曼·罗兰倡议召开“反对战争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号召。虽然社会党工人国际在受到邀请后拒绝参加，大会仍然于1932年8月27日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两千名代表。有很多意识到法西斯威胁的社会党党员，不顾他们党的阻止，参加了大会。

阿姆斯特丹宣言号召“尽一切人力物力对尸骨供应者——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宣言向苏联致敬，并声明：“我们不许侵犯苏联”。

在巴黎布里野大厅，有三万名劳动者对部分代表在返国途中喊出的上述口号表示热烈的拥护。

---

<sup>①</sup> 应为1932年。——译者



德国共产党书记恩内斯特·台尔曼于1932年10月也来到布里野大厅，向法国无产者说明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军队所造成的危险：他们正在利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拒绝参加统一行动的机会准备攫取政权。

莫里斯·多列士被派往德国，向莱茵河彼岸的工人阐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理。

对共产主义怀有刻骨仇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主张“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宁愿选择兴登堡元帅，并且通过同反动势力混合投票把这位元帅送上了德意志帝国最高座位。

兴登堡先后任命馮·施莱彻尔和馮·巴本为总理。巴本受任总理后立即解散了普鲁士的社会党政府。社会党政府未作任何反抗。

以后，兴登堡借口这些内阁不稳定，同时慑于国社党冲锋队武装队员的威胁，于是在1933年1月20日<sup>①</sup>把总理的头衔奉送给他们的首领阿道夫·希特勒。

一个月以后，即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和戈林的走狗纵火烧毁德国国会大厦，元首希特勒立即宣布：“这是上帝的意旨！现在，我们要消灭共产党！”

正如共和国总统保罗·杜梅尔被白俄戈尔古洛夫谋杀后塔底尤硬说应由共产党负责一样，希特勒也指控纵火事件是在德国政治避难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策划的。

在很多国家都成立了反对战争的民族委员会，在法国也巩固地组织起来了。根据意大利总工会和德国工会反对派的倡议，1933年6月23日在巴黎普累耳大厅召开了一次民族委员会

---

<sup>①</sup> 应为1933年1月30日。——译者

欧洲代表大会。包括一百三十一名受迫害的德国代表在内的三千名代表，把反对战争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行动联合在一起，同时成立一个“世界反战和反法西斯委员会”，这就是历史上的“阿姆斯特丹—普累耳委员会”。

虽然形势有了迅速的发展，群众也动员起来反对法西斯，但是社会党的领袖们仍然拒绝参加阿姆斯特丹—普累耳运动。

1933年9月21日，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到莱比锡法庭去受审时，他的名字已为人所熟知，而且成了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褐色瘟疫”的象征。

失火的时候，有一个疯子范·德·卢勃在国会附近被捕。

全部罪状都以这个被收买的人为依据，他在预审时承认自己受季米特洛夫指使，同时还告发了两名保加利亚的政治避难者塔涅夫和波波夫，以及德国共产党议员托格勒。

但是，在起火时国会大门是关着的，只能从一条地道进到那里。这条地道的另一端通到原告即国会议长赫尔曼·戈林的私人住宅。季米特洛夫在揭发这种无耻挑衅事件的真相的同时，对原告提出了控诉。

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抗议甚至也博得了资产阶级人物的同情。亨利·托尔斯律师主动地出来替季米特洛夫辩护，德·摩罗·吉亚费里律师高喊：“纵火犯就是你，戈林！”

当展开辩论的时候，愤怒变成了激情。虽然季米特洛夫不了解预审的基本内容，也不知道外面发生的情况，但是，“他不是以债务人的身份，而是以债权人的身份”昂然出庭的。他“在法庭上既无所请求，更无意博取同情”。

他质问咆哮如雷、姿意侮辱的赫尔曼·戈林说：“部长先生，我这些问题使你感到为难吗？”“证人”戈林完全失去了自制力，同时看到这位“正义人士”异乎寻常的“不可侵犯”和从容不迫，

于是命令法庭“把被告带出去，以便避开他进行辯論”。

全世界的抗議迫使他又让季米特洛夫回来参加辯論。当戈林用无耻的言詞肆意辱罵的时候，季米特洛夫以革命者的安詳态度来对付法西斯的歇斯底里，他声明說：“我对部长先生的回答非常滿意！”

季米特洛夫虽然知道自己性命旦夕难保，他仍然揭发了原告所表现的歇斯底里的物质原因，他肯定告发他的人“是嗎啡狂癮者，精神病患者和小偷”。結果证明，納粹帝国的陆軍元帅确实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癮君子。

在世界抗議运动日益扩大的形势下，当时还比較軟弱的納粹政权最后不得不作出让步。希特勒本打算通过野蛮的挑畔在德国消灭共产主义，实际上，他只能使千百万劳动者的眼睛更加明亮，使他們的反法西斯行动更加团結。

1933年12月23日，萊比錫法庭被迫作出释放判决。为了把仍然被押的季米特洛夫从納粹分子手中解救出来，苏联立即給他以苏联国籍，并且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去迎接。季米特洛夫到达苏联以后，人們感到无限欢欣，曾举行好几次示威游行。

法国无产阶级广泛地参加营救季米特洛夫运动，这一行动加强了阿姆斯特丹—普累耳委员会，并且为社会党和共产党劳动者的統一战线打开了广闊的前途。

## 二、1934年2月事件

促使社会党和共产党和解的决定性因素是法国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

除了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降低和失业以外，农民也在极度窘困的境况中掙扎，中产阶级則随着愈益加速的商业破产而日

趋沒落。

法国的资本主义当然不会采取唯一有效的对策，尤其不会采取共产党所主张的按财产比例征收的累进税。

恰恰相反，财政巨头们却仿效德国和意大利，打算用法西斯主义来克服经济危机。这个解决危机的方法就是箝制全国舆论，征集青年入伍，准备一场新的战争。破产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陷于赤贫的千百万失业者，为组织法西斯同盟招募“亡命徒”提供了便利条件。

不仅有拉罗克的“火十字团”和“退伍军人”，还有太汀格的“蓝衫党”，摩腊和多代的“法国行动党”的“法国保皇党人”。

这些流氓在巴黎警察总监叛乱分子夏普及其外省同僚所指挥的警察的袒护下，向售卖共产党报刊的人进行侵犯，向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进行袭击，并一再挑衅示威。

法西斯同盟使用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行之有效的”蛊惑性宣传。它们虽然是由大资本家支持的，却大言不惭地自称反对“银墙”，它们一边同“法兰西王位的觊觎者”帕里斯伯爵相勾结，一边却象“火十字团”那样吹嘘自己热爱共和国。

这时，一件丑闻就可以作为更狂妄地进行反对共和制度的宣传的理由。恰好，斯塔维斯基给它们提供了这个机会。

斯塔维斯基计划成立各种虚拟公司，先由合伙人把不值钱的东西或股票按金价抵押后，再用市立信贷券去贴现。

这个狡猾的骗子把前警察总监于代洛、前大使德·丰特内、巴尔迪·德·富尔土将军以及其他一些“显要”人物都安插在他的“董事会”的领导地位上，让这些人来保证他的骗人企业。

本身就是叛乱分子的巴黎警察总监夏普，发给斯塔维斯基

所申請的各种執照。一家受賄的報紙替他作“財政”宣傳，議會中的同伙利用立法權力支持他，使他的一个心腹吉博·里布打入了激進黨喬治·博內部長的辦公室。

內閣總理、激進黨員和共濟會會員卡米伊·肖湯的親屬、檢察長弗雷薩，也根據他的請求批准了他的財政“騎兵隊”的期限和延長期限。檢察院財政科長、顧問普蘭斯接到一份關於斯塔維斯基過去活動的有說服力的報告，擱置了六個月也沒有進行調查，據說是“疏忽”了。

儘管竭力封鎖這項消息，到1933年12月，丑聞終於傳開了。叛亂分子組成的集團抓住這個把柄，譴責“共和國狼狽為奸”，“共和國一團糟”，並且發動示威或遊行，高喊“打倒盜竊分子！”的口號。

人們聽到在逃的斯塔維斯基在鄰近瑞士邊境的小木板房裡“自殺”的消息以後，感到非常忿怒。

當牽連在內的肖湯反對成立議會委員會對斯塔維斯基丑聞及其隱蔽起來的同謀者進行調查時，人們的忿怒達到了頂點。

叛亂集團的騷動，整個報界的指責——特別是鼓動者同斯塔維斯基有默契的報紙的指責，導致了肖湯政府的垮台。1934年2月初，達拉第接替了肖湯。

對於曾經揚言誰敢撤他的職“就跟誰拚命”的警察總監夏普，達拉第並沒有行使權力予以制裁，相反地，却請他擔任法蘭西在摩洛哥的駐節長官。但是，夏普悍然拒絕了。

在這種明顯的懦弱的鼓勵之下，叛亂集團的头目，巴黎的反動市議員，全國退伍軍人協會的領袖，紛紛糾集自己的嘍囉，於1934年2月6日在距離顯然是他們矛頭所指的眾議院附近的和協廣場舉行了反對“腐敗政權”的示威。

反对共和的示威的口号响彻全国。

《人道报》立即号召劳动者采取“反对法西斯集团，反对黑衫党和褐衫党等刽子手的示威行动”。

“但是，我党坚决要求劳动者决不能认为这样斗争就够了。如果不同时对给法西斯匪徒以姑息容忍、便利条件、助长他们发展的政府进行斗争，就不能战胜法西斯匪徒。”<sup>①</sup>

虽然拉罗克、摩腊甚至夏普都没有出场，但是，叛乱集团却在2月6日全体出动，企图向波旁宫进军。附近保护树木的栅栏被拔掉了，铺路的石块被堆成街垒，他们还推翻并烧毁公共汽车，甚至企图纵火烧毁海军部。

机动保安队感觉到自己要被侵犯的时候，才开枪驱散了他们。

反游行的工人们也急忙从郊区赶来驱逐他们。工人们高呼：“拥护苏维埃！”“打倒法西斯！”

在马赛、里昂、里尔和其他城市，法西斯的企图也同样遭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无产者的反击。

达拉第惊慌失措，虽然还得了三百票的多数，却不得不提出辞职。共和国总统任命前总统和苏伊士运河公司董事加斯东·杜梅格组阁。

尽管在新政府中有“被认为是正派激进分子”的赫里欧参加，但是，任命塔底尤、马尔盖、赖伐尔和贝当为各部部长的事实，说明了杜梅格的政治方向。

共产党领导机构笼罩着一股混乱气氛，因为它错误地被多里奥之流的冒险家们拖着走，同时向由右派汇成的反议会逆流作了让步。

---

<sup>①</sup> 《人道报》，1934年2月6日。

例如，2月7日《人道报》以《枪毙达拉第和弗罗》为题的社论把达拉第看作刽子手，但是没有考虑到这种同反对报刊毫无区别的立场所带来的不良反响。

平衡很快地恢复了，2月9日在共和国广场上，群众首次举行了反示威，多里奥在会上指手划脚，并提出“夺取政权”的口号，这使叛乱宣传有了警告舆论提防“赤祸”的机会。

警察袭击了在共和国广场示威的五万示威者，示威者也作了坚决的回击。虽然有六名示威者中弹死亡，但是反法西斯运动却从此展开了。2月12日，在十几个城市里，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无产阶级都联合起来，走上街头。

动员起四百万工资劳动者的总罢工，迫使叛乱分子消声匿迹了。

2月14日安葬被警察枪杀的牺牲者时，巴黎的示威人数也有所增加。

尽管叛乱集团看到一个右派政府接替了激进政府而感到高兴，但是他们不久就大失所望，因为反示威造成了社会党和共产党基层联合的激流。

法国社会党领导机构当时借口保持“戒备状态”，命令在巴黎的党员留在社会党的常设机构里听候指示。

但是，1934年2月9日，当听到共产党人正在同警察和叛乱分子搏斗的时候，社会党人便自动离开他们的所在地，跑来援助斗争中的共产党兄弟。

这时社会党领导人了解到，今后他们再也无法阻止他们队伍中统一行动的潮流。于是，他们由于希望尽快地分散这股潮流并转移它的方向，决定参加被反动派低估了的运动。

### 三、統一行动公約

尽管統一战线的策略处于搖摆不定的状态，但是当时正在成熟，因为它受到了2月群众运动的推动。

1934年2月12日，几万示威者在万塞納运动場发出的长久而有节奏的“統一行动”的呼声，扫除了党內的宗派逆流，这股宗派逆流的公开代言人是多里奧。

多里奧能够在社会党工人和共产党工人間制造隔閡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中央委员会要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多里奧和党的矛盾发表意見。

然而，党以前的錯誤是只在上层实行統一，沒有依靠基层；現在，当基层統一潮流形成以后，党又陷入了另一极端：拒絕同社会党领导进行磋商。

1934年3月3日中央委员会會議发表了一项決議，決議中包括一份对法国社会党的长篇控訴书：

“法国社会党由于它所执行的全部政策，必須对塔底尤再度上台和法西斯在法国的发展負責。

“它竭力把无产階級引向保卫資本主义的行动中。

“法国社会党和法国总工会背叛了并且继续背叛工人階級的利益；它們正在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后尘。

“共产党认为，在事变中有上百个地方实现了反对資產階級的統一行动，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党决心尽一切力量去发展这种統一行动；但是，这只有在对分裂工人階級的法国社会党和法国总工会作頑强斗争的条件下才有可能。”<sup>①</sup>

---

① 《人道报》，1934年3月4日。



1934年3月31日，莫里斯·多列士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机会主义者声称，不仅在進行反法西斯斗争时，而且在为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开辟道路时，人们能够而且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同社会党组织协调一致。

“他们建议同社会民主党结成同盟。巴尔贝同志在要求我们党中央同社会法西斯主义领袖进行谈判时，干脆已经站到机会主义的立场上。”<sup>①</sup>

一个星期以后，莫里斯·多列士写道：

“某些机会主义者向我们党建议，放弃基层的统一战线政策，而去执行同社会民主党结成同盟的政策。

“我们同社会党——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支柱毫无共同之处。”<sup>②</sup>

对于很多党员来说，统一行动意味着争取社会党的党员。莫里斯·多列士也对统一行动作出这样的定义：

“我们不希望同社会民主党统一。我们希望的是给社会党的工人创造转向共产主义的便利条件。”<sup>③</sup>

1934年4月27日，《人道报》发表了一篇共产国际的公报，公报邀请莫里斯·多列士和雅克·多里奥前往莫斯科，以便由共产国际主席团对多里奥同党领导的分歧进行仲裁。莱比锡审判中的英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这时已当选为共产国际的领导。

多里奥公然不服从党和共产国际的纪律，他拒绝出席，于是多列士单独前往莫斯科。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授权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多里

---

① 《人道报》，1934年3月31日。

② 《人道报》，1934年4月6日。

③ 《人道报》，1934年4月13日。

奧采取一切意识形态范围内的和组织上的必要措施”。

但是，共产国际还要尽最后的努力，它指出，“虽然多里奧已经走得太远了，但是他还没有完全轉到敌人的陣营。他是否有勇气悬崖勒馬呢？如果多里奧自絕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那就是他的过錯了。”<sup>①</sup>

莫里斯·多列士从苏联回国以后，可能由于接受了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建議，糾正了过去只是在基层实行統一行动而拒絕同社会党领导或他們的党达成協議的立場。同时他也不再像这次旅行前那样，称社会党领导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在季米特洛夫的领导，世界范围内的方向改变表明，以前在同社会党的关系方面所执行的“曼努伊斯基路线”过分倾向于宗派主义。然而必須考虑到，图尔分裂會議刚刚过去后法国共产党所处的情况，要求它明确地消除属于第二国际的派别的烙印，以免第二国际再度欺騙最革命的工人。党经过鍛炼并走上布尔什維克化的道路以后，与社会党的区别已经相当明显，可以在各不放弃自己的远景的条件下，根据两党的共同目标，考虑如何为更广泛地动員群众而进行和解。

1934年6月24日在伊符里召开的全国党代表會議上，莫里斯·多列士說：

“在我們同法西斯所进行的速度竞赛中，资产阶级总想占先。如果我們不能使統一战线跑得快些、更快些、永远快些，法西斯主义就会把工人阶级击败。既然我們不願意法西斯主义在法国出現，那就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求統一行动。”<sup>②</sup>

伊符里全国代表會議要求把多里奧开除出党。

---

① 《人道报》，1934年5月31日。

② 《布尔什維主义手册》，1934年7月号。

1934年6月27日的會議上，中央委員會決定宣布开除多里奧出黨，並譴責了仍然留在黨內的亨利·巴爾貝，因為他曾同聖德尼的分裂者<sup>①</sup>同流合污。兩個月以後，巴爾貝也被开除出黨。

遵照會議的決定，黨的領導機構採納了諾爾省法國社會黨省委會關於停止共產黨和社會黨間“互相攻擊”的建議。因此，前一個月被看作社會法西斯主義者的社會黨領導人也接受了“反法西斯主義鬥爭公約”的建議。阿爾圖爾·腊梅特代表共產黨議會黨團在眾議院向社會黨議員重申了這些建議。

在基層掀起的運動是這樣強大，以致以前用“五個字母”<sup>②</sup>答复共產黨支部向基層社會黨總支提出的統一行動建議的保羅·富爾，也不得不承認“他被迫進行了討論”。

法國社會黨答應在7月15日作正式答复，在這以前，塞納—瓦茲省和塞納省的社會黨省委會已經同巴黎的共產黨地區委員會於1934年7月2日在巴黎布里野大廳聯合舉行了一個反法西斯群眾大會。

前來參加會議的黨員和同情者遠遠超過了預料的數字，不得不把會場移到另一個大廳（惠更斯體育館），但是，這個大廳也顯得太小。

社會黨和共產黨的發言人一致強調統一行動的必要性，都不談“可能導致分裂的東西”，聽眾親如一家。

1934年7月14日，在社會黨舉行全國委員會審查共產黨提案的前夕，兩黨在法國社會黨黨部舉行了一次會談。

代表共產黨出席的有：馬賽爾·加香、莫里斯·多列士、蘇普、朗普、馬賽耳·吉頓、沃德利和皮佑。社會黨領導人出席的有：萊翁·勃魯姆、保羅·富爾、讓·濟羅姆斯基、弗洛薩爾、勒

① 指多里奧。——譯者

② 即merde(呸!)。——譯者

巴、塞佛腊克、儒斯特和代庫尔济厄。

准备簽訂的公約的具体細节是由共产党代表提出的。翌日，在2月事件中同共产党同志并肩作战的社会党积极分子的压倒优势的推动下，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以三千四百七十一票对三百六十六票决定接受統一行动。有六十七票弃权。

但是，由保罗·富尔、弗洛薩尔、格伦巴赫、馬克斯·多尔摩亚等反对統一行动的人激起的反对情緒仍然存在。为了克服这种障碍，拥护統一行动的人，如促使巴黎(社会党)省委会同法国共产党举行会談的季罗姆斯基和儒斯特，都作出了巨大努力。基层的党员积极分子和同情者的压力有力地支持了他們。

最后，1934年7月27日在巴黎唐布尔大街朋瓦萊飯店的一个不大的厅房里，社会党代表塞佛腊克、勒巴、儒斯特、布呂梅耳、拉果尔惹特和代庫尔济厄同共产党代表多列士、杜克洛、吉頓、苏普和馬尔太耳簽訂了“統一行动公約”。

“公約”規定，两党都要动員自己的組織、报刊、党员积极分子和当选人去发动群众反对法西斯組織；必須解除法西斯同盟的武装，解散法西斯組織。公約譴責了特別法令(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并声明为解散众議院和按比例代表制重新选举而进行斗争。

最后，公約号召用实际行动反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恐怖，并要求释放被监禁的反法西斯战士，特别是德国共产党書記台尔曼。

两党代表同意彼此不对对方組織的領導人和真心参加統一行动的党员进行批評和攻击。为了制定切实可行的統一行动計划，成立了一个两党各有七名代表参加的联络与执行委员会。

在共产党代表的一再要求下，公約确认联络与执行委员会所作的決議并在两党报刊上同时公布。

法国社会党的多数领导人并不是衷心接受这项公約的，第二国际的领导會要求他們拒絕签字。萊翁·勃魯姆把統一行动看作一种灾难，他悲伤地写道：統一行动“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灾难)”。

由于糾正了宗派主义的策略和坚持“自下而上的統一”原則，法国共产党把两个工人党所领导的劳动者的热情鼓舞起来。党立即利用已经取得的成就提出重新合并法国总工会和法国統一总工会的建議。

接着，党又根据以下原則向社会党领导人提出“建立唯一的劳动党的党章”的意見。

——譴責社会民主党奉行的将会导致建立納粹独裁的放弃政策和让步政策；

——同建設社会主义的苏联团結一致；

——在唯一的党的内部制定一个既有民主又有能为大家自願接受和遵守的紀律的章程。

这些意見沒有达成協議，但是合并工会的談判仍继续进行，而且很快地达成使法国总工会同法国統一总工会合并的協議。

与此同时，党並沒有忘記工人階級必須有同盟軍。1934年10月9日，法国共产党代表向社会党—共产党聯絡与执行委员会建議起草一个能够作为“劳动、自由与和平的人民陣线”的基础的綱領。

当天晚上，莫里斯·多列士在巴黎布里野大厅的統一會議上，发出了人民陣线的口号。

1934年10月底，在激进党南特代表大会的前夕，党中央委员会派莫里斯·多列士前往南特向激进党人闡明共产党人的意見：

“拥有强大力量并协助击退2月暴动分子的光荣的法

国共产党，决心为实现工人阶级同中产阶级劳动者的同盟，为反对自由的敌人而采取一切行动。

“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了争取苏维埃政权。我们确信，这是解救劳苦大众的唯一途径。但是，我们丝毫也不放松保卫体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合理要求以及维护和扩大民主自由(权利)的责任。”<sup>①</sup>

为此，法国共产党要求各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以及反对反动势力的激进党组织，共同保卫明确的而且能为大家接受的各项要求。

激进党在南特代表大会上没有作出有利的答复，但是，它起草了一个纲领。共产党领导机构采纳了这个纲领的要点，同时表示希望激进党人与社会党人执行这些要点。

1934年11月1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批准了这种主张。会议通过了莫里斯·多列士代表政治局所作的报告，他指出：

“所有这一切（激进党纲领），当然不是共产党人的纲领。然而我们认为，激进党声明中所陈述的这些愿望和要求也包括在共产党的纲领中，因为这些愿望和要求大体上都符合法国人民的要求。”<sup>②</sup>

社会党人的动摇和激进党人的拒绝都不能阻止从2月统一游行示威以来一直前进着的群众洪流。

共产党所散发的人民阵线纲领到处鼓舞起兴奋的情绪。

人民阵线纲领建议：

在政治方面：维护宪法，反对一切损害人民权利的任何改革企图。

解除法西斯同盟的武装，并解散它们。

---

① 莫里斯·多列士：《人民阵线的胜利》。

② 《人道报》，1934年11月2日。

根据苏联在国际联盟提出的建議实现世界各国的普遍裁軍。

在经济方面：使有产者承担危机的后果。严禁偷稅漏稅。对巨額收入課以累进附加稅，对巨大財產預征累进稅。

采取措施防止生活費用上漲。追究对法郎不断貶值应負責任的投机商。防止工資和報酬的任何削減。

給失业者以面包和工作。

給小农、手工业者和小商販以危机補助費，并准許他們延期偿还債務。

修改土地典佃契約。

确保退伍軍人的权利。

1935年的市鎮选举证明了这些建議的价值，在这次选举中，根据支持最低共同綱領的保证，在第一輪选举后为最有利的名单广泛展开了退出竞选的統一宣传，結果，共产党、社会党和激进党的名单胜利了。

1935年5月14日，內閣总理皮埃尔·賴伐尔去莫斯科，同斯大林簽訂了苏联在1934年向所有欧洲国家提出过的“互助条約”。

賴伐尔显然是在群众压力和懼于反对反苏侵略政策的人民陣线的情况下才同意簽訂这项条約的。同时，他也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把共产党置于非常为难的境地。

实际上，党的領導人和共产党議員曾多次反对“为了国防”的論点，并且拒絕通过借口保证法国防御德国和意大利而强求工人的当选人支持的軍事預算。

莫里斯·多列士、馬賽尔·加香、安德烈·馬尔梯在指出劳动者的主要敌人仍然是国内的帝国主义的同时，坚决地譴責了“为了国防”的謊言。

賴伐尔的如意算盘是，莫斯科会談的最后公报将在法国共产党内部引起糾紛，从而导致某些人的辞职。

公报說：

“它們(签字国)有責任首先保证它們的国防力量絲毫不受削弱。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了解而且完全贊成法国把武装力量保持在足以保证国家安全的水平上的国防政策。”

賴伐尔在众議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會議上用嘲笑的口吻提出了“共产党人对此又如何解释”的质問。

对他的回答是散发出千万张有深远影响的标語，这些标語連法国最偏僻角落的墙上都張貼了，上面写的是“斯大林英明”。

法国共产党指出，如果軍費支出和发展軍备只是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那么共产党人必須竭尽全力反对它。如果不是这样，他們就认为，一个奉行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合作的政策的国家，为了保卫和平和各国人民的独立，是應該建立捍卫国家的强大武装力量的。

共产党对国家軍事力量的态度，是以軍事力量所服务的那个总政策为轉移的。

劳动人民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皮埃尔·賴伐尔派的候选人在奧貝維利埃选区被击败了。賴伐尔看到他那“使共产党自行爆炸”的阴谋遭到如此可耻的失敗以后，就竭力使众議院拖延批准他在莫斯科簽訂的条約。

最后条約終於批准了，不过賴伐尔在这以前就被赶下了台。



## 第十二章

# 爭取面包、和平与自由的 人民陣线

### 一、在維勒班的第八次全国党代表大会

1935年6月12日，社会党牟卢茲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有利于人民陣线的提案，这项提案是在联络与执行委员会进行了七个月的讨论以后，由樊尚·奥里約提出的。

1935年6月25日，爱德华·达拉第代表激进党参加了在互助大厅举行的“人民陣线”大会，他还宣称，激进党人将“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共同的事业，并且表示了他们对控制着法国的“二百家族”的痛恨。

因此，在下一个月，即1935年7月14日，无论巴黎还是外省举行的传统游行都大大超过以往的规模，是毫不奇怪的。

14日上午，在巴黎布法罗体育场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集会，“阿姆斯特丹—普累耳”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亨利·巴比塞和雅克·杜克洛以及社会党和激进党的代表都在会上发了言。

代表着六十九个党派、团体、协会的一万名代表，庄严地宣布了人民陣线的誓词：

“用今天在全国各地集会的法国人民的名义，我们，1935年7月14日受委派的代表或人民联盟的成员，表示决心为给劳动人民以面包、给青年人以工作、给世界以和平而进行斗争。

“我們庄严宣誓，为解除叛乱集团的武装并解散它們，为保卫和发揚民主自由，为保证人类的伟大和平而团结一致。”

上述誓詞是起草人保尔·瓦揚一古久里在“我們宣誓”的呼声中宣讀的。

当天下午，約有五十万人的游行队伍从巴士底獄向国民广场行进。

游行队伍走到1851年牺牲在圣安东区一个街垒上的安省議員博丹的像前停了下来，朗誦貼在像座上的一张大字报。这就是当天上午所宣讀的人民陣线誓詞。

在国民广场的讲坛上，共产党、社会党和激进党的领导人向游行群众頻頻致意，游行群众虽然因为走路和反复唱歌已经十分劳累，但是仍然精神焕发。

在外省，7月14日也是难忘的日子。

法国共产党领导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它同社会党合并成一个唯一的法国工人党的尝试，它认为唯一的法国工人党才意味着人民陣线的巩固。

不幸的是，共产党代表在联络与执行委员会上提出的許多具体建議一直遭到拒絕，此外，社会党代表还表示不許公布“統一委员会”内部所进行的討論，否則就决裂。

在工会方面，特别是由于法国統一总工会中共产党领导人貝諾瓦·弗拉商、儒連·腊卡蒙、加斯頓·蒙穆索、皮埃尔·色馬尔和亨利·雷諾等坚持統一行动，对法国总工会的統一策略进展得很迅速。

1935年9月27日，两个中心的代表团签订了工会統一协定，并决定共同筹备1936年2月在图卢茲召开工会联合代表大会。

就在全体工人寄予莫大希望的这次大会召开前不久，1936

年1月22—25日，在党刚刚在最近市鎮选举中赢得的市鎮維勒班（罗尼省）举行了法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

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标志着党的生活的頂峰。这次代表大会是在经济危机和貧困的年代里召开的。追随德国和意大利的財政巨头并没有放弃用法西斯主义来解决困难的打算。同时，帝国主义正准备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

面对着这些公开的威胁，第八次代表大会依靠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在統一成就的推动下，发出了一些簡單明确的口号。不幸的是，人民陣线刚刚誕生，党的领导机构就考虑把它扩大和溶解，倡議为了法国的“自由、强大和幸福”而实行一种全国和解組織——“法国陣线”。这样一来，必然要作让步，必然要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有民族沙文主义色彩的口号，而且也必然要姑息人民陣线的真正破坏者。

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書記莫里斯·多列士的报告正确地指出了使人民陣线得到胜利和保持下去的必要結構。但是，对于党员來說，这个报告沒有指出任何明确的方向，也沒有指出能够对付社会党和激进党领导人的任何策略，因为他们大多数是被迫参加統一运动的，必然要玩弄阴谋进行破坏。相反地，这个报告不仅要求党员克制和耐心，还分析了那些伙伴的社会根源，說他們是“他們所代表的阶层的俘虏”，因而不要对他們加以攻击等等。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恢复了莫里斯·多列士的党总书记的职位，这个职位是1929年以后被集体書記处代替了的。这是最后一次按字母順序公布全部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名单。

\* \* \*

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口号是“通过人民陣线向苏維埃共和国过渡”。

这个口号把人民陣线的“共同綱領”看作一个过渡阶段，虽然这些同盟者可能不願意跟着共产党人走得更远。

但是，共产党人并不隱瞞自己的意图，在根据共同綱領爭取完全和彻底实现这个綱領的同时，还坚持向前，走向法兰西苏維埃共和国。

人民陣线的不断加强证明，这种真誠和公正的建議絲毫不妨碍根据一个局限性綱領同不贊成法国共产党最終目标的伙伴团結起来。

雅克·杜克洛在作关于青年問題的报告时，当然也一再強調必須成立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和共产主义青年的統一組織，并以下列两点作为基础：

“(1)进行反对法西斯、爭取自由、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斗争，为法国青年的利益和社会主义而奋斗。

“(2)本着最广泛的民主精神建立組織。所有成員完全有权自行解决統一組織在发展中产生的一切問題。”<sup>①</sup>

经过圣德尼代表大会后“抽調干部”所引起的危机以后，共产主义青年团有了蓬勃的发展：成員从1934年的三千五百人发展到三万人，「前卫」周刊发行額从原来的五千份增加到四万份。

让·勒諾所作的关于「拯救法国农业」的报告证明了党的思想和組織在农村中的发展以及所采取的行動的成果。

“共产党人不該以这样的面貌在农民面前出現，即只答应总有一天会讓他們享到幸福；而應該用以下的面貌出現，即从現在起就維護面包、和平和几百年来农民从封建主和国王手中夺回的自由。

---

<sup>①</sup> 維勒班第八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的速記通报(1936年1月22—25日)。

“必須让农民知道，我們党是給农民以土地的党，是减轻农民劳动强度和縮短他們劳动時間的党，是使农民生活富裕的党。”<sup>①</sup>

馬賽尔·加香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和行政报告，他指出現有党员七万四千四百人，分属于四千二百二十一个支部，其中有七百七十六个是企业支部。《人道报》每天发行二十四万六千份，其中仅塞納省就銷售十万零二千份。

刚当选为党总书记的莫里斯·多列士在閉幕詞中指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团結的大会”，这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团結，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团結，青年的团結，法国工人阶级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团結。

莫里斯·多列士在評論賴伐尔政府的垮台和談論人民陣线政府的前景时說：

“关于这个問題，经过大会一致同意以后，还有必要再說一遍，我們絲毫也不打算为资产阶级效劳，或者同流合污，参加內閣嗎？

“我們今后的态度取决于刚刚誕生的政府的决策和行動。

“我們对人民陣线政府的看法毫未改变，人民陣线通过我們法国工人和农民之間，革命者、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間的战斗联盟，将根据情况的需要有效地对付法西斯的进攻，同时为工农政府、为第一届法兰西苏維埃共和国政府鋪平道路。”<sup>②</sup>

书记处除了新选的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以外，还有雅克·杜克洛和馬賽耳·吉頓。政治局由上述三位书记和馬賽尔·加

---

① 維勒班第八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的速記通报(1936年1月22—25日)。

②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速記通报。

香、安德烈·馬尔梯、貝諾瓦·弗拉商、皮埃尔·色馬尔、呂西安·米多耳、加斯頓·蒙穆索以及两个候补委員，阿尔图尔·腊梅特和弗朗索瓦·皮佑組成。

巴黎和諾尔地区代表、圣德尼的共产党負責人吉洛在这次大会上宣布，多里奧的危机被克服了，自从这个“超級共产党员”被开除以后，該地区已经爭取了一千零八十四名党员。多里奧則成了賴伐尔的入幕之宾，并曾在圣德尼市政厅接待希特勒的特使。

吉洛在答謝人們对他的发言欢呼时說：“我知道，你們是向圣德尼的六百五十名党员欢呼，我絕對不能单独享有。”

其他代表不够謙虛，他們的发言，例如尼斯地区的代表維尔吉勒·巴雷耳在說明党为什么必須有“以全部時間从事工作的中央委員”才可能全面发展时的发言，使人感觉到浸透了政治雇傭观点。由于看到党在未来的議會中将得到很多的席位，某些代表在临近議會选举时就完全暴露出他們决心放弃生产以便担任議員或中央委員而“出人头地”的傾向。

因此，党在加强和取得选举胜利的过程中，也产生和滋长了蜕化变质苗头，这不能不給党带来严重的后果。

同时，出現了这种情况，人們一看到領導人的肖像就欢呼，被安排在最显要地位上的，不再是党的憨直的发言人。对領導人的崇拜开始使人們把党的成就都归功于各級領導人。

## 二、1936年的議會选举（4月

26日—5月3日）

1936年2月，唯一的法国总工会在图卢茲工会联合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它是改良主义的法国总工会和法国統一总工会

合并的产物。

为了取得这一成就，法国统一总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不得不作某些让步，主要是接受了不得兼任政治职务和工会职务的规定。

1936年3月9日，貝諾瓦·弗拉商和儒連·腊卡蒙写信給党的领导机构，說他們虽然不贊成妨碍言論自由的图卢茲代表大会的决定，但是，他們无条件地服从工会的紀律，并且辞去中央委員的职务。

被指定为議会选举中党的候选人的貝諾瓦·弗拉商也放弃了政治候选人的資格。

几天以后，政治局公布了一份接受貝諾瓦·弗拉商辞职的文件，并且表揚了他服从工会紀律的精神。

1936年4月17日，政府給予共产党在国家广播电台广播的权利。

莫里斯·多列士利用国家广播电台譴責了資產階級誣蔑党按照“莫斯科命令”行事的宣传：

“羅馬、柏林或任何其他外国的首都，甚至使我們深切向往(我們并不諱言这一点)的莫斯科，都不是决定法国人民命运的地方，决定我們命运的地方是巴黎！”

在广播結尾时，莫里斯·多列士越出初具規模尙待組織和加强的人民陣线的范围，竟然发出扩大人民陣线的号召：

“天主教徒、工人、職員、农民們，我們沒有宗教信仰，但是我們要向你們伸手，因为你們是我們的兄弟，你們和我們一样，被同样的焦虑压迫着。

“国民志願軍、加入‘火十字团’的退伍軍人，我們向你們伸手，因为你們是人民的儿子，你們和我們一样受着混乱与貪污腐化的苦难，你們和我們一样，渴望我們国家免于

破产和灾祸。”<sup>①</sup>

这个号召对于安定一部分人心无疑是有利的，但是，在革命的劳动者中间也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因为他们从左派的联合和1月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苏维埃共和国的诺言中看到的前景并不是恢复今后同红旗和《国际歌》联合起来的三色国旗和《马赛曲》。

“法国阵线”的口号破坏了人民阵线的团结，因为人民阵线的团结是革命的工人——六个月以前被称为“没有祖国”的无产阶级的团结。

1936年4月26日的选举来到了，在这次选举中，激进党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根据所有候选人共同签订的并作出诺言愿在当选后努力促其实现共同纲领，一致保证相互退让。共同纲领主要规定：

在争取和平方面：要求军事工业国有化，在国际联盟的范围内实行国际合作，根据1935年5月2日由约瑟夫·斯大林同皮埃尔·赖伐尔在莫斯科签订的法苏条约的原则，扩大条约完全公开的制度。

在争取自由方面：要求颁布大赦令；解除法西斯联盟的武装并解散它们；废除恶毒法；实行并尊重一切薪水阶级的工会权力。

在争取面包方面：恢复因危机而缩减了的劳动阶级的购买力；建立国民失业救济基金；劳动周缩减为四十小时；设置年老工人的退休金；制订大型工程的计划；重新规定农产品价格；支持合作社；制订银行业法令；修改法兰西银行的规章并取消其董事会；禁止退休或听候任用的官员参加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审查

---

<sup>①</sup> 《多列士全集》第3卷第2册。



軍火貿易；消除有价証券流通的弊端；实行納稅证制度；禁止資本外流，违者严加惩处；实行稅收民主改革（对七万五千法郎以上的收入課以差額悬殊的累进稅等等）。

在預示着巨大成就的第一輪选举的第二天，《人道报》发表了一篇題为《一切为了人民陣线》的文章，<sup>①</sup>文章說，“共产党将毫无保留地投盟友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的票”。

在第一輪选举中，为了使占先的社会党候选人当选，有一百四十名共产党候选人退出竞选；同样，为了帮助激进党或社会主义者联盟的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有一百三十名共产党候选人退出竞选。

1936年5月3日晚上，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最乐观的估計。

共产党所得选票从1932年的七十九万票增加到一百五十万票，議員人数也从十席一跃而为七十二席，仅塞納省就有三十三人当选为众議員。

法国社会党也有所进展，虽然党内反統一的人认为同共产党結成联盟一定会导致选举失敗，但是，它仍然得到一百九十万票。

团結在人民陣线誓言下的各个政党在众議院中取得絕對多数，它們在六百一十个議席中占了三百七十五席。二百七十名共产党候选人的退出竞选，对共同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人民陣线政府的成立正是这一共同胜利的結果。

多里奧在圣德尼被击敗了，皮佑在馬賽夺取了多里奧的走卒西蒙·薩比亚尼的席位。

这次胜利使党的某些领导人冲昏了头脑，他們开始执行很不符合1月在維勒班举行的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決議的策略。

---

<sup>①</sup> 《人道报》，1936年4月27日。

第二輪选举的次日，莫里斯·多列士向政治局提出参加正在筹备中的萊翁·勃魯姆政府的問題；他要求党不要仅仅在議會中支持这个政府，还要“作大胆的尝试，把自己的委托人安排在未来的內閣中”。<sup>①</sup>

在貝諾瓦·弗拉商发言指出維勒班代表大会一致反对参加資產階級政府的原則以后，多列士只得到少数人的支持。

1936年5月6日，莫里斯·多列士在互助大厅举行的一次記者招待会上不得不宣布：“我們认为共产党目前参加政府还是不适宜的”。<sup>②</sup>

1936年5月25日，中央委员会決議宣布只支持政府而不参加政府。決議最后說：

“面对希特勒的威胁感到不安的法国人民表示了他們热爱和平的愿望。法国人民希望結束法西斯对民主自由的威胁。法国人民要求摆脱经济危机，要求保证所有的人都有工作，要求让有錢的人出錢。法国人民是要求改革的。”<sup>③</sup>

为了实现改革，劳动者不再等待新的众議院授权給萊翁·勃魯姆所領導的人民陣线政府。

既然有了新合并的拥有五百万會員的强大的法国总工会，劳动者就开始采取行动了。

### 三、1936年的罢工

竞选运动期間对工人階級所作改善待遇的諾言，並沒有規定要很長時間才能实现，所以，当勃魯姆迟迟筹备未来的內閣，

---

① 莫里斯·多列士：《人民的儿子》1960年版第121頁。

② 莫里斯·多列士：《人民的儿子》1954年版第109頁。

③ 《人道报》，1936年5月26日。

而被决定下台的薩罗政府又不作任何改进时，劳动者再也忍耐不住了。

政治局委員、法国总工会铁路工人工会领导人皮埃尔·色馬尔写道：

“希望同志們不要抱任何幻想，认为不作努力和不进行工会活动就能实现有关切身利益的要求。”<sup>①</sup>

5月25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在很多工会负责人发言以后，中央委员会注意到了劳动者的压力，于是要求实现纲领，因为：

“中央委员会了解并赞成人民群众的意愿，但是，人民大众可以看到，人民阵线取得胜利后三个星期以来还一事无成。”<sup>②</sup>

在基层激流的推动下，工会不再等待政府成立就开始了攻击。

5月26日在勒瓦洛亚(塞纳省)的拉瓦累特工厂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要求权利的行动和罢工，这个工厂的三百名工人提出一份要求权利的请愿书，同时占据了工厂。于是开始“占厂罢工”。

当天晚上，圣图昂的共产党議員貝尔利奧茲同五金工人工会代表科兰去访问这些“占厂者”，并且在工厂的院子里举行了集会。罢工者的食物供应和文娱活动也都得到了安排。工人们邀请共产党当选人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代表团。

在伊西一莱一木利諾的尼烏波尔工厂，罢工者也占据了工厂，馬腊科夫的共产党众議員兼市长皮吉尼埃前去对他们作了食物供应的保证。

同勒瓦洛亚一样，人们在工厂“扎营”，在工厂的大门布置了

① 《铁路工人论坛》，1936年5月18日。

② 《人道报》，1936年5月26日。

“工人糾察队”。

5月27日，布伦的法尔芒工厂也爆发了“占厂罢工”运动；28日，雪铁龙、雷諾、西姆卡、紐姆埃—罗尼等工厂也相继罢工。继比朗庫尔、惹內維利埃、南太尔、默东、塞夫勒罢工以后，外省的企业也紛紛开始了罢工运动。在占厂罢工的工厂里响起了革命的歌声，妇女們为罢工工人做饭，乐队在他們“熄灯”前跳舞时給他們伴奏。

在共同纲领关于“增加工資、签订集体合同、实行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假期薪金照付、选举工人代表”等口号的推动下，占厂罢工运动蔓延到全法国。劳动者得到了当地居民的支持，居民們从烧水直至组织文娱活动，样样給劳动者以帮助。在他們工厂的墙上、窗上、烟囱上都飘扬着工会的旗帜，到处可以听到乐队为罢工者跳舞伴奏。资本家則施展各种手段进行挑衅。他們大叫大嚷这是剥夺，是布尔什維主义，是怠工。他們还试图制造一些事故来破坏罢工。但是，罢工者在紀律和兴奋之中，也注意到保护和保养厂內的机器，保管原料和产品，他們編制了詳細清册。干部、职员和工人們团结一致，使任何阴谋都未能得逞。

中央委员会写信向为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的面包而罢工的冶金工人致敬，并保证共产党和共产党議員全力支持他們。

右派报刊，特别是《巴黎回声报》，企图轉移目标，硬說“某些‘下級’工会代表的行动已经超过了共产党人，說他們是为希特勒德国效劳的两面派”。《今日报》說“莫斯科指揮着”这些罢工运动。

实际上，劳动者只是想利用有利的形势使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继五金工人罢工之后，建筑工人、化学工业工人、书业工人、食品工业工人、农业工会工人、职员、技术人員于1936年6月2

日都相继投入了运动。

馬賽、里昂、尼斯等地配合里尔、奥尔良、图卢兹、卢昂、貝济埃和布尔日的罢工，也行动起来。

到6月5日，計有五百三十家工厂的五十多万工人占厂罢工，最初投入运动因资本家屈服而停止罢工的还未計算在內。

由于在某些企业里发生了冲突，法国总工会联络局提醒大家，“必須維持秩序，不要阻止工厂管理人員出入工厂”。

6月3日，萊翁·勃魯姆受权組閣；6月6日，他向众議院提出他的閣員名单。雅克·杜克洛代表共产党向他保证，如果他愿意依靠人民群众来解决当前的困难，共产党将坚决給以支持。

1936年6月7—8日夜間，政府召集劳資双方代表到总理府举行了會議。

法国产业主全国联合会主席反对总工会所提出的“出人意料的要求”，他說，“像这样的提高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貝諾瓦·弗拉商回答道：“像这样的罢工您見过嗎？”

零点四十分，簽訂了《馬提翁协定》。

协定規定：

- 一、資方代表同意立即訂立劳动集体合同；
- 二、合同中必須着重包括下述第三和第五两条；
- 三、資方承认劳动者有加入并归属于职业工会的权利；
- 四、以1936年5月25日的工資作基数，从复工日开始，按以下递减比例調整：最低工資增加15%，最高工資增加7%；
- 五、在雇用工人十人以上的企业里，按照企业的規模应有工人代表二人或数人；
- 六、資方代表保证不因罢工而給工人任何处分；

七、在企业管理人接受签订的协定并与企业人员间进行有关实施协定的谈判以后，工会代表立即要求罢工者决定复工。

然而，很多资本家，特别是外省的资本家，利用工人在《马提翁协定》胜利以后全面复工的机会，拒绝在当地履行这项协定。

他们一面在农村散布谣言，说农民的土地很快就要被剥夺，促使农民起来反对工人，同时拒绝履行6月7日资方代表所接受的决议。

资本家们一面宣传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怖，一面又迫使工人继续罢工，并且希望造成混乱。在总罢工运动中沒有露头的警察，现在出来干涉孤立的罢工者，强迫他们离开所占据的工厂。有些企业的工人为了支持这些罢工者又恢复了罢工，因此，资本家的宣传机器硬说这些“祸首”已经暴露出得寸进尺的苛求。

党的政治局认为，罢工的延续可能导致工人的孤立，从而有利于目前表示要“干到底”的捣乱分子的挑衅。为此，1936年6月11日召开了巴黎地区共产党人的报告大会。

在会上，莫里斯·多列士宣布：

“把一个争取权利的运动领导好固然重要，但同时也应当知道如何结束这个运动。

“目前的问题还不是如何取得政权的问题。大家知道，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建立一个工农兵苏维埃的法兰西共和国。但是，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

“同志们，在法兰西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还没有具备。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们还没有得到全体农民的支持，农民还没有同我们站在一起，不能像我们一样地坚持到底。

“而且，在某种情况下，甚至还会失掉法国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层对我们所有的那点同情。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既然目前的目标是争取满足经济方面的要求，同时要在思想觉悟上和组织上逐渐提高群众运动，那就必须懂得，要求一得到满足就应该结束罢工。甚至我们的要求并未全部被接受，只要那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要求已经被接受，我们也应该懂得同意妥协。”

“我们必须懂得组织工作和准备未来；我们必须重复我们对皮维尔特在《人民报》上发表的那篇以《在目前一切都可能》为题的文章所作的反驳。我们进行了反驳，而且只有我们进行了反驳，我们的回答是：‘不，目前不是一切都有可能！’”

“我们不以工人阶级作赌注；我们不是一小撮肇事者，我们是一个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是法国首屈一指的党，是肩负着我国人民的希望的党，我们能够掌握我国的现在和将来。”

“党员们必须善于反对运动中的左倾偏向。”

“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是内部的斗争，而且在出现左倾的地方往往就是涉及党的整个政策的斗争。”

“……人们必须警惕左倾。对某些罢工的影响也应加以考虑。卡车司机的罢工就是这样。”

“我们的同志应该毫不犹豫地努力使罢工者迅速得到满足。同志们，不难设想，只要卡车司机罢工几天就会影响巴黎的食物供应。”

“这意味着同情冶金工人罢工发展情况的小资产者在买不到家庭生活必需品时也会激动起来。”<sup>①</sup>

<sup>①</sup> 《人道报》，1936年6月13日。

6月13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通过了莫里斯·多列士报告中关于“必须懂得结束罢工”的论点，同时指出，在过渡到第二阶段以前，还应该实行人民阵线的共同纲领。

1936年6月14日，在布法罗体育场有十二万劳动者高唱《国际歌》庆祝“争取面包的胜利”，然而，各地的罢工还没有完全停止。

罢工没有完全停止的主要责任应该归咎于资本家的阻挠和拒绝履行协定以及某些企业所玩弄的手段：他们把被迫用一只手拿出来东西又用另一只手收回去，换句话说，他们取消了工人以前已经取得的权利。

主张继续或重新开始行动的劳动者的不满情绪，也应该归咎于“人民阵线不是革命”或“我们无意触犯私有财产”等口号，因为这些口号显得过分“保证”了小资产阶级，或者说过分使剥削者安心了。

人们在批评复工号召时也批评了爱国的口号，他们把恢复平静的号召同我们党以后用来充实宣传的而且在1936年6月在舒济·勒·罗亚举行《马赛曲》作者鲁惹一德一李斯勒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时显示出最响亮有力的爱国口号混同起来了。

在几乎已全面复工的同时，议会通过了四十小时劳动周和假期工资照付的法律。小麦局成立了，商人得到了信贷，赖伐尔的特别法令被废除了。

由于群众和他们的当选人的配合行动，工人运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人民阵线执政那年的夏季，劳动大众第一次享受由老板出钱去海滨渡过十五天的休假。

但是，莱翁·勃鲁姆已经断言，人民阵线纲领的“其余部分”不能施行。



1936年7月14日，有一百万男女群众参加了从巴士底獄到国民广场的游行，莫里斯·多列士、莱翁·勃鲁姆、爱德华·达拉第、皮埃尔·科特都出现在讲坛上。在外省，游行的人数也都超过往年，而且在大城市里，往往有一个部长或政府代表参加。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了大资本家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当胜利冲昏头脑的劳动者放松了警惕的时候，托拉斯就人为地制造了一次财政恐慌。

面对着准备向富人征收的大资产税或累进税可能引起的冲突，勃鲁姆政府后退了，1936年9月它背信弃义地实行法郎贬值，从而降低了劳动人民购买力，侵吞了劳动人民已经得到的部分利益。

随后，莱翁·勃鲁姆又宣布必须“暂缓”施行纲领，这更鼓励已经取得胜利的资本家加强了反扑。

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雅克·杜克洛在众议院发言时声明：

“我们决不允許放弃载入我们纲领的各项措施，也不允許采取纲领所摒弃的权宜作法。

“不是奉行大银行所强加的政策，而是必须使富人出钱；为此，必须实行税收的民主改革；必须实行纳税证制度；必须控制资本外流，违者严惩。”

在提出征收所得税和大公司利得税的附加税的建议以后，杜克洛总结說：

“如果这些措施还不够，就必须对大资产征收特别税；必须把保险公司收归国有。现在是结束那种使操纵法律的人大发横财而使国家贫穷的制度的时候了；也是结束那种让穷人替富人出钱的时候了。”

莱翁·勃鲁姆希望不执行纲领而保持法国社会党的面子，

因而提出辞职，这时人民阵线的示威游行中流传着一句口号：“拥护多列士执政！”

莫里斯·多列士利用“人民的意愿”促使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改变态度，他改变了1936年1月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参加政府，“因为只有他们参加政府才能保证忠实地执行人民所通过的纲领”。

但是太晚了。莱翁·勃鲁姆不仅没有接受这项建议，而且在准备好第二次法郎贬值以后就提出辞职。这次法郎贬值和樊尚·奥里约实行的那次贬值一样，使最穷的人的购买力更降低了。

## 第十三章

# 西班牙战争

### 一、佛朗哥的叛乱

1936年7月19日，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告，佛朗哥将军发动了叛乱，他已率领西属摩洛哥的摩尔人军队渡过直布罗陀海峡。

1931年4月14日诞生的西班牙资产阶级共和国只存在了五年。在1934年10月莱鲁反动政府上台时，爆发了总罢工。阿斯土里亚斯的矿工们拿起武器占领了奥维耶多，并立即成立了地方苏维埃，建立了自己的红军。政府赶紧派遣外籍军团恢复了“秩序”。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受到政府鼓励的西班牙资本家们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就降低了工资。尽管西班牙共产党力量薄弱（不到两万党员），仍然建议成立一个反对反动派的“工农统一战线”，从而使彼此经常对立的各种工人工会取得一定程度的和解。

1936年2月的议会选举来临时，西班牙共产党人又充分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倡议建立人民阵线，使共产党同社会党、工人联合总会、阿札尼亚的左翼共和党和巴里奥的共和党联合在一起。得到三分之一以上西班牙工会会员支持的、实力雄厚但一直采取保留态度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选举运动中也参加了人民阵线。

1936年2月16日的选举获胜以后，建立了“人民阵线”政府，但西班牙共产党没有参加这个政府。

不久，右派在特別活躍的神職界的支持下掀起了一个（“人民行动”）运动，竭力煽动农民群众起来反对人民陣线。政府在分裂之后犯了不可寬恕的錯誤，因为它沒有实行自己在竞选綱領中所規定的土地改革，以致給反动宣传提供了有利的口实。

西班牙的大地主和資本家展开了一个促使国家貧困的运动，他們把自己的資本輸出国外，限制并破坏生产，制造国家貨幣貶值。

阿札尼亚領導的政府沒有罢免公然抱有反共和思想的陸軍总监佛朗哥將軍，而是把他調往加那利群島。反动資產階級把謀叛所需的各項費用源源送到那里。

1936年7月18日，佛朗哥平安到达太图安，准备把叛軍派往西班牙。

佛朗哥到达西班牙本土以后，于19日向未经过整編、有80%参加了叛乱的軍隊发出号召。

人民陣线政府惊慌失措，鉴于自己的命令和号召都不发生作用，它只好把武器分給人民陣线內的各个組織。这是1936年7月20日的事。內战就这样开始了。

佛朗哥背后不仅有西班牙反动派，还有希特勒——他在3月重新占領了萊因河沿岸的不設防地带——和墨索里尼。

西班牙政府根据法国和西班牙簽訂的正式貿易协定，要求法国人民陣线政府向它提供武器，并答应用黄金和現款償付。共产党支持这种符合国际准則的合理要求。

由于当时納粹德国外交部報紙《柏林波尔森报》声称“人民陣线的法国是今后必須予以打击的主要敌人”<sup>①</sup>，所以萊翁·勃魯姆政府在1936年7月25日宣布，它“将保持中立，不干涉西班

---

① 《柏林波尔森报》，1936年7月15日。

牙的战争”，虽然在这场战争中德国和意大利是公开支持佛朗哥的。

## 二、“不干涉政策”和“国际纵队”

尽管国际法西斯对于一个友好邻邦的合法政府的颠覆活动已经十分明显，但是勃鲁姆仍然主张维护和平，说什么“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进行干涉而引起其他国家也采取同样的行动”。

8月1日，法国政府向各大国发出一份可笑的呼吁书，呼吁迅速达成一项协议，保证绝对不干涉西班牙的战争。

勃鲁姆政府不等它提出的“关于不干涉原则的协议”草案得到答复，就抢先命令禁止法国把任何作战物资运往西班牙。1935年12月在马德里签订的贸易协定就这样在1936年8月8日被践踏了。

8月21日，意大利对“不干涉协议”草案表示同意；8月24日，德国也同意了这一草案。

但是，在法国政府过早地实行单方面封锁期间，法西斯国家已经把武器、弹药和军队运往西班牙，意大利法西斯报刊也发表了关于“黑衫党”在西班牙的运动和行动的胜利公报。

1936年8月6日，在为巴黎地区共产党员举行的一次报告会上，党的领导揭穿了不干涉协议的骗局，因为这项协议使叛乱分子可以取得外援，而由人民选出的合法政府却得不到外援，从而无力同叛乱分子进行斗争。

8月25日，世界反战和反法西斯委员会在巴黎举行了一次欧洲会议，会议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西班牙去，研究对共和人士给予具体援助的办法。

雅克·杜克洛代表法国共产党、让·季罗姆斯基代表法国

社会党、欧仁尼·埃纳夫代表巴黎地区工会联合会作了这次訪問的报告，結論是：必須“用一切方法”支持共和西班牙，因为杜克洛认为西班牙的失敗“意味着法国的灭亡和查理五世帝国的复辟”。季罗姆斯基同意杜克洛的看法，他还表示，“虽然我是个社会党员，而且将永远是社会党员，但是我在这个問題上却一直和共产党人雅克·杜克洛抱有完全一致的見解”。

但是，季罗姆斯基只代表社会党领导的少数。因此，必須組織几条战线的斗争：

(一)为了給予具体帮助，要动员共产党內的妇女和青年給战士們寄送医药，給儿童寄送牛奶和衬衣；

(二)动员群众对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解除封鎖，并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武器；

(三)組織志愿旅秘密开赴西班牙，在那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经派遣安德烈·馬尔梯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艾尔科利）组织了著名的“国际纵队”。

在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关系方面，党的领导并不仅仅对“不干涉協議的把戏”展开揭发宣传，也不仅仅号召抱有各种不同見解的劳动人民支持西班牙人民陣线的合法政府，还不断地敦促社会党的领导改变立場。

社会党对共产党要求会谈的信始終不作答复。即使答复了，也像社会党常务委员会1936年10月12日由保罗·富尔签署的一封信中答复的那样：

“我們认为，表示意見是国际組織的責任。况且，这种国际行动似乎應該着重在提高工人阶级的警惕性，而不應該考虑对人民陣线政府施加压力，因为这样作对和平是有害的。”<sup>①</sup>

不干涉政策的借口是所謂避免由列强对西班牙进行軍事干

涉而引起世界战争，现在，这种借口的欺骗性已经是无人不知了。

由于法英采取中立态度，德国和意大利的态度就更加强硬，它们公开把飞机、船只和军队派往西班牙。法英这种单方面的封锁使得德意能够战胜没有现代武器、飞机和医药的共和国军队。

国际纵队第一批志愿兵发出的动人的呼吁，又激起了成千上万的战士参加志愿军。意大利共产党旅和德国共产党旅在西班牙各条战线上挽回了他们本国人民的荣誉。

担保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会尊重自己的诺言的勃鲁姆，在1936年9月于巴黎月亮公园举行的著名的群众大会上充分暴露了本来面目，他宣称：

“我不会是法国的克伦斯基！”

这句话表明，勃鲁姆害怕他认为由于帮助共和西班牙而可能形成的共产主义制度更甚于害怕或憎恨法西斯主义。

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上台的克伦斯基，是苏联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中所推翻的一个过渡的执政者。

莱翁·勃鲁姆承认，他宁愿消灭西班牙共和国，绞杀它的社会主义力量，也不甘心让西班牙无产阶级掌握政权。

幸而不论在法国社会党人中间，还是在激进党人中间，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把反对法西斯主义看得比反对共产主义更重要，他们协助动员广大人民阶层从政治方面和物质方面支持共和战士。共和战士们虽然没有飞机，可是在意大利的卡普罗尼式飞机和德国的容克式飞机滥施轰炸的时候，他们却争先恐后地拿起步枪来进行战斗。

---

① 转载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手册》，1936年11月号。

只有苏联和墨西哥对于不干涉的国际协议采取了不同态度。尽管苏联距离西班牙很远，仍然在本国物资供应十分缺乏的情况下给西班牙政府送去武器和给养，而且并没有因此就引起像莱翁·勃鲁姆所预料的那样，“立即扩大战争”。1936年10月7日，苏联政府通知“不干涉声明”的其他签字国（苏联政府代表李维诺夫也在声明上签过字，但并未对此“抱有幻想”），既然这项协议遭到一系列的破坏，苏联政府也将恢复行动自由。

柏林和罗马对此未敢反驳，但是法国反动派却指控莫斯科单独撕毁协议，威胁了和平。其实，李维诺夫早就评论过这个协议：“它只不过是一块幕布，企图用来掩盖给予反对西班牙合法政府的叛乱分子的军事援助”。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看到无人支持苏联这种正义的立场时，就在地中海上进行海盗掠夺，击沉了载有武器、弹药和粮食的苏联货船共青团号、斯米多维茨号、提米腊捷夫号和马腊科尔夫号。

于是苏联政府不得不决定通知西班牙政府，以后只能由它自己在苏联各港口提运供它使用的作战物资和其他供应品。这对西班牙共和国来说是一次新的严重打击。

但是，法国的形形色色的“共和人士”却肆意谴责苏联遗弃了西班牙。其实，正是这些人曾竭力阻挠遭到国际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从它最近的邻邦取得援助。

在这期间，伊伦、巴达霍斯、格尔尼卡等英雄城市的名字已经无人不知。下述战役辉煌地显示了国际纵队的英勇：马德里战役（克累贝和尼科莱提〔蒂·维多里奥〕率领的第九旅，吕卡兹〔匈牙利人〕和加洛〔路易吉·隆哥〕率领的第十二旅，以及加里波营都参加了这次战役）、瓜达拉哈拉战役、特鲁埃耳战役、韦斯卡战役、莱里达战役等。在这些战役中，响应西班牙共产党的呼吁从世界各国前来支援的国际志愿战士们，同西班牙共产党人



一起，“宁願站着死，不願跪着生”。

这里有后来成为費边上校的費边，他来时只有十七岁；有夏尔·狄戎，他后来成为法兰西全国游击队的领导人；有1943年被納粹分子枪杀的杜蒙上校；有后来被流放死于奥斯威辛的昂里埃特·罗亚耶；有让·香特隆，1944年我們又看到他拿着武器领导里摩日的法国内地軍的解放战士；有罗耳一湯紀，后来在法国抵抗运动中任上校，1944年8月25日在巴黎接受納粹將軍馮·霍耳提茲的投降；有卡耳、香皮翁、福尔、勒比埃尔、“博布”馬提厄、韦尔略克、雅宁，以及其他許多應該提出名字的人。

从西班牙自由战线上受伤、残废和患病归来的六百名法国志願人員，在西班牙战争结束后七年仍然活着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一。

同“巴黎公社”旅、“馬賽曲”旅或其他英雄旅一起在西班牙牺牲的法国共产党員，“小路易”佩罗和他的同志們，都用自己的鮮血写下了法国共产党党史最光輝的一頁，写下了无产階級国际主义最生动的一頁。

那些在流血年代中活下来的人，过去是、現在仍然是我党可以引为光荣的英勇事迹的見证人。

## 第十四章

### 人民陣线的分裂

#### 一、人民陣线的錯誤

经过货币贬值和伴随罢工运动及社会法被通过而来的“暫緩”之后，西班牙战争是一次新的考验，在这次考验中人民陣线的队伍发生了分裂。

本来这种联盟只不过是领导机构的卡特尔，并没有组织严密的基层联系。要想使这种联盟持久和有力，必须贯彻实行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主张：

开展民主集中运动；基层委员会选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广泛的人民陣线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再选出依靠基层委员会负责监督执行人民陣线的纲领的全国委员会。

可是，在全国范围内建成的人民陣线委员会还不足一千五百个。那些不顾社会党和激进党中央或地方领导机构的反对、坚决主张建立委员会的党员们被指责为搞宗派主义。甚至有这样的事：誰要談論必須把那些混进人民陣线内部蓄意瓦解人民陣线的“伙伴”揭露出来，他就被指责为有破坏团结的思想。

試把保罗·富尔和达拉第之流的政客与季罗姆斯基或皮埃尔·科特这样忠实的同盟者比較一下，到底誰好誰坏呢？但是，人們却不分析保罗·富尔和达拉第所以出场的真正理由就把他們捧上了讲坛。

曾向1934年2月的法西斯暴徒屈服、坚决反对激进党基层

組織同共产党地方組織进行任何接触的前內閣总理达拉第，是迫于人民大众的压力才参加联盟的，他除了破坏联盟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目的呢？

毫無疑問，如果在1936年的势不可挡的群众运动中产生的人民陣线是从基层委员会組織起来的，同时我們全党都为成立基层委员会而動員起来，那末历史面貌肯定是会改变的。不仅“綱領”能够貫徹，而且还会由于采取一面援助西班牙共和国——何况西班牙还是用錢来向我們购买它所需要的武器——一面坚决打击法西斯势力的政策而使国际形势完全改观。

不进一步加强与共产党人最亲近的人的联系而使与共产党人最疏远的人安心的政策，是从企图把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陣线变成一个彼此不可調和的“法国陣线”的机会主义思想产生出来的。

決議曾經規定，要通过民主集中的方法把各个工厂和地方的“人民陣线委员会”組成一个全体代表都是真正由人民选出的最高人民陣线全国代表大会，但是，人們从来没有把注意力放到必須彻底实现这些決議上。

在政治方面，把三色旗同紅旗結合起来就能够爭取一些人加入共产党的作法确实取得了效果，从1935年年底到1936年年底，共产党员已经由十万人发展到三十万人。

但是，这种大幅度的增长也有不利的一面。

同十万“老党员”相比，被某些老党员称为“乘时而来的新人”的二十万“新党员”形成党内的多数。党的組織机构或基本教育机构远远沒能适应这种发展情况，远远沒能对这些新党员給以严格的思想教育。

同时，由于党内中央委員的职位和当选人的席位都增加了，党对党员的要求也降低了。

怎样才能团结那些还信奉天主教的新“党员”同时又能阻止他们送孩子去学教理问答呢？怎样才能团结那些原属过激爱国组织“火十字团”的新党员同时又能防止他们的变相的民族沙文主义呢？

当党中央委员会主张扩大没有基础的并且已经动摇了的人民阵线的时候，最坚持革命原则的党员曾批评党中央对社会党和政府的态度不够坚定。

广泛宣传的“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通过人民阵线”的口号，表明作了过分的退让妥协。

共产党领导机构虽然反对社会党常务委员会多数所通过的莱翁·勃鲁姆的罪恶政策，但是，为了两党组织上的统一，仍然同社会党常务委员会进行注定要失败的磋商。

当法国共产党政治局的一切建议都在各式各样的借口下遭到拒绝以后，共产党领导机构还表示同意进行秘密讨论。社会党发言人保罗·富尔在拒绝统一公约草案、两党议会党团联合建议、《人道报》和《人民报》互相协作的建议以及举行两党各级联席会议的意见的同时，还写信给“协商委员会”说：

“我们希望，这种保留并不意味着你们在接受我们的工作方法时还要让你们的地區委员会、支部和总支在我们的省委会和总支里继续进行活动，以便举行我们所能同意的联席会议。

“我们要求你们劝告你们的地區委员会、支部和总支不要一再向我党的各级组织提出举行联席会议的要求。

“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你们都赞成我们的意见，请即来函通知我们，统一委员会就可以迅速恢复工作。”<sup>①</sup>

---

① 弗·邦特在《布尔什维主义手册》1937年9—10月号中引用语。

莫里斯·多列士对这种公然破坏统一的阴谋作了让步，他复信说：

“我们仍然坚信，由双方就两党统一问题进行民主讨论的方法会加速实现人们所渴望的统一。

“但是，我们既然非常重视统一的事业，并且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决不让可能进一步阻碍统一委员会工作的任何困难继续存在，所以我们准备把你们的决议通知我们的各级组织，并且要求它们予以重视。”<sup>①</sup>

因而，虽然大家都知道并且都说统一的唯一基础是基层的民主讨论，但是却同意结束这种讨论以便在两党的高级领导间另行寻求一种不可靠的协议。

1937年6月，当勃鲁姆实行第二次货币贬值时，法国社会党左派——皮维尔派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一起在人民阵线召集的意见越来越分歧的群众大会上喊出“勃鲁姆下台！”的口号。

共产党人用力喊出的“勃鲁姆作出行动来”、“拿出飞机大炮来”的口号也强调指出不干涉政策所造成的鸿沟有多么深。

通过这个口号，无疑群众会很清楚地理解，说明自己理由的共产党为什么在上层间引起了分裂。但是，法国共产党领导却向那个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封锁、实行两次货币贬值、对财政巨头俯首听命并声称要辞职的勃鲁姆说，“必要时我们可以共同继续执政”。同时，共产党领导还提出了组成一个“莫里斯·多列士—保罗·雷诺的法国阵线！”的荒谬口号。

不愧为“资本主义忠实代理人”的莱翁·勃鲁姆，于1937年7月利用他的政府在参议院碰到困难的机会提出辞职，表示拒绝法国共产党领导所提出的拥护成立勃鲁姆—多列士政府的群

---

<sup>①</sup> 同上。

众示威运动。

继莱翁·勃鲁姆政府之后的肖湯政府，仍然以人民陣线为标榜，竭力避免与劳动者发生冲突，他还在就职声明中預許諾言，“决不侵犯薪水階級在生活条件方面已经获得的改善”。但是，他馬上又說：“前政府宣布的必須实行的‘暫緩’，在今天更为必要”。

这就是說，他反对工会为恢复由于法郎連續贬值而丧失的那部分利益采取任何合理要求的行动。

当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阿尔开幕的时候，人民陣线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 二、从阿尔代表大会到人民陣线的分裂

法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7年12月25—29日在阿尔(罗尼河口省)举行。

虽然人民陣线衰弱了，西班牙战争爆发了，社会倒退了，党代表大会仍然在轻松欢乐的气氛中开幕，因为在大会期間，代表們观看了賽牛和在大剧院上演的《阿尔女人》。

莫里斯·多列士作了《人民陣线的法国及其在世界上的使命》的报告，而把他认为次要的《工人階級的統一》的报告留給雅克·杜克洛去作。

让·勒諾作了第三个报告，論述了农民的合理要求。

有一千一百二十三名代表出席了阿尔代表大会，他們代表着三十五万名党员，《人道报》可以自豪地說，它的每日发行額已经达到五十万份。

但是，这就算达到頂峰，此后很快就走了下坡路。

莫里斯·多列士在承认人民陣线在策略上的一些錯誤和缺

点之后，指出了同他在前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不同之点。他在那次报告中曾說：“我們不是資產階級的政党。我們是工人階級的政党。我們从未同意以任何方式参加資產階級的政府。”<sup>①</sup>

这一次，多列士又強調他1936年在中央委員會上提出的个人观点說：“我們准备在一个真正的人民陣线的政府中負起我們的責任”。

为了表明“法国陣线”的观点沒有被放弃，他提醒党“必須把所有劳动者、民主人士和不愧称为法国人的法国人日益紧密地团結起来”，并且喊出了叛乱分子喊过的“法国属于法国人”的口号<sup>②</sup>，这使参加大会的大部分代表非常惊异。

从发言水平很低这一点可以看到，有半数代表的政治修养都不够，党在质的方面下降了。

忠实革命者的入党是不分时期的，但是，从一个成年公民的入党日期却可以推断出他入党的性质。显然，我們不能把1936年6月的党员同反殖民主义和反軍国主义斗争年代的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年代的党员相提并論。

雇佣观点在这个时期滋长起来，同时，对領袖的崇拜自然也随之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領導人和候选人的名字在党的标語上占有重要位置。有人想出了悬挂“党的候选人”肖像的办法。从前在肖像上写的是“請投共产党候选人——恩台尔一票”，現在則是“請投恩台尔——法国共产党候选人一票”。

那些企图发展个人专断的官僚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人，自然要依靠党内最軟弱的新党员，因为他们們知道，这些新党员——由于缺乏高度的政治修养——会比较容易接受老党员所拒絕的东

① 1936年1月維勒班第八次代表大会速記通报。

② 法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速記通报。

西。

占党半数以上的新党员群众为建立一年前难以推行的方法提供了便利条件。赞扬“领袖”的风气出现了，私人感情的表现出现了，有靠山的小集团出现了，阿諛逢迎与互相吹捧也出现了。

党在组织党员的理論教育方面——絕大部分是有计划的——的弱点也为这些组织畸形现象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被激怒的老党员往往又陷入宗派主义，对新同志缺乏足够的耐心。

由于党遭到了削弱，随后发生的人民陣线的分裂已无法避免。

重新奋起的努力太晚了，已经不再能刺激受欺騙的劳动群众，劳动群众也不再像1936年那样支持共产党。

人们在設法使那些与共产党人最疏远的人放心并且把他們爭取过来的同时，涣散了那些最接近党的人们。

如果說贏得人們敬仰的英雄的馬德里只是依靠冒险建立的軍事手段“才昂然屹立”的話，那么，法西斯匪帮早已蚕食了西班牙，国际法西斯也早就为之拍手称快了。

法西斯同盟得到1936年受过惩治的剝削阶级資助之后重新抬头，創立了秘密组织“蒙面党”，企图破坏民主组织。

在阿尔举行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是法国共产党能够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举行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不得不等到八年之后，也就是解放和战争結束之后才能举行。

\* \* \*

勃魯姆继肖湯內閣之后，组织了一个短命內閣，接着就是达拉第政府。



巴塞罗那被占领了。西班牙在法西斯的铁蹄之下奄奄待毙。

德国希特勒一伙成了“罗马—柏林—东京轴心”的魁首，他们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软弱性、法国人民阵线的退让政策和法西斯同伙佛朗哥所取得的进展的鼓舞，提出了领土要求。

1938年3月11日，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在意大利法西斯并吞了埃塞俄比亚之后，日本侵入了国民党中国，这证明了法国共产党人同季米特洛夫所指出的“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的正确性。

由于佛朗哥的军队迫近我们的比利牛斯省边境，继勃鲁姆政府上台的达拉第政府就认为西班牙共和国已经灭亡了。

达拉第屈服于资本家及其同盟者的压力，于1938年8月21日宣布，决定取消每周劳动四十小时的工作制。

虽然自称是人民阵线巴黎地区办事处的各种组织的联盟宣称，不许破坏1936年颁布的社会法，但是，8月30日，达拉第的命令又在《政府公报》上发表出来：在为国防部生产的企业中“准予”加班加点。

人民阵线陷于垂死状态。慕尼黑协定早在激进党代表大会作出破坏统一行动公约的决定之前，就给人民阵线安排送丧了。

## 第十五章

# 慕尼黑协定和反法西斯斗争

### 一、慕尼黑协定

1938年3月希特勒安然吞并了奥地利以后，立即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提出要求，硬说这个地区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受到迫害。

鉴于这种日益加剧的威胁，共产国际通过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向各国共产党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直接对法西斯侵略进行斗争，特别要：

“……对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施加压力，迫使这些政府对法西斯侵略者采取坚定的政策。”<sup>①</sup>

达拉第不但没有采取坚决的态度，反而步英国投降政府的后尘，妄图孤立苏联。

达拉第把责任推在劳动人民身上，他为了使希特勒放心，表示将尽一切可能制服人民阵线。因此，1938年8月，他在国家广播电台宣称，他“将使法国总工会老实下来”。

达拉第政府不顾共产党和工会的强烈反对，继续向社会法进攻，追随张伯伦政府走投降道路。

达拉第禁止了原定于1938年9月13日在巴黎冬季赛车场举行的“反对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野心”的群众大会，他的借

---

<sup>①</sup> 《布尔什维主义手册》，1938年4月号。

口是，大会必然要恶化国际局势。

9月14日，尼维尔·张伯伦爵士去会见希特勒，随后就来同达拉第举行会谈。

张伯伦取得达拉第的同意以后，9月22日重访希特勒，准备举行有墨索里尼参加的四巨头会议。

1938年9月21日，社会党背弃它同法国共产党商定的要求议会开会反对任何形式投降政策的诺言，在四个政党（法国社会党、激进党、民主联盟和法国共产党）联合组成的人民阵线委员会上投票反对共产党的提案。

共产党这项提案只不过是要求谴责张伯伦一达拉第协议和履行法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承担的义务。

历史上的“神圣同盟”重新出现了，投降的道路铺平了。1938年9月29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慕尼黑举行会谈。根据共同协议，竟然将与捷克斯洛伐克订有互助条约的苏联排斥在会谈之外。甚至也没有邀请被决定命运的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会谈！

当天，《人道报》仿效罗曼·罗兰的作法，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书》，在书中法国、英国、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共产党一致谴责了希特勒旨在分裂各民主国家的慕尼黑会谈，因为各民主国家的团结可以避免战争。”<sup>①</sup>

“不应该再向法西斯主义投降，只要我们对法西斯主义采取坚定的态度，它就不敢发动战争；相反，如果让它先瓦解了和平力量，它就会制造新的屠杀。”

呼吁书没有受到重视，加布里埃·佩里当时就称之为“绝对命令”的慕尼黑协定终于签订了。

---

① 《人道报》，1938年9月29日。

人們促使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給納粹德国，并且警告捷克斯洛伐克：如果它拒不割让，法国不仅不支持它，还要它对因“抗拒”而必然引起的战争負責。

当达拉第的嘍囉高呼“和平救星”的口号欢迎他返回巴黎的时候，納粹军队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

达拉第政府提出信任案以后，1938年10月4日，众議院展开了一场辯論。

加布里埃·佩里在众議院宣布：

“直到今天我們还能够說：只要把三十师德国军队箝制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希特勒德国侵略我們的野心就不会得逞。法国应该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友好国家掌握一个飞机场，以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从那里威胁侵略者的各个重要軍事基地和战略中心。

“您通过三次会談撤除了这个屏障。您强迫捷克斯洛伐克把它的馬奇諾防线連同直到那时还絕對保持着的防线秘密原封不动地交給德国。要知道这条防线是根据法国的要求，在法国的监督下，按照我們的馬奇諾防线的蓝本，用二十亿的造价建造的。

“这个国家已经被宰割，被分裂，因此，您已经沒有理由讓我們相信您能保证这个国家的边界。

“您最近向人們表明了，同法国交往是冒失和危险的。如果您悄悄地用手提箱把这类貨色带回来，您还可以申辯或請求別人原諒，但是您沒有权利摆出胜利者的姿态。您不要把这类貨色也貼上和平的标签，因为和平同这种階級利己主义的得逞毫无共同之处。您在一个橫遭宰割的自由民族的残体上簽訂了失敗条約。只有反对您才能贏得和平斗争的胜利。”<sup>①</sup>

辯論結束後，有七十三名共產黨議員、一名社會黨議員和一名右派議員投票反對慕尼黑協定。所有其他議員，從社會黨議員到弗蘭亭都贊成這項協定。在這以前，弗蘭亭就向希特勒拍了一份賀電。

希特勒在柏林體育宮向墨索里尼和“其他兩位政治家——达拉第和张伯伦致謝，因為他們在緊要關頭對尋求公正的解決辦法作出了貢獻”。

勃魯姆公然在《回聲報》上向达拉第祝賀，同時表示自己感到的“寬慰”。<sup>①</sup>

1938年10月26日，达拉第在馬賽舉行的激進黨代表大會上發表了一篇冗長的、仇恨共產黨人的激烈演說，並且正式提出了激進黨同人民陣線決裂的文件。1939年3月，社會黨也發表了同樣的文件。

在同一次馬賽代表大會上，达拉第向勞動人民在1936年鬥爭中獲得的社會福利宣戰。他頒布了一些變更社會法的非常命令，向法國總工會挑釁。

法國總工會很快就通過發出1938年11月30日舉行總罷工的號召回答了他。

## 二、國際法西斯主義的發展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一周年時發表了一篇宣言，根據慕尼黑協定和新的國際局勢作出了結論。

宣言說投降的責任應歸於“英國資產階級，它拖着法國追隨

---

① 《政府公報》，1938年10月5日；《布加里埃·佩里——一個偉大的法國人——演講集》。

② 《人民報》，1938年10月1日。

它的政策，并且不愿意挫败欧洲的法西斯宪兵”。

宣言认为，如果苏联、法国和英国同捷克斯洛伐克联合起来，肯定能够击退法西斯主义。

“投降政策过去不能、将来也永远不能拯救和平。投降政策削弱了和平力量，助长了法西斯侵略者的气焰，从而帮助了法西斯侵略者发动破坏性更大的新战争；投降政策促使可怕的、世界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迫近。挽救和平的唯一途径是同法西斯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sup>①</sup>

共产主义的一切敌人从这项宣言中和从法国共产党同意这项宣言的事实中都匆忙地作出结论说，共产党人主张“预防性”战争。

在1938年11月14—17日于南特举行的法国总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者制造分裂的蛊惑只是由于无产阶级对已经取得的社会福利受到的威胁表示不满才未能得逞。在这次大会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8年11月21日举行了会议。

莫里斯·多列士在他的报告中强调指出，“保卫法国不受希特勒侵犯，才是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因为这就是帮助德国劳动者摆脱法西斯的桎梏。”<sup>②</sup>

达拉第对多列士的这番话感到不能容忍，因为他打算装成一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同时又企图使希特勒侵略苏联。

1938年11月30日的罢工遭到禁止。达拉第一博内—萨罗政府为了打击法国总工会和劳动者，宣布实行全国戒严。

要求铁路员工和国家机关职工复工。军队出动了。荷枪的“警察巡逻队”在工厂门口布置警戒，说是为了“保障劳动自由”。尽管政府大量使用武力和百般威胁，但是参加罢工的人数却使

① 《人道报》，1938年11月6日。

② 《人道报》，1938年11月22日。

达拉第感到惊讶，他毫不犹豫地解雇了三万名国防企业的工人——虽然他曾“要求”这些工人一小时都不要耽误生产。雷诺各厂解雇了三万二千名工人；在巴黎郊区，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因罢工而被解雇”；在马赛，有一百多家冶金工厂歇业，解雇了十万工人；在诺尔，纺织厂也解雇了许多工人，还有八万名冶金工人被剥夺了工作。意大利法西斯议会的议员们乘着达拉第对法国无产阶级采取这些措施的机会恫吓说：“把科西嘉、萨瓦、突尼斯还给我们！”墨索里尼的报纸援照“其一切要求还没有完全得到满足”（这显然指阿尔萨斯—洛林）的德国的作法，说什么意大利有权收回“被法国侵占”的领土。

国际法西斯主义这种肆无忌惮的敌视法国的行动，并没有能够阻止达拉第政府于1938年12月6日接待希特勒的特使馮·里宾特洛甫。激进党政府表现得更为过火。为了不让它的贵宾在预定的宴会上受拘束，它竟然要求两位犹太族的部长让·柴和乔治·曼代耳不要赴宴。

在同希特勒的特使进行“友好”会谈后所签订的法德协定规定，两国政府在解决有关双方的任何问题时，必须预先磋商。

馮·里宾特洛甫厚颜无耻地在《时报》上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他满意地看到达拉第对待共产党人的果断态度。

不久以后人们才明白，希特勒所以向法国表示好感，是以法国必须“不再让人民阵线出头露面”为前提的。

德国方面则保证自行抑制向“东欧”扩张的欲望。

好像不约而同似的，议会和新闻界都展开了大规模的取缔法国共产党的运动。在“全法国”通讯社的煽动下，有四百三十家报刊发表了《给议员的呼吁书》，要求解散法国共产党，“不让任何外国人的意志阻碍国家复兴的大业”。

第五纵队开始活动，它的矛头是通过法国共产党而指向苏

联，因为法苏英联盟可能遏制住希特勒发动战争的野心。

1939年3月6日，希特勒背弃了他的慕尼黑诺言，借口布拉格的新政府要求他保护，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达拉第再也不提他在1938年9月所作的一旦捷克斯洛伐克遭受德国侵犯必将尽力援助的诺言了。

这时候人们早已把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第二天所作的“保证一代和平”的诺言抛到九霄云外。当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对于我国边疆的侮辱性叫嚣正气焰万丈的时候，希特勒向立陶宛提出了对默默尔(克来彼达)的领土要求，意大利并吞了阿尔巴尼亚。

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法国应付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是联合它曾打算通过慕尼黑协定让希特勒去进攻的强大的苏联。

共产党一贯坚决主张根据平等互助的原则同苏联签订一项防御条约，以保证法国不受法西斯的侵略。当西班牙共和国灭亡的时候，试验过自己武器的法西斯军队更加嚣张。墨索里尼在一篇广播演说中甚至说，“意大利人的一口唾沫等于两个法国公民！”

民主国家在法西斯扩张主义面前的一再屈服，大大削弱了最近在东线遭受巨大失败的西班牙战士的斗志。

从2月初以来，就不断有破衣跣足但有时仍紧握武器的西班牙战士进入法国国境，法国当局竟把他们解除武装，然后关进围着刺铁丝网集中营里。

2月27日，当马德里还在进行抵抗的时候，法英政府承认了“布尔高斯政府”为西班牙的合法政府。

于是马德里的行政委员会陷入失败主义和不和之中。1939年3月6日，卡萨多上校在胡连·贝斯太罗的政治支持下叛变，并且在马德里“掌握了政权”。他们两人都不再愿意战斗到死，而希望进行谈判。有几个反对他们的共产党员，如巴尔塞洛上



校和政治委員科內薩，都被他們下令槍決。

从1936年11月以來一直堅持抵抗的英雄的馬德里，最后于1939年3月28日投降。

西班牙戰爭結束了，在法國邊境上又多了一個法西斯國家。

## 第十六章

# 德 苏 条 約

### 一、英法苏談判

1939年春，当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对于我国边疆的侮辱性叫嚣气焰万丈的时候，希特勒向立陶宛提出了对默默尔（克来彼达）的領土要求。接着，3月21日他又要求波兰“归还”但澤，并在波兰走廊开辟一条享有治外法权的专用公路，使德国在运输上有一条通往波罗的海的自由通道。“交换”条件是希特勒允許波兰享有二十五年的独立。

华沙政府拒絕了希特勒的要求，并請求伦敦政府和巴黎政府保护它免受这种威胁。

1939年4月7日，墨索里尼的军队侵入了阿尔巴尼亚。

张伯伦和达拉第看到不能再采取“慕尼黑的手段”了，这一次他們不得不考虑用有效的措施来对付由他們的綏靖政策助长起来的法西斯主义的要求。

他們认为，必須設法給人們造成一种他們在抵抗希特勒的侵略的錯觉，同时把他們认为不可避免的大冲击轉向苏联。

为了欺騙受共产党教育而觉悟起来的无产者，他們装出愿意联合苏联的样子。

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明确地肯定了苏联的毫无排他性的和平主张：

“我們維護和平，并巩固我国与世界各国間的业务联

系，只要它們也对苏联維持着这样的关系，而不試圖侵犯我国的利益，我們是始終保持这种立場的。

“我們援助遭受侵略而为本国独立奋斗的民族。”<sup>①</sup>

由此可見，苏联希望同任何国家在和平环境中进行貿易，但是它也准备結成任何能够阻止某些国家侵略其他国家的有效联盟。

显然，这只能是針對这个时期的德国和意大利說的。

1939年4月15日，伦敦政府在达拉第的同意下建議苏联政府同它們发表一項联合声明：在波兰和羅馬尼亚遭到侵略时将予以援助。

苏联政府在答复這項建議时提出簽訂一項包括法、英、苏和从黑海到波罗的海同苏联西部边境接壤的所有国家的互助条約。

苏联认为反对侵略者的支持應該是相互的，它希望在它承担对其他国家的保证的同时，自己的边界也能得到同样的保证。

英国政府答复說，它认为“联合声明的問題已经不用再談了”，并且向苏联政府建議发表一項包括如下內容的声明：

“在苏联的任何一个欧洲邻国遭受侵略而进行抵抗时，如果它希望得到苏联政府援助，它可以指望得到这种援助。”<sup>②</sup>

不是外交家也可以看出，这里要求的是苏联单方面的声明，声明在希特勒侵略波罗的海沿岸某个国家的时候，苏联必須单独对德作战，因为英国只向波兰和羅馬尼亚提供了保证。在这

---

① 《布尔什維主义手册》，1939年4月号。（參閱斯大林：《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733頁。——譯者）

② 《揭破历史捏造者》，苏联部长會議情报局公布的苏联照会。（參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的中譯本1948年版第34頁。——譯者）

里，从受苏联单独保护的国家方面来说也谈不到相互支持，何况“如果它希望得到苏联政府援助”这个条件等于预先声明波兰政府拒绝苏联的援助。

莫斯科在复文中建议签订一项互助协定，任何签字国遭受侵略时，都应得到三大国的援助，并有相互支持的义务。苏联并要求明确规定军事援助的方式。

伦敦在1939年5月8日答复时再次要求苏联发表声明：如果英法应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和比利时等伦敦和巴黎所“保护”的国家的请求而给予援助时，苏联保证协助英法。但是，英国的建议没有提到任何相互援助的措施，也没有提到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受到威胁时的保证。

三天后，仿佛是为了进一步着重说明法英的这一系列谈判不过是使希特勒感到不安和使他克制自己的手段似的，波兰驻莫斯科大使发表一项声明说：“波兰认为不可能同苏联签订互助条约”。当时华沙同伦敦和巴黎间正打得火热，如果事先没有征求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达拉第—博内的意见，很难设想波兰会突然发表这项声明。

当法英政府竭力玩弄同苏联进行虚伪谈判的把戏时，强大的法国“第五纵队”也猖狂地展开了它的反苏宣传。

资产阶级报纸为德国的立场辩护，猛烈抨击法苏联盟的可能性，那种抨击的猛烈很快就使人看出，资产阶级报纸是别有用心。

以后任希特勒驻被占领的法国大使的奥托·阿贝兹，在“法德委员会”支持下，成立了一个沙龙，广事接纳。这个“法德委员会”里，有这样一些“人物”：德·布里农，弗朗索瓦·皮埃特里，加斯东·贝尔日里，全国退伍军人协会主席让·哥亚，博纳尔院士，儒勒·罗曼等等。

人們一面展开宣传，为德国的“合理”扩张的需要进行辯护并詆毀共和制度，一面无限期地拖延同苏联的談判。

1939年5月19日和20日，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伊符里举行會議。

會議明确指出，法西斯主义不是不可战胜的，但是，它的主要力量是“它的所謂对手——资产階級民主政府的軟弱和同它沆瀣一气”。

有些人硬說，共产党人的立場只表明法国共产党希望援助受威胁的苏联。莫里斯·多列士在报告中駁斥了这种說法，他說：

“归根結蒂，有不少法国人认识到，不是苏联需要我們，而是我們需要苏联。”<sup>①</sup>

《人道报》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問題：

“我們往何处去？要么我們根据苏联所提出的条件，同苏联簽訂协定，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就可以拯救和平。如果我們拯救不了和平，那么毫无疑问，任何人都会清楚这场战争的性质。苏联及其同盟国的胜利，就是全体人民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一切反动派的胜利。

“要么，你們拒絕接受苏联的建議，那你們就使世界战争成为不可避免。但是，这场战争将是帝国主义战争；它的賭注是爭霸的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統治全世界。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你們不要指望我們，你們必須知道，共产党人将全力反对这种战争。”<sup>②</sup>

当法国駐莫斯科大使館同英国大使館都不断提出异議或保持沉默的时候，达拉第一博內政府同伦敦一道通知极反动的华

---

① 《人道报》，1939年5月20日。

② 《人道报》，1939年5月21日。

沙政府，只要波兰保证在它遭受德国侵略时不接受紅軍任何援助，波兰領土就能得到保障。

这种阴險的外交显然是企图把希特勒的进攻矛头轉向苏联，在巴黎和伦敦的当局看来，这可以期待苏德两败俱伤，或者如果納粹取得胜利，就牺牲已经消灭了人剝削人的制度的国家来满足吃人的希特勒的欲望。

1939年6月底，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指出：

“英法苏会谈已经进行了七十五天，其中苏联准备答复英国的各种建議用了十六天，其余五十九天都被法国人和英国人用来进行阻挠和拖延事态的进展。在同苏联談判过程中所出現的这种不能容忍的拖延和无休止的耽擱，不能不使人怀疑英法究竟有多大誠意，并且使我們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問題：这种政策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是真正希望保证和平陣线呢，还是希望利用这种談判来达到某种与建立和平国家陣线毫无共同之点的不可告人的目的？”<sup>①</sup>

当伦敦和巴黎的不良居心連缺乏经验的人都清楚地看出来时，张伯伦政府和达拉第政府决定采取一个新的談判方式。他們委派两个軍官代表团去莫斯科，打算研究有关一項軍事協定的問題。实际上，这两个代表团沒有任何决定权。它們把時間消磨在向本国政府轉达苏联的建議和等待本国政府作出它們无权直接作出的答复上。

从英国所提的反建議中举一个例子，可以使我們对这种談判的精神得到一个概念：

“在軍事談判进程中，又提出了締約任何一方一旦遭受侵略时对方应立即派往前线的兵力問題。当时英国代表提

---

<sup>①</sup> 《真理报》，1939年6月29日。

出了一个英方能够派五个步兵师和一个机械化师的可笑数字，而这个数字还是在苏方已经声明它准备向前线派出一百三十六个师、五千門中型和重型大炮，約一万輛輕重型坦克和五千架以上战斗机等的时候提出来的。”<sup>①</sup>

但是，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却继续同它声称要保障欧洲就必须加以反对的“敌人”——德国举行秘密談判。

当一些英国下院議員对“莫斯科談判进展緩慢”感到不安因而提出批評时，英国大資產階級報紙《泰晤士报》厚顏无耻地回答这种批評說：“迅速而果断地同俄国結成同盟会妨碍其他談判。”

甚至根据“不負責任的代表团”所制造的各种障碍来看，也很快就使人明白，英法是无意同苏联簽訂防御协定的，它們只不过是企图欺騙憎恨法西斯主义的人民，同时指望把納粹軍队的矛头轉向东方，进攻苏联罢了。

## 二、德苏条约

1939年夏，在要求取締法国共产党的运动中，由于达拉第一博內政府的纵容，又展开了大規模的亲納粹宣传。

有些报纸(如《格兰哥亚尔报》)居然提出：“宁願要希特勒也不要人民陣线！”

不久以后，人們就从《黃皮书》<sup>②</sup>上得知，在法国的“軍官代表团”前往苏联两天之后，乔治·博內就暴露了他的真实意图，他向当时德国駐巴黎大使韦尔茲克伯爵說：

① 《揭破历史捏造者》，苏联部长會議情报局发表的苏联照会。(參閱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的中譯本1954年版第39頁。——譯者)

② 1939年法国外交部发表的官方文件。

“法国共产党人将要得到教訓。”

其实，早在1939年7月18日，《人道报》总編輯呂西恩·桑佩就把《时代报》采訪部主任奧班先生和《費加罗报》广告部主任波亚里埃先生在最近被捕的事情揭露出来。前者从奧托·阿貝茲“特使”的机关里得到三百五十万，后者得到一百万。

不久桑佩就被法院传訊。尽管法院不能否认事实，仍以“泄露正在調查中的案件”罪起訴。

1939年7月28日审讯时，加布里埃·佩里在为变成原告的呂西恩·桑佩作了令人叹服的陈述以后，以辯护证人的身份发了言。

佩里证明，納粹专款的“主持分配者”，曾把柏林宣传机关交给他在法国使用的一笔总数三亿的款項，分給报界和“拥护”希特勒的人。

他列举了忠心耿耿地轉載奧托·阿貝茲的声明的各家报纸，从而揭露了这些通敌者。

他揭发提克西埃·維尼揚庫尔在上星期日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吹嘘說，他“已经得到对《人道报》起訴的諾言”。

作这种諾言的是誰呢？盖陀賽<sup>①</sup>的老板乔治·博內先生，用佩里的話說是“外国的法国事务部长”。

证人佩里在桑佩受审时激憤地高呼：“政府里有这样一位部长，怎么能肃清內奸！”<sup>②</sup>

法官們不得不承认，在法国显然存在着专门散发納粹間諜机关宣传品的“第五纵队”，于是宣告呂西恩·桑佩无罪。

希特勒在看清楚西方资产阶級民主国家的真实意图及其弱点之后，就向苏联建議簽訂貿易协定，并主动要求同苏联簽訂一

① 法国外交部所在地。——譯者

② 《卡布里埃·佩里演讲集》。



項“睦邻”协定。

大家知道，当法英“代表团”在莫斯科等待本国政府对苏联主动提出的真誠建議作出新的答复的时候，英国駐德大使尼維尔·亨德尔逊于1939年8月20日前往薩尔斯堡，寻求同納粹領導人的“互相諒解”。

第二天，《人道报》以《慕尼黑事件不許重演》为題发表文章說：

“必須以工人階級的国际团結阻止任何新的出卖阴謀。”<sup>①</sup>

于是德国选择这个时机重新向苏联建議立即簽訂一項互不侵犯条約，双方互相保证自己的和平愿望。

建議是在这样一些条件下提出的：如果拒絕接受建議，等于表示敌对。如果使德国等待答复，等于表示苏联有侵略意图，因为希特勒已经向苏联提出，苏联要保证尊重他的边界，他就保证尊重苏联的边界。

苏联在与声言要寻求協議而显然无意达成協議的西方列强进行了几个月毫无結果的会談之后，面临着如下的抉擇：

——为了自卫，为了贏得訓練和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以应付納粹的必然进攻所必需的时间，同意簽訂这个条約。

或者，

——拒絕德国的建議，并立即单独承担納粹战争机器的全部沉重压力，而使法英两国的慕尼黑分子将来置身于冲突之外。

伏罗希洛夫提出的最后一項紧急建議，也由于英法代表团的拖延而又归于无效。之后，苏联才于1939年8月22日接見了馮·里宾特洛甫。8月23日，簽訂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約。

締約双方保证决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对方采取任何

<sup>①</sup> 《人道报》，1939年8月21日。

武力行动。

如果締約一方遭到第三国或几个国家联合侵略时，締約另一方保证不以任何方式协助或支援侵略者。

对于苏联来说，这项不侵犯条约肯定是一个保障边界安全的手段，至少是暂时的保障，因为正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掩盖不住的意愿那样，希特勒的反布尔什维克论点是预定要进攻苏联边界的。

当这些国家长期拖延莫斯科“会谈”的时候，它们不是还向希特勒表示：如果希特勒对苏联实行武力进攻，苏联既没有盟国也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吗？

苏联避开了打击，为一场明知不可避免的战争赢得了必要的准备时间。

那些在1938年赞成法英两国让希特勒任意宰割我们盟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可耻的慕尼黑协定的人，在1939年都疯狂地反对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那些曾经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卖行为说成“和平业绩”的人，现在却谴责苏联同“纳粹分子建立了可耻的反民主国家同盟”。

但是，英国工党领袖克莱蒙特·艾德礼在德苏条约签字的第二天，即8月24日，十分清醒地说：

“英法外交家们对待苏联政府是那样的随便，以致于假若是对待我们工党，我们也会像斯大林那样签订1939年8月23日的条约。”

可惜，就在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苏联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同一天，法国总工会理事会不顾贝诺瓦·弗拉商为建议“向苏联致电表示拥护”所作的努力，竟以十八票对八票、两票弃权通过了谴责德苏条约的决议。

## 第十七章

### 禁止法国共产党

#### 一、党内的紊乱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在法国共产党的队伍中仿佛是一颗炸弹。

一方面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对苏联方面可能采取的外交“对策”没有精神准备，因此他们表现出一种可以理解的惊异。另一方面反共分子——从最阴险的反动分子到极左倾的社会党人——开动各种宣传机器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由于这种宣传的欺骗，人民阵线的同盟者都怀着轻蔑的心情离开了共产党；正直的知识分子也跟着谴责“斯大林罪恶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皮埃尔·科特在《事业报》上硬说，斯大林“变成了希特勒的同盟者”；甚至有些劳动者也对自己的共产党同志埋怨“苏联背叛”。

大部分共产党人除了表明对苏联的坚定信任并且坚信暂时不能理解的事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以外，还能怎样对付这些攻击呢？

1939年8月22日，全世界都知道馮·里宾特罗普带着德国的建议到了莫斯科。

8月23日条约就签订了。

可是，不论是党的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还是《人道报》的社长马塞尔·加香，都没有写出一篇共产党员和无产者所希望

的說明事情真相的社論。

《人道報》和《今晚報》只是分別發表了兩篇題為《蘇聯對和平事業的貢獻》和《蘇聯堅定政策取得成就》的文章。

嚴格說來，這完全無濟於事。

更糟糕的是，1939年8月23日，《人道報》重述了多列士1936年9月2日對雷諾汽車廠工人的講話的下列內容：

“應該和任何提供保衛和平可能性的人協商，不管這種可能性多么小。儘管意大利是法西斯獨裁，也應該同它協商。甚至也應該同希特勒德國進行協商”。<sup>①</sup>

黨總書記力圖用過去講的話證明自己對目前情況早有預見，但是這既否定了黨為保衛捷克斯洛伐克反對慕尼黑協定進行的宣傳，又否定了黨為爭取簽訂顯然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英法蘇條約所進行的宣傳。

1939年8月25日，《人道報》終於發表了一篇無個人署名的“法國共產黨”聲明。題為《蘇聯同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作法有利於加強普遍和平》。聲明說：

“希特勒在承認社會主義國家強大的同時，也就暴露了自己的軟弱。

“盡人皆知，這個條約的唯一作用就是鞏固和平。

“蘇聯最近對和平事業、對受威脅的各國人民的安全、特別是對法蘭西的安全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希特勒法西斯盟國間的嚴重混亂足以說明這一點，而且再過幾星期各國人民對這一點會看得更清楚。”<sup>②</sup>

久經考驗的黨員，也就是那些善於分析形勢、了解一個擺脫了剝削者的社會主義國家和一個奴役人民的法西斯國家之間不

① 《人道報》，1939年8月23日。

② 《人道報》，1939年8月25日。

可能有真正合作的黨員，是堅定不移的，他們勇敢地經受了暴風雨的考驗。如果不是要求他們等待着黎明，在黑夜保持信心，而是用理論和事實來武裝他們，那麼他們就會更好地經受住暴風雨的考驗。

政府不等到黨的領導“進一步解釋”和指出蘇聯政策的正確性，於8月25日晚查封了《人道報》。

中央委員會於8月25日舉行會議，派加布里埃·佩里和弗洛里蒙·邦特去向當天下午舉行會議的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闡明共產黨的观点。

加布里埃·佩里就這次辯論所作的匯報如下：

“德蘇條約簽訂兩天以後，我出席了外交委員會的會議。這是有我出席的最后一次會議，因為隨後政府就下令把共產黨人從議會各委員會中驅逐出去了。

“下面就是我在這次會議上闡述的理由：

“當時我指出，據我看來，法國政府和英國政府要對三國談判的流產負極其重大的責任，必須刻不容緩地公布有關談判的《白皮書》。此外，我認為對德蘇條約採取感情用事和急躁不安的態度是無濟於事的。最好是把這個條約作為謀求和平的起點（像以前對待慕尼黑協定那樣），而且使它有利於國際大家庭。”<sup>①</sup>

慕尼黑協定的最可惡的支持者輕蔑地拒絕了在蘇德新關係的基礎上舉行“圓桌會議”的建議。

外交委員會的全体委員，從社會黨人到弗蘭亭都污蔑“蘇聯的態度”，並且決定立即把該委員會中的共產黨議員驅逐出去。

這種憤怒的姿態完全是佯裝的。實際上，反動派對工人階

---

① 《加布里埃·佩里對待生和死的態度》。

級給他們帶來的“1936年的大恐怖”都還記憶猶新，現在要進行報復，想趁這個機會煽動全國大多數人來反對被剝奪了報刊的共產黨。

## 二、宣戰和解散共產黨

在《人道報》被查封兩天之後，政府在瘋狂的資產階級報刊的要求下查封了《今晚報》，並且決定查封共產黨和拒絕譴責共產黨的群眾組織的一切刊物。

根據1939年8月27日的法令，一百五十九種中央或地方日報、周刊和月刊等都被查封了。

資產階級報刊不再害怕共產黨的反击了，因此就更加加強了它們的反蘇宣傳。

在此期間，希特勒打算利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不可能同蘇聯達成協議而從中漁利，他加緊了對波蘭的侵略。

這次，他向波蘭提出了最後通牒。要求波蘭政府派全權代表來正式把但澤、通過波蘭的走廊以及西里西亞的一部分交給他。

波蘭在派遣代表之前（代表到柏林“最晚不得遲於8月30日”），曾向英法要求它們所擔保的軍事保護。

1939年8月30日，希特勒甚至無視這種情況而把自己的條件提給了華沙代表，並且根本不理会巴黎和倫敦的聯合警告。

达拉第一博內政府和張伯倫—哈利法克斯政府感到戰爭來臨，就在絕望中打算重演慕尼黑的故技，一面敦促波蘭“讓步”，一面請求德國等待它們斡旋的結果。

其實，希特勒已不再滿足於陸續得到的一些零星土地了，此

后他所要求的是他的战争和军事胜利。

当有关但澤及其“走廊”的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希姆莱部长亲自命令把集中营里的十二名犯人用药麻醉后，给他们穿上德国军装，把这些失去知觉的人送到波兰边界上，并于1939年8月31日夜晩，派一小队党卫军把他们打死。

借口“波兰在大帝国领土上”攻击了“德国士兵”，于是纳粹军队就在1939年9月1日早晨五点钟侵入了波兰。

战争就这样开始了。于是法国颁布了总动员令。法国政府不敢明目张胆地投降，只好跟随着英国政府向希特勒发出了一份照会，让他从波兰撤出自己的军队。但是，达拉第—博内政府不是通緝第五纵队和追究在一篇大放厥词的社论中拒绝“誓死保卫但澤”的馬赛尔·代亚，而是同它的内政部长薩罗一起搜查法国共产党的各个机关。

1939年9月1日，共产党议会党团发表了一项决议，决议原文如下：

“共产党议会党团于9月1日，在莫里斯·多列士主持下在众议院举行了会议。

“议会党团一致表示全体共产党人的坚定不移的决心：为了保卫自由、民族独立、民主和文明的原则，决心站在抵抗希特勒法西斯侵略的最前列。

“议会党团向所有应征入伍的劳动者，向许许多多应征入伍去保卫祖国、保卫祖国的光荣和自由的共产党员劳动者致以兄弟般的敬礼。面对着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野蛮侵略，作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侵略的英明和坚决的战士的共产党人，将是我国民主和独立的最优秀的捍卫者。”

这种立场在第二天即1939年9月3日就得到了证明：包括

共产党議員在內的議會，一致通过了政府要求批准的九百六十亿法郎的軍事預算。

9月3日十一时，由于希特勒不理睬英国让他从波兰撤軍的最后通牒，伦敦便宣布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

十七时，法国也向德国宣战。

为了回击“共产党因为忠实于斯大林”而被說成是希特勒的同盟者的宣传，党的領導继续宣布贊成“同法西斯德国作战”，并且离开了列宁主义的一些原則。

1939年9月6日，馬賽尔·加香給他的各位參議員“同事”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

“法国共产党在希特勒的势力面前仍保持它一貫的态度。它宣布，全体劳动者必須承担的首要义务是贊同政府为了打敗希特勒和救国所采取的各项軍事措施。

“我們重申，为了粉碎危害和平的元凶，法国共产党人現在和将来都要站在最前列。以莫里斯·多列士为首的一些可动員的共产党議員已经应征入伍了。

“所有的人都要服从打倒希特勒和拯救全国自由的双重义务。”

如果法国政府真心想同納粹侵略者作战，那么上述立場就是正确的。但是，政府根本不想对希特勒作战。在德国装甲部队冲入“盟国波兰”的时候，法国的軍隊躲在馬奇諾防线里或是准备进行长期陣地战，絲毫不考虑机械化战争的現代技术。

政府为了欺騙輿論曾經答应要給侵略者以軍事教訓，現在正是給予侵略者軍事教訓的最好时机，因为法国在东部国境线上集結了一百二十个师，另外还有十个英国师，而希特勒的主力都投入了波兰战争，只贖下二十三个师保护它的西部边界。

实质上，法国和英国的統治者听任波兰灭亡，不聞不問。



波兰参謀部和政府很快就抛弃了潰敗的軍隊，丟下了慘遭扫射的平民逃跑了。

苏联对获得胜利的希特勒軍隊多少有点担心，怕它接近自己的边界，因此决定把紅軍开进被德国蹂躪的波兰，以便在本国領土和危險地向东扩张的“大德意志”之間建立一条“保护地带”。

1939年9月17日，在波兰軍政当局放弃波兰流亡国外之后，苏联軍隊解放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居民，駐扎在从前的“寇松线”上。

为了答复那些随即大喊大叫“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了波兰”的人，可举出使他們最容易了解的下列事实：紅軍所解放的領土是1921年被人从年轻的苏联搶走的，因为当时苏联无法拒絕資本主义各国所提出的条件。人們是通过里加条約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从俄国搶走交給封建的波兰領主的。

9月18日，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祝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获得解放，并且强烈抗議法国政府沒有向議會諮詢就向德国宣战。

当苏联呼吁通过談判实现和平的时候，中央委员会要求众議院举行會議寻求消除冲突的办法。

馬上遭到很多人的譴責！人們指責共产党人贊成“两个同謀者”瓜分波兰。

說共产党人打算向納粹分子屈膝投降，指責共产党人通敌，渙散士气和全国人民的斗志。

但是，几天以后，邱吉尔本人在伦敦广播电台所发表的对苏联不太友好的一篇演說里，也不得不声明說：

“很明显，俄国人必須守住这条线，从而保障本国不受納粹的威胁。无论如何，这条线是客观存在着的，建立东部

防线今后已是既成事实。馮·里宾特罗甫上星期被邀請到莫斯科，就是叫他了解这件事，并且让他认识到，納粹分子必須立刻完全放弃他們对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乌克兰的企图。”<sup>①</sup>

但是，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市政府被解散；人們开始逮捕共产党员，指責他們叛国，而在斯图加特电台上列举法国“軍事机密”而被第五纵队送到柏林的卖国賊費尔多內却逍遙法外。

特别是他泄露了法国参謀部的絕密司令部設在費尔太—苏—若阿尔。

法国政府征得从馬德里召回的貝当元帅的同意以后，宣布剝夺共产党的发言权，因为共产党的报刊虽被查封，共产党员的住地虽然经常被搜查，但他們始終在传播真理。

1939年9月26日頒布的一項法令規定“解散法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所属的任何协会、組織和团体，以及所有按照第三国际的口号活动的、不論是否属于共产党的組織。禁止出版、传播和散发旨在宣传第三国际口号的定期或不定期刊物、图画和其他任何宣传品”。

規定的制裁是一年至五年的监禁和一百至五千法郎罰金。

紧接着，共产党各級組織所占有的房屋、場所和用具都被沒收了。

在反共狂热当中，完全听令于最恶毒的反动派的統治者进行盲目的打击，他們不仅宣布解散夏令营和手工业者协会，甚至連退伍軍人維護共和协会和世俗联誼会也被解散。

法国总工会的改良主义领导人，在群众的压力下过去不得不同意重新統一工会，这时他們就趁混乱的局面，把共产党党员

---

<sup>①</sup> 1939年10月1日发表的演說——參見《揭穿历史的捏造者》，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8年版，第46頁。

从工会中排挤出去，同时却听任政府践踏过去在斗争中取得的社会法。

共产党议会党团发表了一份愤怒的抗议书：

“我们以载于我国国旗上的自由和人类尊严的理想的名义强烈抗议违背共和精神和违背法国民主的惯例并且违背1789年大革命（今年7月14日我们刚纪念了大革命一百五十周年）的人权宣言的决定。

“这是第一次对一个得到工人阶级和大多数法国人民尊重和信任的党采取如此专横的措施，这同对待与2月6日事件有关的人、对待法德委员会的委员们和对待阿贝兹的代理人所表现的宽容形成鲜明的对比。

“解散法国共产党只能有利于一切民主的敌人，便于他们把受法西斯主义奴役的各国人民永远置于奴隶的地位，并阻碍社会进步。

“作为法国议员，我们一定要表示我们的愤慨，我们确信我国人民也一定同样感到愤慨。”<sup>①</sup>

在著名的市镇干部和市镇议员遭受迫害以后，在被控为“恢复已解散的协会”的党员积极分子遭受迫害以后，工厂的工人代表和劳资调解委员会的工会代表以及被法国总工会的顽固分子毫无顾忌地告密了的工会积极分子都遭到迫害。政府设置了一些集中营，里面装满了“嫌疑犯”，这些人就像在封建“密令”时代那样都是一经告密就被关起来的。

### 三、转入地下斗争

为了避开障碍，共产党的领导责成阿尔图尔·腊梅特和弗

<sup>①</sup> 邦特在《在国家范围内》引用了这份抗议书。

洛里蒙·邦特成立一个必须设法摆脱禁令的新的议会党团。

这个新的“工农议会党团”在1939年10月1日给众议院议长爱德华·赫里欧写了一封信：

“议长先生：

“法国将面临各种和平建议，因此对一场长期战争的前景感到忧虑的我国人民只要想到不久还有可能实现和平，就有了无限希望，因为长期战争会把人类的文化宝藏埋葬在战争废墟里，并且要使几百万男人、妇女和儿童在浩劫中失去生命。

“人们刚一谈到这些有关苏联外交倡议的和平建议，一家受幕后操纵的报纸就人云亦云地回答：不接受！”

“难道对这些和平建议未经公布也未提交国家最高权力代表机关讨论就可以拒绝吗？”

“我们认为不能这样，我们请求你，议长先生对政府加以干预，要求：

“一、必须召集议会开会，公开讨论和平问题；

“二、必须让军队中的议员能够参加有关这个与几百万法国人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的讨论。

“每个法国人都希望和平，因为他们意识到，对我国来说，一场长期的战争是异常可怕的。它会同时断送我们的前途和民主自由。决不能容许‘主观臆断地’拒绝和平建议，从而把我们引向冒险和更大的灾难中去。

“我们要竭力争取正义的和持久的和平。我们认为能够很快地得到这种和平，因为，在内部矛盾重重的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和希特勒德国面前有着强大的苏联，有了苏联就能够实现足以保障和平和法国独立的集体安全政策。

“因此，我们十分清楚，要求本着尽快建立我国全体人

民渴望的正义的、真挚的和持久的和平的愿望来审查即将向法国提出的各项和平建议是为我国的利益服务。”<sup>①</sup>

这封只有阿尔图尔·腊梅特和弗洛里蒙·邦特签字但与“工农议会党团”中每个共产党议员有关的信发出之后，引起了议会党团的第一次分裂。

有些议员先后表示反对信的内容，他们写信给赫里欧议长或发表公开声明，表示不赞成这封信。现在我们无需去划分软弱分子和被收买的官儿迷，仅仅把这些议员的名单开列如下：富里埃、皮洛、布鲁、贝夏尔、瓦拉、菲利波、尼科、瓦柴依、路布腊杜、索索、外号叫帕尔萨的浦埃习、卡普龙、皮吉尼埃、让·勒诺、德克莱克、罗克斯、多耳、贝南松和党内负责组织问题的书记马赛耳·吉顿。

参军的议员当中，也有一些议员坚决声明不赞成《给赫里欧的信》。他们是：

郎居米埃、奥奈尔、絮耳皮斯·德韦、富夏尔和达里于斯·勒科勒。

其中，有些想在危险的时候站得远些的人成立了“法国人民联盟议会党团”。他们是：布鲁、富里埃、尼科、皮洛、卡普龙、索索、瓦拉、罗克斯、德克莱克、德韦、富夏尔、多耳和路布腊杜。

《人民报》不发表这封著名信件的原文，而且写道：

“法国工农议会党团最近给应该垮台了的议长写了一封由腊梅特署名的信，这封信是一件肮脏的纪念品。其中颂扬了斯大林所做的一切，对斯大林准备做的一切都预先无条件地接受。这是无比的奴才相。”<sup>②</sup>

报纸上曾报道编到第三工兵营的党的总书记在安纳省的肖

① 让·丰太訥：《四十四人审讯案》。

② 《人民报》，1939年10月3日。

尼。莫里斯·多列士向駐在瑞士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請示并取得同意后，于1939年10月4日离开军队到了瑞士，准备从那里去苏联。

10月5—6日，政府用逮捕共产党議員的行动回答了他們的信件。

只有应征入伍的議員才暂时幸免。加布里埃·佩里、夏尔·狄戎、阿尔图尔·腊梅特、弗洛里蒙·邦特、让·卡特拉斯、加斯頓·蒙穆索、阿尔培·里加尔、埃米耳·杜提勒耳和雅克·杜克洛等人都逃脫了警察之手，轉入了地下；貝諾瓦·弗拉商也潛入地下同他們取得了联系。

在此期間，苏联继续执行保卫边境的政策。它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簽訂了互助条約；根据这些条約，这些国家把一些軍事基地(军队駐地、机场和港口)交給紅軍，苏联則保证在它們遭到进攻时給予援助。

只有靠近芬兰的一小块苏联領土仍然受到威胁。列宁格勒距离芬兰仅三十二公里。芬兰的統治者明目张胆地反苏，拒絕簽訂类似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所同意簽訂的条約。1939年夏季，芬兰军队的高級軍官热情接待了納粹军队的参謀长。苏联多次提出建議，甚至建議将苏联的卡累利換取面积小两倍的卡累利海峽的一部分。苏联的建議一再遭到拒絕。芬兰政府以边境挑衅和威胁性的声明来回答苏联的友好建議。

苏联向芬兰建議締結互助条約，苏联以保障芬兰的領土完整来換取芬兰在苏联遭到侵略战争的时候保持中立。芬兰在最后拒絕了这个条約之后，对苏联的挑衅活动更加頻繁了。1939年11月30日，苏联终于派遣紅軍进入了今后保卫自己領土所必需的陣地，以此来回答芬兰对苏联边境与日俱增的袭击。

尽管英法是德国的交战国，法英統治者却根本没有进攻他

們的德国“敌人”的表示，反而立刻想成立一支联合远征兵团到芬兰的領土上进攻苏联軍隊。

法国和英国往芬兰运送的物資、武器和軍火同納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所运送的作战物資合在一起，这实际上是把這些所謂的敌人变成了真正的反苏盟友。

1939年10月5日，法国共产党議員的議員豁免权被取消了。

尽管如此，曾逃脫警察之手的弗洛里蒙·邦特却出乎其他議員意料地出席了众議院的會議。陪同他去的还有因病得到假释的加斯东·科尔納万。邦特由于想維護共产党的观点和苏联的和平建議遭到“同事們”和議院警卫的毆打和辱罵并被拖下台来。他同科尔納万被捕，科尔納万虽然正在患病，也被投进监狱。

1940年1月9日，应征入伍的共产党議員組成的議會党团得到正常的允許来参加議會辯論。参加会的有：夏尔·米歇尔、雷蒙·居約、費尔南·格列尼埃、安德烈·梅尔西埃。还有已经叛党的絮耳皮斯·德韦。

会前，“多数”制造了一場难以形容的騷乱，說什么他們不愿意“在叛徒面前进行討論”；之后，會議以向軍隊致敬宣布开幕。这时全場起立，其中包括絮耳皮斯·德韦。可是米歇尔、居約、格列尼埃和梅尔西埃仍旧端坐不动。

赫里欧議長提議把他們驅逐出去。他們遂即遭到了拳打脚踢并被逐出會場。后来由于从事抗敌活动被納粹枪杀了的夏尔·米歇尔，被打昏后扔到波旁宮外。

1940年1月16日，在宣布罢免1月9日沒有书面表示叛党的共产党議員之后，“普选委员会”要求罢免令从1939年10月1日发出《給赫里欧議长的信》时生效。

社会党議員巴代勒米所拥护的报告也确定解除被解散的法国共产党黨員所担任的官职。巴代勒米肆无忌惮地要求“彻底

消除布尔什維主义的威胁”<sup>①</sup>。

法国共产党建党后的第一任总書記弗雷薩发表談話，他要求加强鎮压。

“光是打倒希特勒还不够，如果在希特勒死后斯大林还活着，欧洲仍不会有巩固的和平。共产党是駐扎在我国土地上的一支外国軍隊。仅仅解散共产党、罢免共产党議員是不够的，还必须随时随地利用一切机会继续无情地打击它。”<sup>②</sup>

前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人，前《人道报》編輯和后来在貝当政府任部长的弗朗索瓦·夏塞涅，要求“像在莫斯科的地窖里一样，枪毙那些策划叛国的人”。

休假士兵厄蒂納·法戎接受地下党的委托，穿着騎兵中士的制服来到議會。他重申了共产党立場的正确性，并且譴責了馬賽耳·吉頓之流的卖国賊，而叛徒卡普龙粗暴地打断了他的发言。

只有另一个在場的应征入伍的共产党議員阿德里安·摩頓和法戎投票反对罢免共产党議員，結果以五百二十二票对两票通过了罢免共产党議員的議案。

#### 四、审訊共产党議員

1940年3月12日，芬兰軍隊向紅軍投降了。几个月以来，一些反苏宣传家一直吹嘘“无敌的曼納海姆元帅”的訓練有素的軍隊如何勇敢和坚强，如何把“高加索的烏合之众”打得节节败退，現在他們却很难解释这支不可战胜的軍隊的投降了。

<sup>①</sup> 《政府公报》，1940年1月17日。

<sup>②</sup> 同上。



此外，政府也无法长期隐瞒苏联提出的和约条件，这些条件不仅没有任何政治要求，并且也否定了“侵占芬兰领土”的说法，因为苏联只占领了它的战略防御所必需的几小块地方。

这正说明，倘若赫尔辛基的亲纳粹领导人早接受苏联所提出的极有利的和平建议，就可以避免这场战争。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当芬兰联合希特勒对苏联发动战争的时候，苏联的预见是多么英明，它处理得多么正确。由于苏联在芬兰占有这些基地，纳粹侵略者始终未能包围列宁格勒。

1940年3月19日，达拉第在众议院供认，他供给芬兰一百七十五架飞机、五百门大炮、五千挺机枪和一百万发炮弹。英国提供的更多。值得指出的是，夏尔·戴高乐上校曾经拟出一项派遣“机械化远征兵团”的计划。该兵团有五万人，并有准备经过挪威进攻苏联的十万英军。

与此同时，干涉主义者魏刚将军率领五十万军队丢下法国东部边境不管，却驻扎在中东，准备轰炸苏联高加索的石油中心。并且扬言“他们进入俄国易如反掌”。

国外的敌人已经明确了。

至于“国内的敌人”，政府所追究的并不是纳粹主义的代理人、蒙面党人和以其他名义（法兰西社会党或法国人民党）重新成立起来的叛乱集团的拥护者。

1940年3月19日，内政部长阿尔培·萨罗向参议院作了所谓“查办统计表”的镇压共产党的总结报告：

“根据我的倡议，制定了9月26日大批撤销共产党所领导的市政府的法令。以后有10月5日取消共产党议员豁免权的法令；11月18日恢复1914年公布的条例、取消官员们不受纪律处分的保障的法令；最后是11月18日的另一项法令，即针对国防和公共安全的危险分子的所谓‘关于嫌疑

犯’的著名法令。

“具体地说，被解散的共产党领导的市鎮議会有三百个，一个星期以前，我得知由省議會作出罢免处分的数目如下：省議員八十七个，区議員七十个，市鎮議員两千五百个，今天已经超过了这些数字。若是再加上六十名众議員和一名被罢免的参議員，总共被罢免的就有两千七百十八名議員。

“在巴黎市区、郊外各市鎮区和一些特許机构，总共作出了四百四十三項处分，其中包括免职、辞退、停职或撤銷所委派的专职。这种做法正在继续并将继续下去。

“共产党过去掌握着大量的日报或周刊。这种报刊已经消失了，什么也没有了。

“我們解散了工会，解散了他們在巴黎和外省的工会联合会。我們封閉了他們的职业介紹所。但是，大量工会解散后共产党还是会試图把它的黨員重新糾集在支部或过去分布在巴黎和外省的各个机构中或者在其他地下机构中。我們每天的逮捕，使他們未能如愿。到今天为止，我們已经进行了一万一千次搜查，其中外省七千次，巴黎四千次。

“我們免去了七百个官員的职务，其中有一百三十一个是属于国民教育部的。

“根据我的指示，搜捕了共产党的骨干分子，到3月7日为止，已捕获了三千四百名，其中有一千四百名是在塞納省捕获的。

“已有一千五百人判了刑，三千五百名专职人員被开除了。总共作出了八千項以上的个人处分，这样就把那些我們要加以处置的对象从他們进行危害活动的場所中抛出去了。”①

在政府发表这篇声明的第二天，即1940年3月20日，巴黎第三常設軍事法庭开始审訊共产党議員。

因为参加“工农議會党团”（政府认为这是非法恢复被解散的共产党議會党团）和因为《給赫里欧議长的信》受审而遭到监禁的議員共有三十名：

依字母次序排列如下：巴雷耳、巴托利尼、貝夏尔、伯努瓦、貝尔利奧茲、皮佑、邦特、科尔納万、科松璫、科斯特、克里斯托夫尔、克罗瓦札、德姆苏瓦、加奥、格雷薩、让·勒諾、拉雷普、勒維、洛茲雷、馬尔太耳、米多耳、莫盖、穆斯莫、帕蒂、菲利波、普拉薩依、普罗、瓦德克·罗歇、图夏尔和瓦柴依。

出庭的还有因在1914—1918年大战中受重伤而暂时恢复自由的让·杜克洛、費利克斯—布隆和达多以及两名应征入伍的議員法戎和外号叫帕尔薩的浦埃习。

此外，受缺席裁判的“在逃”共产党議員有：卡特拉斯、雅克·杜克洛、杜提叶耳、蒙穆索、加布里埃·佩里、腊梅特、里加尔、多列士和狄戎。于是，受审的共产党員达四十四人；其余的二十八名議員离弃了党，有的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員，有的是干脆“退党”了。

参議院的馬賽尔·加香是一貫忠于党的，而另一个共产党参議員克拉馬姆却投向敌人了。

在审訊开始以前，莫里斯·多列士就“因开小差”而被开除了法国国籍。开除法国国籍的还有在莫斯科第三国际書記处工作的安德烈·馬尔梯。

治安法庭从审訊一开始就宣布秘密审判，这就說明所持的理由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并且說明政府害怕真理。

---

① 《政府公报》，1940年3月20日。

在起訴書中起訴的真正原因，主要是指控被告“宣傳第三共產國際所提出的或有關的口號”；擬定和散发了1939年10月1日《給赫里歐議長的信》，信中“宣揚在蘇聯保護下的和平”。

被囚禁的議員受到和小偷等普通刑事犯同樣的待遇，受到警察的種種迫害。政府向大部分被囚禁的議員們提出，只要他們在一份反對共產黨和德蘇條約的聲明上簽字，就可以獲得自由或宣布無罪。有些早就不贊成給赫里歐的信的人屈服了。曾參加該信起草工作的皮洛就是這樣免于起訴的。他獲得了自由。但是，曾經聽皮洛說過有這麼一封信并表示贊同的貝諾瓦，却因為像其他二十六個人一樣不肯背棄這封信而坐上了被告席。

無耻地背棄這封信的，有“為法庭效勞、暴露共產黨所有機關的外號叫帕爾薩的浦埃習”；有公然譴責這封信的瓦柴依；此外還有些發表了一些“模稜兩可”的聲明或表示出一種曖昧態度的人，他們顯然希望免受法庭的懲罰。這種人有貝夏爾、達多、菲利波和胆小鬼讓·勒諾。

其餘的人都變成了原告，理直氣壯地要求恢復他們的職責，徒勞地要求傳訊达拉第和博內出庭。

在辯論結束的時候，皮佑代表被告（不包括帕爾薩、貝夏爾、瓦柴依、菲利波、讓·勒諾和直到審訊的時候還享有暫時自由的被告）宣讀了一項聲明：

“人們責難我們什麼呢？”

“責難我們按照議會章程成立了一個議會黨團；責難我們以議員的身份給議長寫信，要求召集議會討論和平問題。不論是寫信還是成立議會黨團，都是在1875年憲法第十三條為國家代表所規定的豁免權和絕對不可侵犯權的範圍以內的。

“写这样一封信是我们的绝对权利，更确切地说，是我们议员的义务。”

皮佑在指出乔治·博内1939年7月1日给德国驻巴黎大使的照会中答应“整治”共产党人（外交部《黄皮书》第一四九号——附件二十）之后，接着说：

“这份文件是7月1日发出的。那时根本不是共产党人同意不同意苏德条约的问题。你们不要把这当作借口了，不要耍小聪明和无聊的把戏了，不要把借口当成理由了，不要再指责我们在1939年8月底和9月份所采取的态度了。因为迫害我们的人自己已经招供，早在7月1日他们就决定对我们下毒手了。

“我们所以被逮捕和受审，就是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就是因为我们不顾威逼利诱和迫害始终忠于共产党。

“我们受审，是因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在竭力反对使我国受到严重危害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因为我们号召人民要求以和平结束战争；是因为我们向法国人民指出了使我国自由和幸福的道路。

“不论是审讯、判刑、关入集中营，都不能阻止共产党继续为这种崇高的人道主义事业奋斗。

“法国的资本家企图让人们相信战争的责任是单方面的，他们自己不负任何责任，法国人民是为正义、自由和各国人民的独立而战的。

“这是谎言。这是战争贩子们用来欺骗各国人民使之互相残杀的谎言……

“我们多年来一直向法国政府建议：要么你们就把全欧洲的善良人民团结起来，致力于拯救和平和我国的独立；要么你们就破坏这种努力，使战争爆发并且你们要对此负责。

“由于你们把维护资本家的特权放在关心和平和各国人民的独立之上，所以你们不愿意制止这场可能蔓延到全世界的战争，因此我们将是你们不共戴天的敌人。

“现在，每个人都会了解伦敦政府和巴黎政府所搞的阴谋。它们曾打算同德国谈判，怂恿德国去进攻苏联。由于它们奉行了这种政策，便鼓励了华沙政府敌视苏联。

“正如《黄皮书》库伦德尔先生给外交部的电文所证实的那样，拒绝苏联的建议就是注定要使莫斯科谈判失败。使唯一能挽救和平的三国条约不可能实现。

“即使战争爆发以后，资本家们的目的之一仍然是建立反苏十字军，攫取高加索的石油，尽管他们不敢承认，但是这已越来越无法掩盖了。

“达拉第政府被人民赶下台了。现在是保罗·雷诺政府。我们不能根据它所得的多数票就把它看作主权国家的代表，因为它是排出了共产党代表的议会产物。真正的法国政府应该恢复我们在议会中的权利。

“政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够代表整个国家。它就只能用独裁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我们认为，拯救法国必须成立直接来自全国人民的人民政府。

“资本家认为他们能够长期欺骗人民，因为他们有社会党及其领导人勃鲁姆、保罗·富尔、季罗姆斯基和法国总工会的叛徒领袖们的支持。所有这些都站在沙文主义和镇压工人的最前列。

“曾经阻碍实行人民阵线纲领而现在深深陷入帝国主义战争神圣同盟中的勃鲁姆、保罗·富尔、季罗姆斯基和石乌之流，竭力破坏无产阶级的组织。他们捡起了反共产国际的旗帜。

“这是第二国际及其法国支部的彻底破产和完全瓦解，这是1914年的破产的重演，而且远远超过了那次破产。

“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是的，只有我们才是国际主义者。一切种族和各种肤色的劳动人民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同英国的矿工和海员、埃森的冶金工人和汉堡的码头工人，同布拉格工人和波兰农民，同芬兰的伐木工，同阿拉伯农民和中国苦力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同终于获得解放的苏联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命运也是息息相关的。

“苏联粉碎了法国资本家们的阴谋。直到目前，他们唆使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企图仍没有下文。

“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以后，苏联成功地限制了世界死亡的范围，并且解放了受波兰土豪压迫的一千三百万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我们是不能把人民的波兰同土豪们的波兰混为一谈的。苏联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欧洲的东北，特别是芬兰，今天如果不是让伦敦和华盛顿的大亨们所收买的冒险集团搞得乌烟瘴气的话，就会继续过着和平宁静的生活。当他们的阴谋在芬兰失败后，他们又打算在巴尔干和近东国家重新搞一套。

“他们对我们进行无耻的诬告和审判，就是为了更便于他们进行这种冒险。希望各国政府注意：如果它们胆敢实现进攻苏联的梦想，那么，它们的制度本身就会埋葬在它们的行动中。”<sup>①</sup>

在皮佑代表被告高呼“自由法国万岁！和平万岁！向共产主义前进！”之后，军事法庭就进行了宣判。

巴雷耳、巴托利尼、伯努瓦、贝尔利奥兹、皮佑、科尔纳万、科

---

① 邦特受审时的辩护律师让·丰太纳的《四十四人审讯案》。

松璫、科斯特、克里斯托夫尔、克魯瓦札、德姆苏瓦、加奥、格雷薩、拉雷普、勒維、洛茲雷、馬尔太耳、米多耳、莫盖、穆斯莫、帕蒂、普拉薩伊、普罗、罗歇和图夏尔等被判处了五年监禁和四千法郎的罰金。

邦特因为是信件的起草人，被判处五年监禁和五千法郎的罰金。同时，逃走的卡德拉斯、雅克·杜克洛、杜提叶耳、蒙穆索、佩里、腊梅特、里加尔、多列士和狄戎也都受到同样的缺席裁判。

三个受过重伤的人，布隆、达多和让·杜克洛，以及菲利普、让·勒諾和不贊成这封“信”的三个人貝夏尔、瓦柴依和帕尔薩被判处四年监禁緩期执行和四千法郎的罰金。虽然依法緩期执行应使他們自由，但是他們一离开法庭就又以“巴黎軍区司令的命令”被逮捕軟禁起来。

被判刑的人被剝夺了公民权。

正在服兵役的法戎，传唤他时还是自由的，到了法庭之后就被捕了，同被称为“光荣道路上的二十七人”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 五、地下組織

从1940年3月20日到4月3日审判共产党議員后过了几天，社会党部长塞罗耳公布了一項法会，規定进行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要处以死刑。

1940年5月任內政部长的乔治·曼代耳，更加强了迫害措施。

共产党不顾这种迫害，开始坚强地在地下組織起来。

特务警察对被捕的共产党員及其家屬所采用的迫害和勒索手段日漸增多。有些不堅定的分子屈服了，他們刚一释放就落



入警察的手心，接受了肮脏的任务。头几个月，由于轻信一个一面之识的同志而被捕的事件较多，以后就逐渐减少了。地下党员学会了只把那些在党被禁止以后行为确实忠诚的共产党员当作“同志”。

通过传递揭露奸细和嫌疑分子的、值得警惕的“黑名单”，避免新的轻率行为。经过迫害的打击和受迫害的人的惨痛教训所制定的安全规则加强了，并得到所有人的重视。

最坚决的分子以英勇顽强的精神把那些动摇彷徨的人争取过来，他们先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和得到必要的保证，然后才同这些人接触。

《人道报》在被查封后的第二天就出版了地下版第一期。

从1939年9月27日到12月31日，《人道报》共发行了十六期。但是1940年间地下的《人道报》平均每五天就出版一期。

发行总数平均每期为十二万份，包括印刷的、油印的或打字机打的零张在内。

秘密保卫《人道报》委员会的组织网很快就发展起来。在巴黎，《人道报》的每个“送报员”每送一期报纸要骑自行车跑五十公里。同时，在城乡各地，还有党员把党的口号深入到群众家里去。

“潜逃”的共产党领导人重新聚集到一起了，建立了可靠的联系，并成立了地下领导机构，其中有：贝诺瓦·弗拉商、雅克·杜克洛、达利戴、狄戎、腊梅特、卡特拉斯、特雷昂、佩里、卡德拉斯、摩维和居约。地下的中央委员会布置宣传鼓动工作和指导地下组织。

雷蒙·居约和阿尔图尔·达利戴于1939年9月赴莫斯科回来之后，带来了共产国际书记处的具体指示，并通过瑞士同共产国际书记处取得了联系。

因此,《共产国际宣言》能在1940年5月初传到法国各地:

“全世界的工人和劳动者!

“劳动人民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恐怖气氛中庆祝无产阶级团结的节日‘五一’劳动节。

“战争已经在欧洲进行了八个月,可是结束的日子却遥遥无期。战场一天天在扩大。帝国主义国家都极力把它们统治下的殖民地人民拖进了这场战争。

“为了对英法粗暴地破坏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中立进行反击,德国把军队开进了丹麦,并且占领了挪威的战略要地。

“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使各国人民卷进了一场新的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大屠杀。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战争狂热所笼罩的资本主义面前巍然矗立。

“英国和法国战争贩子及其走狗社会民主党人对苏联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持中立表示狂怒。

“在后方,那些乘人民的灾难大发横财的战争贩子却无耻地大摆酒宴。对于他们来说,战争好比是从天上掉金子。他们把人类的鲜血和眼泪变成了股票、红利和惊人的利润。

“但是资产阶级利用勃鲁姆、石乌、艾德礼和西特林之流的奴才性向劳动人民疯狂进攻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生活水平。

“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建立起了反动的、愚民的、独裁的、恐怖的制度,奴役劳动人民的制度。

“资产阶级用军事法庭、判重刑和死刑来回答群众的和平愿望。它宣布那些站在争取各国人民自由和幸福的斗争最前列的共产党人不受法律保护。

“它把八十万共产党人、西班牙难民和政治避难者投进监狱或关进集中营。

“这就是今天资产阶级制度的图景，战争的图景。

“但是，劳动者们！如果你们不制止战争，如果资本家仍旧统治着你们，明天资产阶级会给你们带来怎样的命运呢？

“欧洲和亚洲，可能还有其他大陆，将变成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血腥屠杀的战场。战争将要带来的就是：无数人遭到屠杀或变成残废、无数的孤儿寡妇、新的捐税和附加税所造成的沉重负担、物质财富的破坏、各国人民要遭受比1914—1918年战争所造成的可怕得多的破产。”<sup>①</sup>

在这个所谓的“假战争”时期，当法国参谋部所发表的简明公报不断说：“全线无战事”的时候，地下的共产党一直在宣传同德国讲和。

为了符合苏联的立场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党的号召一直强调，在还没有发生重大战斗和战略性进攻的情况下，仍然处于均势地位的敌对双方，可以通过双方所能接受的方式结束战争状态。

但是，某些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莫洛托夫的声明，似乎超出“为了争取时间”而签订的条约的外交责任范围。法国共产党的地下领导持这种不稳定的观点是严重的错误。

现在的情况同1914—1918年的纯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因为这一次一方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另一方

---

<sup>①</sup> 党的地下出版物、地下出版的小册子不是国家图书馆里所能找得到的，因为国家图书馆所保存的资料是不完整的。为了避免任何错误和避免利用任何不可靠的文件，作者所引用的报纸和小册子都有不同的省委会的三个以上同志交来过同样文本，同时这些同志不是作为收件人而是作为“发件人”从那个时期起就保存着这种文本的。经过这样核对的材料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此外，所引用的文件都编在《1945年6月26—30日举行的法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

是在集中营里屠杀共产党和社会党无产者的法西斯体制国家。以前人们在党内散发了相当数量《我的奋斗》，以便让党员知道希特勒的目的就是消灭“世仇”法国，并且使法国处于奴隶地位，因为法国是“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巢穴”。

在这种情况下，宣称法国劳动人民的义务是击败本国的帝国主义，同时要求德国无产者也这样作，这是不了解长期以来在法国进行的反法西斯宣传的作用和在德法两国有计划地镇压无产阶级的实质。

最好是承认莫洛托夫的声明首先在于麻痹德国这个假盟友，以免它对红军所占有的战略位置感到不安而急于向东发动不可避免的侵略；在党的秘密发行的小册子和期刊中散布莫洛托夫的讲话是轻率的。

在地下发行的《布尔什维主义手册》1940年1月号里，全文转载了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发表的讲话。其中有以下几段：

“我们同德国的关系，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已经从根本上改善了。

“这里，事态朝着加强友好关系、发展实际合作和对德国的和平愿望给予政治上支持等方面转化了。

“（……）最近德国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的经济谈判和苏联经济代表团在德国进行的谈判，为发展苏德之间的贸易开辟了广泛的基础。”<sup>①</sup>

这一期《布尔什维主义手册》印刷了两万份，此外又加印了三万份莫洛托夫讲话的小册子。

这些文件散发之后，就被人大量用来指控共产党人是莫斯科支使的纳粹德国的代理人。

---

<sup>①</sup> 《布尔什维主义手册》，1940年1月号，莫洛托夫1939年10月31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讲话。

“利用”这种资料的例子之一，可以从阿尔培·巴耶在当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

“现在共产纳粹主义的小册子到处传播，在这些小册子里重复了戈培尔的口号，并且为了适用于法国工人，把这些口号装潢了一番。

“现在人们正在开始卑鄙地利用战争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来说服法国人民，让他们丢掉自己的一切希望，放弃自己的一切尊严，而向元首屈服。”<sup>①</sup>

在这场一切都应该从属于巩固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祖国”——的艰苦斗争中，为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原样翻印在莫斯科出版的文件是一个错误。应该根据法国的情况加以选择和解释。

同样，今天还有必要回过头来老实地分析当时的错误，不要避而不谈或是一味地否认这些错误的立场，因为由于这些错误立场，许多党员几乎丧失自由，甚至丧失生命。

---

<sup>①</sup> 《光辉》，1939年12月22日。

## 第十八章

### 入 侵

#### 一、1940年5—6月

在“假战争”进行了八个月之后，希特勒于1940年5月10日派遣他的装甲部队穿过比利时和卢森堡进攻法国，法国的“战略家们”过去认为没有必要延长“马奇诺防线”来防卫比利时和卢森堡这方面。

虽然法军数目多于德军，但是由于缺乏装甲车和飞机，法军很快就被击溃了。

以后我们才知道，后备坦克和飞机都放在一边未用，物资供应被丝毫不受法国政府追究的纳粹代理人第五纵队破坏了。

有些部队在沒有准备和极端混乱的条件下进行了英勇抵抗，然而这是无济于事的。

防线被突破以后，德国国防军势如破竹地攻进松姆省。由于德军的迂迴行动，从比利时被另一翼德军击退的军队就被包围了，以致造成敦刻尔克惨败，英国军队匆忙乘船逃走，德军截获了不少人员和物资。

甘末林“总司令”被撤职，换上了魏刚将军，这丝毫没有改变局势。这位反苏的急先锋在纳粹侵略者面前也只是会退却而已。

德国的装甲部队侵入了瓦兹省和安纳省之后直指巴黎，巴黎在1940年6月初就受到了直接威胁。

新任总司令魏刚曾经说过“要战斗而不要有退却思想”，但是他却听任巴黎电台宣传敌人如何强大来涣散士气。“准备誓死保卫首都”的巴黎卫戍司令向他请命，他却不给予明确答复。

雷諾政府的一些閣員不久就了解到沒有共产党人就談不到保卫国家，于是便設法改变局势。

运输部长德蒙济派人同应征在巴黎軍事学院工作的乔治·波利塞尔接洽，請他征求党的地下领导人“关于时局的意見”。

就是这些閣員，在不久前表面上停止了反苏，要求苏联供給法国自卫所需要的飞机。皮埃尔·科特被指定前往莫斯科就这个问题进行談判。一星期以前，保罗·雷諾向美国提出类似的要求，美国“不予”回答。但是，当苏联政府表示要在莫斯科接見皮埃尔·科特时，魏刚却反对他前往。

共产党的地下政治局确定了自己的答复之后，弗拉商責成乔治·波利塞尔于1940年6月4日把政治局的答复轉給德蒙济。这一天也是巴黎第一次遭到轰炸的日子(据“宣布”死二百五十四人，伤六百人)。

6月6日，这位部长终于收到了党的领导提出的下述意見：

“共产党认为把巴黎交給法西斯侵略者是卖国行为。

“共产党认为組織保卫巴黎是全国当务之急。为此必須：

“一、改变战争的性質，把它变成爭取独立和自由的民族战争；

“二、释放被监禁或被拘留的共产党議員和共产党员，以及几万名工人；

“三、立即逮捕在議會里、各部里甚至参謀部里活动的敌人代理人，并予以惩处，以儆效尤；

“四、这些初步措施能够激发群众的热情，能够引起全

民入伍，必須立刻下令实行全民入伍；

“五、必須把人民武装起来，使巴黎成为一个攻不破的堡垒。”<sup>①</sup>

德蒙济认为，第三点可能妨碍他們认真考虑这个文件。果然当天(6月6日)就证实了这一点：主张同苏联談判的德蒙济被赶出了政府。被副总理貝当元帅譴責为可以使“局势恶化”的人如达拉第、拉穆罗、薩罗、埃罗和巴雷蒂等人也都同德蒙济一起被清除出政府。主张保卫巴黎的埃灵將軍也被撤換了，代以邓茲將軍。魏刚將軍把“欢迎德国人”的任务交給了邓茲將軍。国务部长戴高乐当上了陸軍部长。《巴黎晚报》(法国共产党的传单里称它为《腐朽晚报》<sup>②</sup>)的主編普罗伏当了情报部长。

1940年6月9日，魏刚將軍“根据非常可靠的消息”宣告，巴黎即将遭到猛烈轰炸。根据这个急迫的劝告，政府和参謀部撤离了巴黎地区，分別迁往图尔和布里亚尔。6月10日，墨索里尼向半战敗的法国宣战。

当天，德国人占領了維农。第二天他們到了芒特和蓬土瓦茲。

6月12日，貝当在內閣強調說，法国沒有任何对不起英国的地方，因为英国軍隊已经乘船逃走了。貝当提出了投降的意見。

保罗·雷諾和曾宣揚“要战斗而不要有退却思想”的魏刚支持这种主张。1940年6月13日，魏刚用共产党来吓唬人，对那些同被围的巴黎断絕联系的部长們宣布，共产党人已经掌握了政权，莫里斯·多列士已经进駐爱丽舍宮。当內政部长曼代耳通过電話证实并揭穿这个謊言之后，魏刚傲慢地对他說，不允許任

① 阿拉貢在《共产党人》(1940年5—6月)中引用过。

② 法文“巴黎”(Paris)和“腐朽”(Pourri)音相近。——譯者



何人怀疑他的话<sup>①</sup>。

地下共产党政治局看到它所提出的保卫巴黎的计划——只要把劳动人民武装起来，巴黎的防御就可以彻底改观——没有得到政府考虑，于是便总结了遭受侵略的教训：

“负战争责任的法英帝国主义并不因为它同一个同样可恶的帝国主义搏斗而更值得劳动人民和士兵同情。

“当两个歹徒相互扭打的时候，正直的人不要因为乙无故打了甲一下就去帮助甲。

“相反，正直的人要利用时机使这两个歹徒都不能再害人。

“每个人都必须设法制服他最容易战胜的人。”<sup>②</sup>

只有人民能够赶走敌人，所以党以劳动人民最容易理解的明确语言提出了人民夺取政权的主张：

“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对反动派采取果断措施和恢复普遍和平而建立一个和平政府”。<sup>③</sup>

无疑地，正是由于共产党这种地下宣传运动比“促使本国帝国主义失败”的口号引起了更广泛的兴趣和更积极的反应，而使反动派发疯了，同时魏刚由于害怕这件事立即实现，便促使政府宁可投降也不走社会主义道路。

1940年6月14日，纳粹军队开进了巴黎，邓兹将军就把卫戍部队的降书送到了德国参谋部所在地克里荣宾馆。

魏刚在贝当的支持之下坚决主张向德国请求停战。

邱吉尔在一本著作中揭露了总司令的政治动机，他指出：

“他(魏刚)不等法国失败以后法国军队没有维持国内

---

① 佩尔提纳克斯：《掘墓人》。

② 地下《人道报》，1940年5月15日。

③ 地下《人道报》，1940年5月26日。

秩序的必要的紀律和力量就竭力迫使法国政府投降”。<sup>①</sup>

这是投降分子唯一考虑的事。他們害怕（穿軍装的或不穿軍装的）劳动人民摆脱这种腐朽的政体，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政府就在巴黎淪陷的当天流亡到波尔多。

当希特勒军队继续前进的时候，雷諾建議政府撤退到阿尔及利亚。

6月16日十八时，內閣以十三票对十票通过宣布立即要求停战。

雷諾提出辞职，共和国总统亚尔培·勒伯伦根据他的請求，任命貝当元帅继任。

这些把共产党人看成敌人代理人的伟大“爱国者”，对巴黎公社的忧虑胜过他們的爱国心。

1940年6月17日，貝当元帅在电台宣布了他向希特勒“光荣地”要求停战的意图。

从曾任法国第一任駐佛朗哥政府大使的貝当通过佛朗哥駐巴黎的大使向德国司令部进行接洽来看，貝当的卖国阴谋昭然若揭。

这期间，数以百計的往往是被自己的軍官遺弃了的法国士兵，牺牲自己的性命去阻挡希特勒的装甲部队。

法国的投降条约于1940年6月22日即德軍入侵后四十二天在雷敦德签了字。

可耻的停战把法国分割成两部分，其中最小的区叫作“自由区”或非占领区（至少未被穿軍装的德国人占领）。这个“自由区”一定使人錯誤地认为还有部分的自由，容許希特勒所要强加給法国的一个法西斯政权保持合法的外衣。

---

<sup>①</sup> 邱吉尔：《法国的崩潰》。

全国三分之二的国土被公开占领，一百五十万有战斗力的士兵被当作俘虏交给了德国。

希特勒看到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的阶级观点尚可利用，因此许可法国保持一定数目的武装力量“用来维持国内秩序”。

占领者除了得到他接管的两个地区的武器和军需品之外，还每天索取四亿法郎（以1940年法郎价值为准）的占领费。

戴高乐于1940年6月16日乘飞机到了英国，6月18日，他在英国号召在法国国外继续战斗。主张撤到北非去的部长们都留在国内了。

十五天以后，第三共和国议会同意了废除共和制度。

## 二、占领时期

当纳粹军队在巴黎耀武扬威的时候，当巴黎的二百九十万居民中有二百二十万人自愿或被迫离开巴黎的时候，贝当希望打起议会授权的招牌以掌握柏林给予他的政权。

赫里欧议长同意了这种把戏，于1940年7月10日在维希召开了有参众两院议员（当然不包括共产党议员）参加的国民议会。

议会以五百六十九票对八十票通过，授予贝当全权。值得指出的是，在只有八十名议员的反对扼杀共和国的议会中竟有一百七十五名社会党众议员或参议员。

贝当利用他的全权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罢免人民代表和废除1875年的共和国宪法。

新的“法兰西国家”不接受任何监督，它的支柱就是由政府自己指定的人物所组成的“国民议会”。

庞大的宣传机器竭力转移陷于严重困难和贫穷的法国人民

对战争的真正祸首和希特勒同谋者的愤怒。

政府把所有祸害都归之于一个责任者——共和国。因为共和国实行了议会制，实行了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和“双星期日”制，出现了滥用民主自由和可以要求满足切身利益的罢工。万恶的渊藪就是共和国。

关于准备和安排希特勒入侵的第五纵队，仅仅提到它把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了希特勒。

当占领者要求大批粮食并要求削减法国工业潜力——德国托拉斯的危险竞争者——的时候，贝当也弹起了“回到土地上”以恢复国民经济的调子。这个口号所掩盖的真正目的是：使法国非工业化，把法国变成贝当忠实与之“合作”的纳粹大德意志的一个道道地地的谷仓。

地下共产党在同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了地下斗争之后，马上就同维希政权及其合作者和他们的占领法国的纳粹主子展开了更加艰巨、更加危险的斗争。

党的地下领导机构起草的由莫里斯·多列士和雅克·杜克洛签署的《告法国人民书》，印发了三十万份。

关于这份告人民书的发出日期，说法不一。但是，有一点可以使我們相当正确地断定它的日期，这就是，在告人民书（我們认为有必要全文发表）中提到了贝当政府的两个部长勒梅里和皮埃特里。

贝当于1940年7月10日就职后，到1940年7月13日才发表了他的内阁名单，其中包括勒梅里和皮埃特里。因此，断定拟写《告法国人民书》是在这个日期以后，这是合乎逻辑的。

当时党的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已经离开瑞士到苏联去了，如果他的签名不是象征性的，就必须加上把这个文件送到他那里批准的必要时间。

因此，我們断定这份告人民书的日期在1940年7月下半月是非常适当的。

“法国人民！

“我国現在正遭受着一种罪恶政策所招致的严重后果。而这种政策是那些对战争、失败和敌人占领负责的无耻的执政者所奉行的。

“成千上万的青年和父兄倒下了；成千上万的难民被迫离乡背井，悲惨地流落在法国各地；很多城市和村庄遭到了破坏；病患者和受伤的人正在医院里呻吟；几十万思乡心切的俘虏不能回家；年老的父母和孤儿寡妇正在痛哭他们失去的亲人。

“遭到损害和苦难、被自己的执政者出卖了的法国，正在受着失败的报应。这是达拉第、雷诺、曼代耳之流的政客使我们陷入的处境，他们在由唯命是听的腐化堕落分子组成的议会的支持下，把法国推向战争，以便为财阀们的利益服务，以便取消社会自由，实行恐怖统治，压迫人民，进攻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给芬兰的自卫军运送作战物资，在叙利亚组织魏刚的军队）。

“这些事实证明这种政策的破产和危害之深已经到了如何程度。

“现在应该追究那些把法国推向灾难的人的责任了。

“奉行战争政策的、破了产的统治集团，得到所有为了进行卖国勾当及同样仇恨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而勾结在一起的政党的支持。这些政党是：达拉第、博内、肖汤、希舍里之流的激进党；勃鲁姆、塞罗尔、季罗姆斯基、保罗·富尔之流的社会党；弗兰亭、马林、斐尔南·劳朗、赖伐尔、夏普的各

右派政党；弗罗薩尔、德蒙济、代亚、馬尔盖的巴黎地区工会联合会；拉罗克和伊巴尔訥加雷的法兰西社会党；多里奧集团；窃踞法国总工会领导地位的石烏、伯兰、杜木兰等。他們都要对法国的灾难負責。

“被出卖的全国人民，現在已经由咒罵提高到向那些曾經希望战争和造成失敗的人报仇的阶段了。

“是这些人使法国人民遭到了这次被占領的耻辱，失去了自由。

“同时，法国人民看到，維希的投敌卖国政府，在准备来凡尔賽以前想模仿险恶的梯耶尔，依靠外国援助来維持违反人民意志的政权。

“但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人們进行清算，劳动群众要求法国归于法国人，这就表现出整个民族的独立愿望和永远摆脱那些把他們引向灾难的人的坚定决心。

### **只有共产党人反对战争！**

“只有我們伟大的共产党在暴风雨里巍然屹立，忠于自己的和平政策，起来反对战争；正如过去只有它反对普恩加賽占領魯尔一样。因为它一贯反对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

“我們共产党人曾維護德苏条約，因为这是一个和平因素。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正当我們受到迫害的时候，我們就不顾所有投机分子、奸商和政客（对于他們來說，战争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事业）的反对，把共产党議員呼吁和平的信交給了議長。

“正因为如此，这些議員遭到了监禁和判刑；正因为如此，几千名共产党人被投进了監獄和集中营。但是，我們的

黨員仍然冒着下獄和被處死刑的危險，繼續勇敢地為和平而鬥爭。

“今後，每個法國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當時他們採納了共產黨所提出的極其英明而有遠見的建議，我國就不致卷入戰爭漩渦，不致遭受戰爭的災難。但是，不希望和平的法國統治者，並不進行作戰準備，而蓄意策劃賣國。

“在5月份希特勒發動大規模進攻之前，法國的政客和將軍們却在國內進行了反對工人的戰爭，同時，他們還搞垮了生產，破壞了戰車和飛機的製造，把法國軍火庫的軍火供給芬蘭反動派。他們因襲了第二帝國的將軍們那種罪惡的麻痺傳統，既毫無預見，也毫無準備。

“所有這些軍政人物都出賣了法國，他們不配得到任何信任。

“只有一個政黨眼光銳利，只有一個政黨主張正確；只有一個政黨既未受騙，又不同流合污；只有一個政黨敢於鬥爭，這就是為人民服務的、人民的黨——法國共產黨。

### 法國要自由獨立地生存

“仍舊流着鮮血的法國要自由獨立地生存。

“法國人民要根據自己的傳統、自己的天才來親自解決由於有產階級的賣國行為所引起的各種社會政治問題。法國不能受維希的冒險家們的支配。

“像我們這樣一個偉大的民族決不甘心當奴隸，既然我國人民過去能夠不畏恐怖通過各種形式表示反對把法國綁到英帝國主義的戰車上，他們也會向當前執政集團表示他們要自由的意志。

“資本主義所豢養的文武政客在保衛自由的幌子下，過

去把法国人民引到了战争的道路。今天，他们又把他们的独裁强加于人民，因为他们不肯向人民作交代，他们一心要财政寡头们象过去发战争财那样，再发亡国财。

“现在不允许这样，将来也决不允许这样！”

“法国不会变成一种殖民地国家；具有光荣历史的法国不会向一小撮无所不为的奴才们屈膝。

“法国应该重新站起来，法国一定会重新站起来；为了我们竭诚向往的各国人民的友好，法国也必须重新站起来。

“法国必须作为一个大国重新站起来，重新恢复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任何法国劳动者都不能容许法国的工业资源遭到毁灭或是弃之不顾，法国的工业资源应该回到全国人民手中。工厂应该重新开工，应该为人们的日常需要而生产；因为战争而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应该回到自己土地上来。维希卖国贼似乎要把青年人招募起来，把他们象农奴一样送到田野去，可是国家所面临的各项经济问题并不是这样可以解决的。

“法国应该为了成为一块劳动和自由的土地而不是成为一块奴隶和灾难的土地，重新站立起来。

### 誰能让法国重新站起来呢？

“誰能让法国重新站起来呢？这就是当前的問題。

“能够让法国重新站起来的不是被打败的将军，不是奸商，也不是腐化堕落的政客；这些人只会背叛法国和出卖法国。

“民族复兴的因素不可能到腐朽的资本主义阶层中去寻求。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巨大希望存在于人民中间。

“法国的自由、独立和复兴的阵线只能够以积极热情、



慷慨大方、充滿信心和勇气的工人階級为核心来組成，因为未来是属于工人階級的；只能以由共产党——純洁的、光荣而英勇的政党——所領導的工人階級为核心来組成。

“为了拯救我們的国家，为了使我国摆脱把它引向灾难的人之手，我們号召农民、曾经受过激进党无耻欺騙的平民、被勃魯姆和保罗·富尔的党以及法国总工会的变节領袖們領着盲目追随資本巨头的社会党的劳动者們、受紅衣主教們宣传而信任无耻的統治者的天主教徒劳动者們、希望法国重新站立起来和摆脱資本主义（它为了摧毀1936年工人赢得的社会福利而制造了灾难）的桎梏的全体正直的法国人，团結起来。

“全国的团結是能够实现的。为了减轻压在我們国家身上的沉重負担，应该立即实现民族团結，而且也可以立即实现这种团結。

“希望城乡各地的全体善良的男人和妇女，老人和青年，都組成人民团結互助委员会，以便組織对难民、不幸的人、复員人員、失业者、病人和伤員的救济工作；以便組織在粮食供应沒有保证的許多偏僻市鎮的粮食供应；以便在全国各地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原則树立友爱互助的精神。

### 全法国都投入劳动

“但是，要医治創伤，就必须恢复建設；要为集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向老板們和为維希政府的老爷們所庇护的人提供新的利潤而恢复建設。

“必須使全法国恢复劳动。但是，首先要保证失业者每天的面包。

“为了使全国恢复劳动，就必须把全国的一切資源都調

动起来，要沒收一切战争利潤，对大财产征收重稅。

“必須使全法国都恢复劳动。为此，必須使资本主义掠夺者不能为害，必須把矿山、銀行、铁路、瀑布和其他大企业收归国有。

“必須使全法国都恢复劳动。但是，为此必須保证低价供应中小农户肥料，如果把化学工业收归国有，就能做到这一点；同时，还必须把属于銀行家、領主和其他剝削人民的人的大量土地交給耕种这些土地的人。

“必須使全法国恢复劳动。但是，为此，政府必須滿足农民的要求，而不应对他們的命运漠不关心：

“(一)补偿由于战事而遭到毀坏或損失的庄稼；(二)供应良好种子；(三)补偿为了重建被毀坏的房屋和修理損坏的或損失的农具所需的費用，这就会使大量工人有工作做；(四)供給受害农民牲畜，以便恢复家畜飼养；(五)补助受害的小农，以便使他們在下一季收获之前能够生活。

“必須使全法国恢复劳动，但是不要使恢复全国经济工作服从資本家的利益，相反，要打击有产阶级的特权。

## 人民的权利

“人民有权要求使自己的劳动有利于集体，而不是有利于几个資本家寄生虫。人民有权要求向那些造成国家不幸的战争販子和战争的投机者、过去和現在的部长、叛国的无能將軍算帳。

“人民有权要求审判使法国遭受战争和失敗的罪魁。

“人民有权要求释放保卫和平的战士，有权要求恢复反对战争的人民代表的权利和职务。

“人民有权要求撤销解散反对战争的政治集团、工会、

合作社、文化和其他组织的措施。

“人民有权要求自由成立工会的权利，有权要求恢复被战争贩子政府所罢免的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和劳资调解委员的职务。

“人民有权要求自由出版人民所信任的、对人民说实话并因而被查封的报纸。

“人民有权要求承认残废、寡妇、孤儿、被杀害了儿子的年老父母的神圣权利。战争的受害者不会容许充当宣布国家什么也不能够给他们，而让发战争财的人保持从全国掠夺的数十亿法郎。

“但是，人民必须通过自己的团结和行动来迫使他们承认这些权利。

### 真正的和平

“因战争贩子们的罪恶付出重大代价的法国人民渴望使法国有完全和真正独立的和平。没有各国人民的独立，就没有真正的和平。共产党人不仅要求让法国享有独立的权利，也要求让帝国主义者奴役下的殖民地各国人民享有独立的权利。

“此外，法国人民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国统治者正是受着仇视人民的思想支配才把我们拖入战争，并且准备进攻社会主义国家，这有甘末林和魏刚就轰炸巴库和巴统所交换的电报为证。

“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希望——是和平的堡垒，它最近同罗马尼亚和平解决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问题再一次表明了这一点。

“我們擁護1939年8月簽訂的德蘇條約，我們曾用斯大林的和平政策反對戰爭販子們的政策。今天，我們清楚地了解，要求締結法蘇友好條約，就是為和平事業和我們的獨立事業服務。

### 成立人民政府

“要復興法國，要使全法國恢復勞動，要保證法國的和平獨立，要保護人民的權利，要把我國從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必須打倒賣國賊和走狗的政府，他們的頭子貝當曾經厚顏無恥地對傷員、難民和那些損失淨盡的人說：‘國家什麼也不能夠給你們’。

“政治匪徒賴伐爾、斯塔維斯基派激進黨人肖湯、社會黨人黎維葉和費弗里埃、法蘭西社會黨人伊巴爾納加雷以及其他被收買的政客弗羅薩爾和馬爾蓋等，為了用匪徒們的獨裁統治壓迫法國人民，強制實行了維希憲法。

“有了這些老爺們的憲法，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沒有了；工會的自由沒有了；退伍軍人的津貼沒有了；社會保險沒有了；議員的選舉沒有了，而是由部長們來指定。更壞的是，只有賴伐爾、拉羅克、多里奧、肖湯、弗羅薩爾、黎維葉和費弗里埃及其同伙者的唯一政黨是合法的。

“由於激進黨和社會黨勾結在一起，貝當就可以大權獨攬，但在貝當背後，掌握實權的是後來可能代替他的賴伐爾。激進黨和社會黨的部長們剛剛幫忙扼殺了社會自由之后就下了台，讓位給反動分子勒梅里、皮埃特里和儒勒·蓋德從前稱為‘資產階級化報紙’的《時報》的主編米羅先生。

“這個可恥的政府不是吃敗仗的軍人就是1940年的巴

桑之流，不是臭名远揚的奸商就是腐化的政客，它玷污了法国的名誉。

“法国的劳动人民和民主人士，你們看，这就是达拉第、勃魯姆之流的政策的结果。他們打击了法国共产党，为在我国摧毁共和自由創造了条件，最近他們又扶持賴伐尔、馬尔盖和魏刚当上了法国的主宰。

“但是，法国人民是不会任人摆布的。

“要在城市、乡村、工厂和营房里建立起自由人民反对匪徒独裁的陣线。

“打倒維希政府！打倒金融寡头和战争投机分子政府！

“法国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政府。

“全国团结起来，将来是会建立起这样的政府的；这个政府将是民族复兴的政府，它将由正直和勇敢的人，由与战争罪恶和骯髒勾当沒有关系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組成；这个政府将是人民的政府，它是依靠人民力量而且只依靠人民的力量，并且专门为人民办事。

“全体法国人民，这就是共产党在这种痛苦的时刻所想到的。这就是共产党所要對你們說的話，同时号召你們在你們的人民团结互助委员会里、各工会里、各工厂里、城市里、村庄里团结起来；千万不要忘記，如果我們大家团结起来，就能够复兴法国，就能够保证法国的自由、繁荣和独立。

“资本主义制度这个贫困和战争、剝削和腐化的根源，已经在占地球六分之一的苏联消失了。我們要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斗争的旗帜下，在民族团结和独立的旗帜下，在各国人民友好的旗帜下，成为法国复兴的倡导者。

“打倒貧困和战争的根源——資本主义！”

“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希望——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万岁！”

“法国全国大团结万岁！”

“自由独立的法国万岁！”

“法国人民的希望——法国共产党万岁！”

“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万岁！”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 莫里斯·多列士 书记 雅克·杜克洛”

## 后 記

編者认为，《法国共产党史》的第一卷应以地下党在第三共和国的失敗和崩潰以后所发出的第一篇《告法国人民书》結束。

第二卷从这篇告人民书开始，直到最后編写本书时（1961年）为止。

鉴于所使用的文件的性质和所論及的事实的现实性，編者决定第二卷不公开发行，以免共产主义的敌人利用这些文件来反对我們的党。

共产党员和由于积极维护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而被排挤出法国共产党的前共产党员，从現在起可以保留一册。<sup>①</sup>

本卷后附有所引事实的簡明大事記。

讀者将会看到，文中所作的引证都詳細注明了出处，以便进行查对。当然，我們使用了大量党內的著作和出版物，而且使用以前都经过查对，但在整个綜合編写过程中，未作任何文字上的修飾。

作者的意图是要給自己的党写一本原来沒有的历史教程，并且要編写得最誠实、最确切，他們但願达到了这个目的。

---

① 把姓名地址寄給发行人即可。

## 大 事 記

- 1847年 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責成卡尔·馬克思起草《共产党宣言》。
- 1864年 9 月 28 日 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成立。
- 1871年 3 月 18 日—  
5 月 28 日 巴黎公社。
- 1889年 7 月 14 日 第二工人国际誕生。
- 1890年 第一次庆祝“五一”节。
- 1904年 4 月 18 日 饒勒斯創辦《人道报》。
- 1905年 4 月 25 日 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誕生。
- 1909年 10 月 6 日 《工人生活报》創刊。
- 1914年 7 月 31 日 饒勒斯被刺。
- 8 月 2 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 1915年 9 月 5—  
8 日 齐美尔瓦尔得會議。“重建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
- 1916年 4 月 24—  
30 日 昆塔爾會議。
- 1917年 11 月 7 日 苏維埃革命在俄国胜利。
- 1918年 11 月 11 日 世界大战結束。
- 1919年 1 月 24 日 邀請世界三十八个共产党和社会党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小組成立新国际。
- 3 月 4 日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



- 4月16日 黑海法国水兵起义开始。
- 5月8日 “重建国际关系委员会”改名为“争取加入第三国际委员会”。
- 1920年1月25—  
29日 社会党于斯特拉斯堡举行代表大会，决定脱离第二国际。
- 7月19日—  
8月7日 共产国际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
- 9月25日 «前卫»周刊创刊。
- 10月31日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多数决定加入第三国际。
- 12月25—  
30日 社会党在图尔举行代表大会，会议宣布加入共产国际。
- 1921年3月17日 “争取加入第三国际委员会”领导人受审结束，最后被宣布无罪。
- 6月22日—  
7月12日 共产国际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
- 12月26—  
31日 法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马赛举行。
- 1922年1月14日 法国统一总工会同改良主义的法国总工会决裂而诞生。
- 10月15—  
19日 法国共产党在巴黎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
- 11月5日—

- 12月5日 共产国际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
- 1923年1月6—9日 共产党在埃森举行会议，反对占领鲁尔。
- 3月11日 法国军队占领鲁尔。
- 5月24日 参议院拒绝按政府要求成立最高法院审讯马赛尔·加香和埃森会议的代表。
- 1924年1月20—24日 法国共产党在里昂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
- 1月21日 列宁逝世。
- 5月11日 举行议会选举。法国共产党获得八十七万七千张选票和二十六个议席。
- 6月17日—7月8日 共产国际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
- 8月12日 法国共产党指导委员会通过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主张。
- 10月28日 法国政府承认苏联。
- 11月15日 在企业支部的基础上改变法国共产党的组织。
- 11月21日 «布尔什维克主义手册»创刊。
- 11月24日 群众列队把饶勒斯的骨灰移入伟人祠。
- 1925年1月17—21日 法国共产党在克里希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
- 5月14日 里弗战争爆发。
- 7月5日 “反对摩洛哥和叙利亚战争中央行动委

- 員会”成立。
- 10月12日 反对摩洛哥战争罢工二十四小时。
- 12月1—2日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通过《给全体党员的公开信》。
- 1926年6月20—26日 法国共产党在里尔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
- 1927年11月9—10日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就整党政策的重要性通过了另一封告党员的《公开信》。
- 1928年4月28日—5月5日 法国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一百零六万三千三十四张选票，失去十一个议席。
- 7月17日—9月1日 共产国际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
- 1929年3月31日—4月7日 法国共产党在圣德尼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
- 6月13日 内阁总理塔底尤在众议院发动反对共产党的阴谋。
- 7月21日 有九十五名党员在圣乔治新镇被捕，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央委员。《人道报》被搜查和查封。
- 8月1日 反对战争和保卫苏联国际日。

- 1930年 7月17—  
18日 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党的危机（塞洛尔、多列士和巴尔贝在会上作报告）。
- 1931年 4月2—  
15日 共产国际扩大执行委员会批评法国共产党的缺点和错误。
- 7月 巴尔贝—塞洛尔—皮佑—洛兹雷派别集团的成员雷蒙·居约进行自我批评。引起人们对该集团的行动进行谴责。
- 1932年 3月11—  
19日 法国共产党在巴黎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
- 6月26日 巴比塞和罗曼·罗兰号召举行国际反战代表大会。
- 8月27日 世界反战代表大会在阿姆斯特丹举行。
- 1933年 1月30日 希特勒被任命为德意志帝国总理。
- 2月27日 戈林雇用的挑衅分子纵火焚毁柏林国会大厦。
- 3月3日 德国共产党总书记台尔曼被捕。
- 3月5日 共产国际号召国际反法西斯统一行动。
- 6月23日 举行普累耳国际代表大会，成立“世界反战和反法西斯委员会”，即“阿姆斯特丹—普累耳委员会”。
- 9月21日 莱比锡法庭开始审判被指控为纵火焚毁国会大厦的季米特洛夫。
- 12月23日 季米特洛夫获释。
- 1934年 2月6日 法西斯暴动未遂。

- 2月9日 在法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在巴黎举行了反法西斯示威，同警察进行了搏斗。
- 2月12日 反法西斯总罢工和万塞纳统一示威。
- 5月20—21日 在巴黎举行反法西斯全国代表大会。
- 6月23—26日 法国共产党在伊符里举行全国会议，提出“一切为了统一战线”的口号。
- 7月15日 法国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接受法国共产党提出的反法西斯主义统一行动的主张。
- 7月27日 法国共产党同法国社会党签署统一行动公约。
- 1935年3月22日 共产主义青年团同社会主义青年团签署统一行动公约。
- 5月14—16日 斯大林和赖伐尔举行会谈，在莫斯科签订法苏互助条约。
- 7月14日 人民阵线举行宣誓仪式。
- 7月25日—8月20日 共产国际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
- 9月27日 法国总工会同法国统一总工会达成工会统一协议。
- 1936年1月22—25日 法国共产党在维勒班举行第八次代表大会。
- 2月 法国总工会和法国统一总工会在图卢兹举行工会联合代表大会。

- 3月7日 德国重新占领莱茵河左岸。
- 4月26日—
- 5月3日 法国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一百五十万张票，得到七十二个议席。  
人民阵线获得多数。
- 5月26日 爆发了占厂罢工。
- 6月3日 在法国共产党的支持下，莱翁·勃鲁姆组成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
- 6月7日 资方代表同统一后的法国总工会代表签订马提翁协定。
- 6月26日 建立假期工资照付和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制度。
- 7月14日 人民阵线举行大示威。
- 7月19日 叛变的佛朗哥将军率军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西班牙内战爆发。
- 10月26日 柏林和东京签订反苏条约。
- 11月19日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承认布尔戈斯的佛朗哥政府。
- 1937年1月3日 法国共产党的农民机关刊物《土地》月刊创刊。
- 12月25—
- 29日 法国共产党在阿尔举行第九次代表大会。
- 1938年3月11日 希特勒侵入并吞奥地利。
- 4月10日 达拉第继莱翁·勃鲁姆组阁。
- 8月21日 达拉第攻击共产党，并宣布取消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

- 8月24日 人民陣线巴黎地区办事处声明坚决维护1936年6月的社会法。
- 8月30日 达拉第頒布法令，規定在各国防企业中强迫加班加点。
- 9月29日 达拉第和张伯伦在慕尼黑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簽訂协定，允許德国占領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
- 10月30日 在南特举行的法国总工会代表大会决定在11月30日举行总罢工。
- 11月2日 激进党同人民陣线断絕关系。
- 11月30日 不顾政府的禁止和镇压举行总罢工。
- 12月6日 外交部长乔治·博內在巴黎接見希特勒的部长馮·里宾特洛甫。
- 1939年3月6日 希特勒违背在慕尼黑所作的諾言，侵入捷克斯洛伐克，把它变成德国的“保护国”。
- 3月19日 达拉第政府获得全权。
- 3月28日 叛变分子把馬德里出賣給佛朗哥，馬德里陷落。西班牙內战結束。
- 5月13—14日 世界反战和反法西斯委员会在巴黎举行国际會議。
- 8月23日 德苏互不侵犯条約签字。
- 8月26日 达拉第政府查封《人道报》。
- 8月27日 查封《今晚报》和法国共产党及群众組織的一百五十九种期刊。
- 9月1日 希特勒的軍隊入侵波兰。

- 9月3日 英法对德宣战。
- 9月26日 达拉第政府下令解散法国共产党。
- 10月1日 弗洛里蒙·邦特和阿尔图尔·腊梅特代表有共产党議員参加的“工农議會党团”写信給赫里欧議長，呼吁签署和約。
- 10月5日 凡拒絕譴責共产党、苏联和給赫里欧的信的、未入伍的共产党議員被捕。建立关押被捕共产党員的集中营。
- 1940年1月20日 达拉第政府强行通过罢免共产党議員的議案。
- 3月20—
- 4月3日 审讯共产党議員。
- 5月10日 德国军队通过比利时和卢森堡向法国全面进攻。
- 5月31日 敦刻尔克战役。
- 6月6日 德国装甲部队向首都挺进。法国共产党的地下領导向政府建議保卫巴黎，抵抗侵略者。
- 6月10日 法西斯意大利向法国宣战。
- 6月14日 巴黎未经战斗交給了希特勒。
- 6月17日 雷諾政府撤退到波尔多，让位給貝当，貝当宣布要求停战。
- 6月22日 法国投降，在雷敦德签字。
- 7月10日 国民議会在維希开会，授予貝当全权，貝当解散国民議会，废除第三共和国。
- 7月下半月 法国共产党的地下領发出《告法国人民书》。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